

THE REICHEN'S CULTURES SERIES

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 主编

百年烟云

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

沧海一粟

李志刚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B978
10

98728

DH8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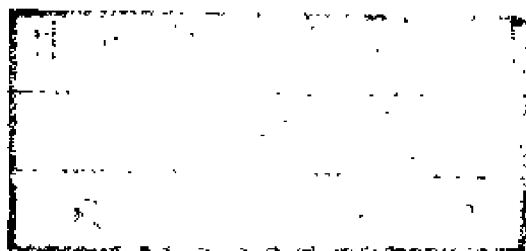
百年烟云 沧海一粟

——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

李志刚 著



200131179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北京

85371

(京)新登字 1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烟云 沧海一粟/李志刚著.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9

ISBN 7-5072-0412-X

I. 百… II. 李… III. 基督教史-史料-中国-1807~1949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720 号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幽州书院哲学部

《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梁衡 胡长清 舒乙 庆先友

主编:王志远

副主编:文庸 钟肇鹏 冯今源 章宏伟

常务编委:张世英 刘荫芳

望德专辑常务编委:文庸 马爱德

本书责编:文庸

百年烟云 沧海一粟

——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

李志刚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51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5 000 册

ISBN 7-5072-0412-X·123

定价:(软精装)12.80 元

丛书总序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即使在看似最无宗教传统的中国,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修养水准,以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某种材料。宗教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而且是涉及几乎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已成为当代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从这种时代的要求出发,我们编辑了这套《宗教文化丛书》。丛书总计百种,将按三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其中包括专著系列(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译著系列(世界著名学者的名著或新作)和普及系列(由专家为非宗教专业读者撰写的融汇最新学术成果的知识读物),希望能做到有助于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引进世界宗教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使广大读者建立起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对宗教的认识。丛书将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同时介绍儒教、道教、萨满教、神道教以及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所有编入丛书的作品,都要求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或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语言表达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汇贯通。既使宗教研究者可资借

鉴,也使对宗教感兴趣的各界学人开卷有益。由于涉猎范围广,著述品种多,出版时间紧迫,审读人手短缺,尽管参加著译的大多是宗教学的博士、硕士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但挂一漏万、美中不足之处总会有的,尚祈望各界方家赐教,以便在再版时校正。为了提高排版质量,本丛书基本采用激光照排,由于这在中国还是新技术,也带来一些诸如缺字、跳空的新问题。尤其要说明的是,丛书所收作品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中国文化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了一鸣之地。我们主张“文责自负”,以宽容的襟怀进行学术切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哲学或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角度去理解宗教或判断宗教的兴衰,都难免会作出片面的结论。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及人体科学等不同角度)、立体的阐述(兼顾统治阶层信仰、知识阶层信仰和民间下层信仰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系统的论证(综合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延续,分析宗教的出发点和客观社会效果),才能揭示宗教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宗教文化丛书》正是要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给人们提供各种观察了解宗教的机会。

在诸多角度中,首先是宗教创立者、传播者和信仰者自身的看法,或简称为神学的角度。这是应予尊重和重视的,是从其他角度观察的对象和研究的基础。一个人尽管不必是宗教信仰者,但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免应具备对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也不至于由于妄加褒贬或主观歪曲而带来无知与浅薄之名。据估计,全世界现有宗教徒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与这样多的人们交朋友,

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每一位作者或读者都膜拜在宗教的脚下，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掩卷之余都有一番思索，得出一个独立思考后的判断。

其次应提到哲学的角度。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与抽象，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宗教概莫能外。宗教的内容可以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等框架加以标定，便于人们去把握其实质。但这种把握往往要求把握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无论是普通信仰者还是对宗教有一般兴趣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哲学却实在是宗教的精神支柱，只不过距离宗教登场表演的前台还很远罢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次前台的戏已唱得不起劲甚或停了下来，但这支柱却不会倒。宗教在学术上的不朽价值，较多地体现为其哲学对于人类思辨能力的深化与提高。不过，发人深省的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反倒要求助于宗教。二者常常交替出现，面目甚至是模糊的。

再次应提到文学的角度。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复活》、《金瓶梅》、《红楼梦》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西游记》、《十日谈》、《巨人传》等等。不了解宗教就不容易理解这两类文学作品；但如果想从这两类作品去了解宗教，前者多为理想化，后者多为世俗化，与神学或哲学的宗教又都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也正是从文学角度体现宗教或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的特色。如果触目皆是说教而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学则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其实并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

当今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一种角度，是心理学。例如，讲“天堂”、“地狱”，会被有知识的人们斥为“迷信”、“陈腐”。但如果像池

田大作在《展望 21 世纪》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就是受生命原有的魔性的冲动所支配，处于痛苦最深的状态”，“‘天’是欲望得到满足，充满欢乐的状态”，是否当代人就会接受呢？据说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人汤恩比给予的高度评价是：“超过迄今西方所进行的任何心理分析。”传教者已变换为这种现代口吻，研究者将如何？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又如何从这一角度分析？都是新课题。

还有不能忘的一点，即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宗教。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古来即有“神道设教”的治国安邦之策。宗教之于政治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叫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本能自觉地“巡民教化”。政治与宗教的协调互补，在历史上往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而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乃至冲突，则标志着动乱和不安。这种现象也很值得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探讨。

至于其它方面，如经济学的角度，在僧俗之间，传统的说法往往不知不觉总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维护皇权的利益，似乎此时皇权便代表全民。而实际上，宗教经济的存在——其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补充作用和心理效应，更多地表明了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宗教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总之，从任一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研究宗教，而任一学科也仅仅揭示了宗教的一个方面。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扩大探讨宗教的视野，是一件有利于各种学科展现更全面历史的好事，也是一件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好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宗教的探索曾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当我们整理这份遗产时，沐浴着她的智慧之光，更感到应让她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献出潜在的宝藏。我想，如果意识到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

类而去；如果意识到宗教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则将使我们对宗教的观察和了解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王志远

一九八九年一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丛书再序

《宗教文化丛书》面世，是在1989年春天，至今已整整六周年了。六年之中，丛书已陆续出版近50种，专著、译著和普及等三个系列都分别渐具规模。虽然平均每年只有八九种书出现在丛书的行列里，速度不算很快，但毕竟是坚持不懈地出了下来，没有中断，没有夭折，没有减色，硬是开辟了一方天地。不仅朋友们赞叹，就连我们自己——我和我的编委会同仁们，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仁们——也都禁不住发出一声感叹，真不易！

这不容易来自审批管理、原料涨价、发行不畅，也来自编审修校的繁重。为了保证质量和水平，原本应出得快一点的书，有时只能一修再修，宁慢勿滥。由于种种的困难，有几次我几乎要下狠心不再往下编这套丛书了，但负责编务的张世英老先生送来了作者希望出书、读者希望读书的封封信函，也捧上了他对丛书的热诚和辛劳。我的夫人刘荫芳女士则认为主编和劳累是同义词，无可怨尤，并且愿以同样的劳累投入繁复的编务工作。编委会第一任、第二任副主编文庸教授、秦惠彬研究员、宋立道博士、戴维熊编审、支鄂湘副编审及黄隽青副社长、艾杉等至交好友也不辞辛苦，做了许多工作。丛书顾问梁衡、宛耀宾、胡长清、孟纪青、舒乙、庆先友等先生都对丛书寄以关注和支持。这些热心、善良、睿智的人们深深感动着我，使我看到在今日之中国，是仍可以找到不计报酬，投身事业的知己的，这激励、鞭策使我不能将丛书停下来。

为了将丛书下半套 50 多种书坚持编完,在 95—96 年度丛书编委会聘请了各有所长的四位知名学者做第三任副主编——文庸教授、冯今源教授、钟肇鹏教授和章宏伟副编审,包括我在内,分别负责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和其他宗教相关书稿的审定工作,力争比上半套丛书出得质量更高、速度更快。与主编总揽、副主编分头负责的新办法相应,丛书中将增加一种以专辑命名的组稿编辑方式,如基督教文化设“望德专辑”、伊斯兰教文化设“穆德专辑、佛教文化设“福德专辑、”道教文化设“道德专辑”等。设专辑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出好专著和译著,加大丛书的份量,提高丛书的学术价值。

历数近年来的某些丛书,其来势也猛,其去势也疾,用不了一两年,时过境迁,回头去追寻它们的人便很少了。《宗教文化丛书》却不然。新的品种固然受欢迎,老的品种也令人难忘,为了配齐,不少读者一再来信,有人还希望分类成函地出,他们宁可既保存着旧版,还要再买一套完整的新版。尽管由于渠道不畅,新华书店的征订数越来越萎缩,出版或再版都很困难,但丛书为需要它的读者而坚持了下来,并且与发行所一道,努力开辟与更多读者相见相识的道路。

劳累之余,我深入思索丛书层出不衰的原因。认真编审修校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如此操劳的丛书主编绝不止我一人,天下自当有过之者。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便是读者的需求。六年来,对宗教及其文化产生兴趣,希望认真了解、正确认识的人日益增多。对宗教和宗教文化固执偏见的人虽然还有,但他们也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变化,渐渐转向较科学的态度。这是大势所趋。

所谓“大势”,包含着中国大陆各界对本世纪以来甚至上溯更久一段历史中宗教及其文化的社会作用的重新审视和深思。

西方的中世纪和中国的宋元之后的宗教给思想界留下了人类思想桎梏的印象,而其超越性则被认为是对现实之不足的掩饰而

已。然而，当宗教仅仅被当做枷锁击碎时，击碎者却往往造出比宗教更无人性的枷锁，思想浮躁、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环境污染都成为新的无形囹圄；当超越性的神圣光环暗淡下去时，现实的不足并不因此就能在一个早上便完善起来，而人们在尘世名利的泥淖中却更加无以自拔。

文化界曾经认为音乐、绘画、雕塑、建筑以及文学的对象和主体都是人，宗教不过是艺术的一层面纱而已。然而，自古以来最有震撼力的艺术作品却总是顽强地透露出它们深层里的宗教精神，而缺乏乃至没有这种精神的作品总是不能给人以灵魂的升华与安祥。

宗教经济是不是社会经济中既消极又具寄生性的成分，曾经是经济学界不需多辩的问题。然而，如果以这种所谓消极和寄生性即不能创造物质产品的标准去衡量，教育、文化和艺术等一切精神产品所附丽的经济成分则都难逃其咎。完全没有宗教的社会，在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的历程中迄今尚未出现过。从历史上看，一旦宗教观念淡薄、混乱，当时的社会必然出现信仰危机所引起的伦理道德危机，乃至影响到正常的经济生活。这常常使一部分明智的人们感到宗教文化的引导是何等必要，即便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供养也是值得的，就像人类其他精神事业需要经济支撑一样。况且宗教经济尚有其独特的运作发展形式，有不容忽视的巨大潜力。

至于宗教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往往被统治者利用，这个论断从政治侧面确实显示了历史的真实。它说明宗教的属性之一可用于调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一种事物能被“利用”，并非坏事，不管被谁利用，关键在于被利用去做什么。如果被用来为皇帝炼金丹、制红铅，或蒙骗百姓、坑财害命，以至祸国殃民，当然不好。但如果能巡民教化、安定社会、平抚人心、发展生产，就很难说不好。起码国泰民安对老百姓是件好事。当民不聊生时，宗教也会

被用来做反抗的旗帜,这说明它并不专属于统治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宗教与政治之间也颇有些水与舟的味道。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的差异。传统宗教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其性质和作用相对稳定,只要适应了新时代,发展趋向是有延续性的。而新兴宗教则有较多的不稳定因素,有些派别可以风靡一时,但对社会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很难估量,任意发展下去,甚至会走向反面。

我曾经讲过一个譬喻,说传统宗教就像一个内心善良的人,当他生活在冬季时,不得不穿上一件老棉袄。这棉袄在当时满新鲜、满时髦、满出色的,但日子久了,颜色褪了,破绽多了,甚至棉花都露了出来,还打了补丁,不仅不再招人喜欢,甚至还会引来对穿棉袄人的厌恶。其实那人还是挺善良的,他是有生命力的,他也意识到衣服已经破旧了,应该送进历史博物馆留做回忆和借鉴,而自己则应在新春到来之际,渐渐地换上夹袄以至单衣。允许他换衣服,甚至帮助他换件可体的应时的衣服,以便和春天里的人们增进认同感,同怀善意走向未来,这难道不是当代各界的人们该做的么?

各界的审视和深思是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不乏错综与对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急于立即下定论,可以进一步探讨,应该沟通更多的信息。这一点很重要,是走向正确认识的正常趋向。

《宗教文化丛书》顺应了这个趋向,以学者的忠诚和严谨为这大势所趋推波助澜,从而才取得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

《宗教文化丛书》的宿愿是完成 100 种,而距离本世纪结束还有五年,50 多种书要在世纪末之前提早出齐,真不知还会有多少艰难困苦。但我相信这宿愿是能实现的,因为这丛书是为了迎接 21 世纪的,而 21 世纪不仅是科技高度发达、物质不断丰富的世纪,同时也是人类重新调整精神生活的世纪。迄今为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的温饱实在不需

要再去以掠夺自己的同类来维持，需要的是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共建地球这个家园。科技达到相当水准，物质实现相当丰富之时，恰恰应是人类痛感精神要有所寄托之日。

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人们重新认识抖落了种种历史灰尘、经历了现代文明阐释的世界宗教的世纪，是在物质文明成功推进基础之上从罪恶之渊藪中爬上来向人类固有的善良本性方向复归的世纪。许多人“一生奋斗、老来归依”，并不是消沉，而是成熟的冷静、冷静的成熟，那是只有经历过之后才能有的觉悟。人类大约也像一个人那样有他的幼年期、童年期、青春期、壮年期……如果在21世纪人类能成熟一点，或许能放弃战争与暴力，走向觉悟与和平，而那正是千百年来宗教文化所企盼的！

但愿《宗教文化丛书》能为这一进程铺上几粒石子，但愿《宗教文化丛书》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能为人们提供一些往日的殷鉴、来日的信息，若能如愿以偿，十年心血亦不为憾！

王志远

一九九五年一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林治平序

文庸教授决定把李志刚博士所撰有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论文汇整重编，列入“宗教文化丛书—望德专辑”在北京出版，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深信李博士的这本专著必能对关心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整合、促进了解、丰富心灵的各界人士有正面而积极的功效。

在文教授选辑的这本书中，共有李博士所撰八篇重要论文。第1篇《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晌》是一篇综论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李博士特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出版事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医药事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想”五方面分别论述，条举目张，引证详实。第2篇《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查马礼逊原系第一位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自1807年进入澳门、广州以后，到今年正好190年，透过李博士这篇文章，吾人可对马礼逊一生的志业有所了解，特别是在190年前，身处极端闭锁的中国，马礼逊所遭遇之艰难困顿，盖可想见。第3篇《傅兰雅在华之事业及贡献》则是讨论一位有专业的基督徒如何以其专业知识献身中国，影响中国之现代化。有关傅氏在华之贡献首推翻译西书，促进西学。李博士于本文结论中指出：“论及晚清对中西文化交流贡献最大者，若以中学西传而论，则理雅各牧师为翘楚；若以西学东传而论，则非傅兰雅莫属。”允为的论。李博士于本文中

复强调，“傅氏之来华绝非教会差派之教士，自 1865 年后与圣公会更无从属关系”，然其热心于中国现代化之媒介，全心全意贡献于中国社会，“实基于信徒内在信仰的实践”，“反映信徒对社会国家应有的责任，较之神职教士之参与尤有效益，影响更大”。换言之，傅兰雅系以平信徒专业人员之身分献身中国现代化运动，其工作见证实足作为今日基督徒专业人员知识分子之榜样。第 4 篇《林则徐禁烟与澳门基督教士关系初探》一文，则详细探讨林则徐力主禁烟的思想与当时在澳门的外籍传教士以及早期中外基督徒的关系。李博士在本文中，根据精确史料证明当时的传教士如裨治文等人，如何以言论及行动反对鸦片毒品泛滥成灾，言人所未言，诚为难得，实在值得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仔细判读。第 5 篇《中国基督教徒对孙中山先生之认同新探》一文，则从孙中山先生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同出发，论述孙先生如何从中国传统闭锁系统中走出，接受基督教信仰之经过，继之探讨基督教徒对孙先生信仰的认同，以证明中外基督教徒对孙先生的怀念与景仰；再则列举事实说明在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基督徒如何投身参与，奉献认同；最后则以徐松石、张亦镜、王治心等人的主张整合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基督教的神学信仰，是一篇独有创意，见解精辟的好文章。第 6 篇《五四运动与中国基督教复兴之探讨》则是针对影响中国近代思潮，被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五四运动，说明教会内的知识分子如何回应的经过。须知教会虽然是一个超越世俗的宗教组织，但任何宗教组织都必须落实在社会文化的框架之内，或者影响社会形成未来文化，或者被文化社会影响，逐渐世俗化，至终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原有的本质。李博士本文实在是一个探讨社会变迁与文化适应相互整合的最佳范例，是研究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新方向、新课题，是很值得注意的。至于本书第 7 篇《广学会之发展与中国时局转变之关系》、第 8 篇《广学会出版事业对时代转变的适应》两文，均是以广学会为个案，讨

论这个基督教的传播机构在中国现代化途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影响。李博士于《广学会之发展与中国时局转变之关系》一文中，首先肯定指出早期基督教士在华之宣教事业实以出版事业为主要，而1920年前中国基督教之出版机构多具西方教会宗派之背景，其经费多来自西方教会之援助。在中国境内由热心信徒自由组合，不隶属任何教派公会者，则以广学会最具代表性。然后，李博士将广学会在中国之发展分为三大时期：满清时期之广学会、民国时期之广学会、香港时期之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依据时局之变化阐述广学会于各该时期所产生之应对及其影响与贡献。虽然李博士强调百年来因面对之社会文化结构不同，广学会均能扮演其应有之角色，然而作者仍然不免叹息基督教文字工作影响力之日渐式微。综观广学会在华三阶段之奋斗，第一阶段从广学会创立至民国成立(1887—1911)共24年，多由李提摩太主其事，广学会之出版物发行各省，尤其是知识分子、官绅阶层几乎人手一册，影响至为深远；第二阶段自1912—1949年，历时37年，其间由于李提摩太去职，继任者季理斐之编辑政策因应中国时局之转变而不变，使得广学会之书报不再具有形成思潮、领导知识分子之作用。尤其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基督教已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力中完全消退。1949年后，广学会迁往香港，先更名为基督教辅侨出版社，格局大不如前，其后于1965年更名为基督教文艺出版社迄今，其影响力仅限教会内之少数。综观广学会百年史，其影响力每况愈下，实在值得读史者戒惧警觉，有所奋发努力也。至于《广学会出版事业对时局转变的适应》一文，作者开宗明义就指出，“任何出版社的成立，都须审度时势，认识社会需要，从而制定出版方针和发展方向。”因此，李博士在本文中详细分析广学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历史文化社会变迁中的调适适应之道。可惜广学会在近代中国的巨变中——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抗日战后的调适，并不能充分回应社会文化的变迁需求，以致

从影响力的中心消失减退，实在可惜。李博士在本文结论中慨然指出：“广学会自1887年创立，至1949年，在这62年的岁月中，中国经历自强运动、中日战争、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种种的战乱。广学会处于不安的环境中，试图找寻最好的出路，为中国社会和教会作出贡献，但往往因客观环境的变迁而使广学会无从适应……明清时期是以国家社会为出发点，民国时期则以教会信徒为出发点。若以国家社会为出发点，收益读者自然以一般非信徒居多，但这只限于西方文化知识传播的效应，与信徒少有关连。至于以教会信徒为出发点，收益读者自然以信徒较多，对神学教育和灵性增长亦多有果效。从广学会的发展阶段来看，文化和信仰两种目标，实难两者兼顾，况且世局的转变足以影响出版策略的转变。而广学会由创办至1949年，62年来最大的危机是未能在本色化方面取得成效，历来出版的书刊以翻译居多；在经济上多赖外国的教会支持；人事上华人不能自主，事业发展必然遭遇障碍。”允为的论。

我与志刚兄是多年老友，因为研究的领域相近，经常向他请教，又因为我在台北宇宙光出版社担任义工多年，志刚兄每有新作，我常以出版者的身分仔细拜读，并为其大作安排出版事宜。这次文庸教授从宇宙光过去所出版的李博士的著作中精挑细选，编成本书，嘱我作序，这当然是我极大的荣幸，因此不揣简陋欣然命笔，是为序。

林治平

1997年3月

自序

基督教自公元 635 年(唐太宗贞观九年)由景教教士传入中国,至今已有 1360 年的历史。基督教在这一千三百多年中经历了几个兴衰浮沉的阶段。如唐代景教于 845 年因武宗灭佛运动受到牵连而消失;元代也里可温教和天主教随元朝政治势力而灭亡;明末清初天主教事业至雍正禁教而停顿。基督教新教自马礼逊牧师于 1807 年(嘉庆十二年)来华传教,至鸦片战争发生,满清战败,开放五口通商,基督教新教才得在中国立足,以后得以发展。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初期,以满清厉行禁教,兼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基于爱国意识,排外反教的情绪极为强烈,传教工作极不顺利。西方传教士为开展传教事业,一则要学习中国语文,二则要接触地方百姓,遂以兴办学校、开设医院、出版报刊书籍、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作为沟通的媒介,结果无形中将西方近代的教育事业、医药事业、出版事业、科技研究等等引进了中国。适逢晚清时代,政府为奋力图强,抵御外侮,致有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推行。西方传教士开办的这类事业,正切合时代的需要,有助于晚清现代化的发展。

基督教新教在华兴办的教育事业、医药事业和出版事业等可说是一种文化事业。此种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贡献,远远超过其传教事业的影响和贡献。基督教新教在发展文化事业的

过程中，事实上是受传教士个人思想的引导和建议，并获得传教会的支持。所以对晚清中国基督教新教的探讨，必须对传教士的活动和工作加以考究，洞悉他们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才能了解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贡献。本书的目的在于提述 19 世纪一些早期传教士个人的成就，以及他们为中国带来的影响，供有关研究者参考。由于学力有限，书中不免多有错漏，尚祈海内外专家学者海涵赐正。承蒙学长林治平教授撰写序文，谨此致谢！

李志刚谨序

1996 年 10 月

目 录

丛书总序

丛书再序

林治平序

自序

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1)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	(27)
傅兰雅在华之事业及贡献	(44)
附录：傅兰雅译著一览表	(65)
林则徐禁烟与澳门基督教士关系初探	(83)
中国基督教徒对孙中山先生之认同新探	(103)
五四运动与中国基督教复兴之探讨	(123)
广学会之发展与中国时局转变之关系	(148)
广学会出版事业对时代转变的适应	(163)

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引言

基督教的信仰是以上帝“道成肉身”为中心，(1)换言之，亦即信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进入人类的文化和历史，而对人类的文化和历史有所“成全”，(2)对文化和历史作出贡献。所以，历代基督教会均以耶稣基督为范式，效法耶稣基督以传道、教育、服务的事业，(3)去“成全”文化之不足。

基督教早于唐代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

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于颇黎，布辞慈之金属。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4)

迨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年)有俱篮国(Koulam)也里可温教兀咱儿撒里马主教遣使中国，进贡七宝项牌一件，药物二瓶。(5)史家陈垣载云：

盖元代诸教鼎盛，教徒日众，而也里可温之教徒，又非儒者之徒知读书，僧、道之离人独立，身虽奉教，而其人之为农、为工、为仕如故，未尝因奉教而必须脱离其职业，故其教徒比他教为盛，豁免租税，于国收入，影响至大，有不得不依旧征收者。(6)

明季耶稣会士之东来，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us Xavier)于1552年抵上川岛，首开教路；继有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于1580年入肇庆，创立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复后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3年接踵而至。据方豪在《中西交通史》论及明清之耶稣会士，对中国引进之西方知识与科技，有天文学、历学、机械工程学、物理学、年器、兵制、生物学、医学、地理学、音乐、绘画、建筑、语文、哲学等，对当时之中国知识分子发生极大的影响。(7)至雍正二年(1724年)下令禁教，天主教在华事业因此停顿，西方科技的传播由是中断，导致中国科技知识之延误，与禁教关系至大。(8)

1807年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到达广州。其时中国对外实行海禁政策，严禁西方教士在华传教工作，马礼逊藉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始得从事《圣经》翻译，及后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继而出版书刊，开设诊所，使欧美各国教士东来传道甚受鼓励，由是奠定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事业、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医药事业之基础，西方科技知识与政治思想亦复东渐，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出版事业

出版事业是基督教在 19 世纪对华传教最早使用的方式,由于中国禁教,马礼逊有感人际接触的困难,体验到翻译《圣经》、出版中文《圣经》,以及出版书报作为传教媒介之必要。因此当米怜牧师(Rev. William Milne)1813 年到达广州无法定居之时,遂往南洋一带考察,后马礼逊才有恒河外方传道计划(Ultra - Ganges Mission)之提议(9),意谓:

- (一)余等在中国之传教及印刷事业均为当局所限,即或个人居留尚属疑问,是以急需在中国临近寻觅一属于信奉基督教之欧洲政府统治地区,设立华人宣教总部。
- (二)俟米怜牧师之抵马六甲,拟领用或购置一地段,以为传道会之物业。
- (三)拟尽速创办免费中文学校一所。
- (四)拟在马六甲出版中文月刊。
- (五)此总部之设立,以为华人工作为主,至于其他事藉业亦不摒弃。
- (六)此总部以联合中国、马来亚、及印度以东之宣教工作为宗旨,其名称乃包括各方面之工作。
- (七)如获专人负责则从事中文、马来文及英文之印刷业务。
- (八)拟出英文期刊,藉以促进印度传道会之工作,并促进基督教互助互爱之实践。
- (九)拟用华语举行礼拜仪式。
- (十)兹因马礼逊现致力于《华英字典》之编撰,未克分身于《圣经》之翻译,部分《旧约》之翻译事项则由其他

同事代劳,以迄完成。(10)

从该计划书得知在中国传教及出版之困难,致有日后在马六甲设立宣教总部,并以印刷、学校为传教要务。所以,当米怜于1815年春抵达马六甲后,同年8月5日即出版《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月刊,由马礼逊和米怜主理,梁发参与木版印刷工作。1817年复有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自英到马六甲协助出版事宜。1817年5月又创办《印支披闻》(Indo-Chinese Gleaner)季刊,为英文介绍中国文化及风俗习惯的一份重要刊物。《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实属中国近代报业之鼻祖,而中国近代报业之发展均由此延伸。

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以后,基督教士在19世纪先后出版之中文报刊计有:

(一)鸦片战争前期

1. 《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1823—1826),月刊,在巴达维亚(今称雅加达)出版,麦都思主理。
2. 《天下新闻》(1828—1829),在马六甲出版,麦都思、修德主理。
3.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3—1838),月刊,在广州、新加坡出版,郭士立主理。
4. 《各国消息》(1838),在广州出版,麦都思、奚礼尔(Charles Batten Hillier)主理,出版数期停刊。

(二)鸦片战争后期

1. 《遐迩贯珍》(1853—1856),月刊,在香港出版,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主理。
2. 《中外新闻》(1854—1861),半月刊,1865年改为月刊,在宁波出版,由玛高温先生(Paniel Jerome MacGowan)、应思

礼(Elias B. Inslee)主理。

3. 《六合丛谈》(1857—1858),月刊,在上海出版,由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慕维廉(Rev. 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Rev. Edkins)等主理。
 4. 《中外新闻》(1861—1919),中文晚报,为《孖刺西报》附刊,在香港出版,早期由伍廷芳主理。
 5. 《上海新报》(1861—1872),中文周刊,1862年5月7日改为二日刊,1872年7月2日起改为日报,在上海出版,由伍德(Rev. Marquis Lafoyette Wood)、傅兰雅(John Fryer)、林乐知(Young J. Allen)等主理,为上海最早的中文报刊。
 6. 《中外杂志》(1862—1868),月刊,在上海出版,由麦嘉湖(Rev. John MacGowan)主理。
 7. 《中国圣教书会月报》(1864),在上海出版。
 8. 《中外新闻七日报》(1865—1871),周刊,在广州出版,由湛约翰(Rev. John Chalmers)、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主理。
 9. 《教会新报》(1868—1907),周刊,在上海出版,由林乐知主理,慕维廉、艾约瑟参与。1872年8月改名《教会新闻》,1874年易名为《万国公报》,改出月刊。1876年增出《益智新录》,专言科学;1891年增出《中西教会报》,专言宗教。
 10. 《圣书新报》(1870—1874),周刊,在上海出版,由范约翰(Rev. 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主理。
 11. 《中西闻见录》(1870—1890),月刊,在北京出版,1876年迁上海,易名为《格致汇编》,由傅兰雅主理,后改季刊。
- (11)

以上所列均为基督教士在各口岸出版之中文报刊;《遐迩贯珍》为香港最早之中文报刊;《六合丛谈》为上海最早之中文报刊;

《中外新闻》为宁波最早之中文报刊；《中外新闻七日录》为广州最早之中文报刊。至于《万国公报》之言论则对晚清知识分子影响甚大。香港 1857 年的《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及 1864 年由《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出版之《华字日报》亦为教友伍廷芳从中协助。(12)1873 年黄胜与王韬均为伦敦传道会会友，故得伦敦传道会转售印刷机器，并于翌年在港创设“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对中国近代出版业甚有贡献。而 1872 年英人美查(Earnst Major)在上海所办之《申报》，后有王韬女婿钱昕伯辞去《循环日报》工作北上沪江就任《申报》主编，协助出版。(13)

中国开放五口岸通商，报业发展则尚未萌芽，主要原因一则中国尚无出版报刊知识；二则缺乏新闻专业人才；三则没有现代印刷机器；四则亦无世界新闻电讯来源。论及近代报刊之出版，首要有铅字活版印刷机器，以及铜模铸字机器，才利于报刊的印刷。而伦敦传道会台约尔牧师(Rev. Samuel Dyer)于 1827 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已经用西方印刷术改良中文印刷(14)，其后伦敦传道会在巴达维亚开设印刷馆，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新加坡开设印刷馆，有助华文报刊出版。鸦片战争后，马六甲英华书院将铸字机器及印刷机器迁往香港，故有利《遐迩贯珍》之出版。麦都思于 1843 年来上海定居，专事《圣经》翻译，继而设立“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 Press)，于是伦敦传道会教士有《六合丛谈》之刊行。美部会原在新加坡开设之印刷馆于 1844 年迁澳门名为“花华圣经书房”，隔年再迁宁波，易名“美华书馆”，其后有《中外新闻》之面世。足见香港、上海、宁波实为近代中国报业出版之主要基地。说到中国报人应以黄胜为最早，缘黄胜于 1847 年随勃朗牧师(Rev. Samuel Robbins Brown)赴美升学，因在美水土不服，翌年返回香港，任职于英华书院，协助理雅各牧师(Rev. James Legge)翻译儒家经典。及至 1853 年伦敦传道会在英华书院出版《遐迩贯珍》，黄胜出任监督。(15)综合而言，基督

教士办报对中国近代报业之发展确实有一定的贡献。

三、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事业

清代教育沿袭明制,即八股科举教育,以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各种进阶牢笼民心,使儒生士子专攻四书、五经、诗词、策论,作为进身仕途求取功名的手段。(16)此种科举制度可谓导致民智闭塞,社会落后的主因。晚清时力主废除科举设立学校的,最早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侍郎李瑞藻奏《请推广学校摺》,提倡“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17)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提议废除科举,在各地设置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师范学堂,并成立学部专责分科、撰课本、定章程之事。(18)近代教育学者论及中国新教育成因,包括有:

远因:

- (一)耶教之传入——输入西学;
- (二)清儒之学说——怀疑旧学;
- (三)中外之通商——经济变动。

近因:

- (一)历次对外战争之失败——须用西艺;
- (二)历次外交之失败——须学西文;
- (三)政治腐败内乱不绝——须行西政。(19)

近代中国推行新教育虽由外力所迫,时势所趋,而基督教在华之现代教育事业实已早开先河。鸦片战争之前,伦敦传道会于1818年在马六甲已开办英华书院;鸦片战争之后,传道会先后在各口岸兴办学校。晏文士(Charles Keyser Edmunds)在《中国现代

教育》(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一书中载有,1918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统计如下:

1. 幼稚园——15所,学生3196人。
2. 初级小学——5276所,学生133826人。
3. 高级小学——575所,学生19605人。
4. 中学——233所,学生12533人。
5. 大专院校——28所,学生1499人。
6. 师范院校——56所。
7. 神道学校——31所,学生985人。
8. 职业学校——40所,学生1409人。
9. 孤儿院——49所,学生1544人。
10. 外国教师——1471人(包括831名女性)。
11. 华人教师——9595人(包括2783名女性)。(20)

中国著名的13所基督教大学,均早于1917年前成立:

1. 齐鲁大学——济南(始创于1864年登州男校)。
2. 福建协和大学——福州(始创于福州英华书院)。
3. 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始创于1915年)。
4. 之江大学——杭州(始创于1845年宁波男校)。
5. 华中大学——武昌(始创于1871年武昌文恩学校)。
6. 华南女文理学院——福州(始创于1908年福州妇女预科学校)。
7. 岭南大学——广州(始创于1888年岭南学堂)。
8. 金陵大学——南京(始创于1880年南京基督教学院)。
9. 圣约翰大学——上海(始创于1879年圣约翰学院)。
10. 沪江大学——上海(始创于1906年上海浸会学院神学

院)。

11. 东吴大学——苏州(始创于 1871 年苏州毕芬顿学院)。

12. 华西协和大学——成都(始创于 1910 年)。

13. 燕京大学——北京(始创于 1867 年通州男校)。(21)

中国的女子教育,向为社会所忽视。有关女子教育的倡导,英华书院早于 1825 年已经招收女生入学(22);郭士立夫人(Mrs. Newell Gutzlaff)于 1835 年在澳门开设一所女校(23);及至满清割让香港,叔未士夫人(Mrs. Henrietta Shuck)于 1843 年在港创办第一所女校(24);1844 年在宁波亦有女校之兴办(25)。所以,中国女校之设立以及女子教育之推行,实以教会首开其端。1918 年中国政府及基督教会所办之女子学校有下列之比较:

省 份	教会女校	政府女校	合 计
安徽	85	25	110
浙江	182	249	431
直隶	141	324	465
北京		668	
福建	650	19	669
河南	73	83	156
湖南	88	131	219
湖北	236	194	430
甘肃	10	9	19
江西	46	69	115
江苏	244	263	507
广西	20	64	84
贵州	25	114	139
广东	481	51	532
山西	84	259	343

省 份	教会女校	政府女校	合 计
山东	780	197	977
陕西	24	68	92
四川	474	340	816
云南	54	252	306

(26)

至于晚清之留学教育,1846年即有理雅各及夫人携同三名男童一名女童留学英国,至1848年返回香港;(27)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校长勃朗牧师亦于1847年携同黄宽、黄胜、容闳前赴美国升学(28)。黄胜翌年自美返港(29);容闳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为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之大学毕业生(30);黄宽后来转往英国习医,于1856年毕业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士学位(31),亦为华人毕业于英国大学之第一人,故近代留学运动,实以早期教士开其先路。中国推行洋务运动期间,容闳倡议幼童留学计划,经曾国藩、李鸿章允许,于1872—1875年间,遣派120名幼童,分四批赴美入学,为中国公费留学之始。(32)

在推行新教育事业中,基督教士同样关注课程和教材的出版工作。1877年来华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大会(The First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对中国教育问题已经提出讨论,组织“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出版学校用书,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1890年该会英文名改为“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1905年中文名改称“中国教育会”,1916年再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因组织扩大,所出版的各类教科书遍布全国各地,1890—1912年间共出版教科书20余万册之多,成为近代中国教科书之开端。(33)

所以,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之推行,不论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各级教育,以至于女子教育、留学教育、盲人教育、课程出版等方面,基督教士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四、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医药事业

马礼逊为来中国传道,曾于1805年入伦敦圣巴多罗买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接受医学训练,对医学已有基本认识,在澳门期间,由于夫人体弱多病,常得东印度公司李文斯敦医生(Dr. John Livingstone)之照顾,遂成挚友。马礼逊为藉医药传道,于1820年与李医生在澳门开设中医诊所,聘请中国医师施医赠药;1827年得郭雷枢医生(Dr.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相助,在澳门成立一眼科医院;1833年在广州增设一医馆,医治各种病症,远近乡镇多有病人来诊,医务日见繁忙,虽有白拉福医生(Dr. J. A. Bradford)、柯克思医生(Dr. R. H. Cox)义务协助,但仍难应付大量病人之需求。郭雷枢医生有见及此,曾通知欧美各国传道会,请求遣派传教医生来华服务。(34)1831年美国青年伯驾(Peter Parker)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旋入医学院攻读,1834年毕业取得医生文凭,应美部会召请,受遣前往广州行医传道。伯驾医生实为中国第一位医生教士,于1835年11月4日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就诊病人有增无减。伯驾医生医术高明,深得信赖,其后医院经费亦获广州商绅捐款支持。(35)

为配合医药传教工作,伯驾医生于1838年2月21日在博济医院成立“在华医药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为中国第一个医药传道会(36),对中国现代医学贡献良多,孙中山先生于1886年亦曾肄业于此(37)。

“在华医药传道会”成立后,不但获得广州、澳门两地外商的支

持,而英美各传道会亦纷纷响应。1851年以前先后来华医生教士计有:

姓名	所属传道会	来华年份	服务地区
波乃耶 Rev. Dyer Ball M. D.	美部会	1838	新加坡、香港
洛魏林 William Lockhart M. R. C. S.	伦敦传道会	1839	舟山、上海
戴华尔 William B. Diver M. D.	美部会	1839	澳门
台信 Benjamin Hobson M. D.	伦敦传道会	1839	澳门、香港、广州
协帮 James C. Hepburn M. D.	美国长老会	1841	新加坡、厦门
高明 William Henry Cumming M. D.	医药传道会	1842	厦门
玛高温 Davie Jerome MacGowan M. D.	美国浸信会	1842	宁波
卡德 Davie B. M. Cartee M. D.	美国长老会	1844	宁波
地凡 Thomas T. Devan M. D.	美国浸信会	1844	广州、香港
哈巴安德 Andrew Patton Happer M. D.	美国长老会	1844	澳门、广州
何斯伯 Henri Julius Hirschberg M. R. C. S.	伦敦传道会	1847	香港
詹士 J. Sexton James M. D.	美南浸信会	1848	上海
喜施来 James Hyslop M. D.	伦敦传道会	1848	厦门
戴牧师 Rev. Charles Taylor M. D.	美以美会	1848	上海

姓名	所属传道会	来华年份	服务地区
养医生 James H. Young M. D.	美国长老会	1850	厦门
温敦 Rev. William Welton M. R. C. S.	英国圣公会	1850	福州
怀礼 Rev. Isaac William Wiley M. D.	美国监理会	1851	福州

(38)

早期医生教士之来华,有的属本国传道会遣派,有的是与医药传道会联系,这些医生教士在各口岸开设之医院,均属中国各地推行西医西药之先驱。

伯驾医生在广州开办之博济医院,实为推广医药传道会事工之中心。自 1855 年由美国长老会嘉约翰医生(D. John Glasgow Kerr)主理,其后附设西医学堂,此亦为广东医院之前身。雒魏林医生先在澳门任职,于 1843 年在上海创办第一所医院,后于 1861 年在北京开办第一所西医诊所,是为北京协和医院之前身(39)。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载谓:

久之,渐得中国人民信任,外国医术优于中国旧有,逐渐证明;外国医院组织充实,尤优于中国无组织者多多。外国医术在中国减轻人民痛苦,救免夭亡,同时中国人反对基督教之偏见亦渐消除,当初医科传教会(按即医药传道会)设立之目的,亦可谓远矣!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少死亡率,而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西国医学书籍为汉文,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少也。今全国教会设立之医院,数目与物质两方面,皆较中国自己公私立者,多而且各,各省著名之教会医院,有如汕头莫国(按即美国)长老会医院,奉天苏格兰联合自由会之

医院,杭州大英医院,汉口英国医院,上海伦敦传教会医院,美国圣公会医院,济南齐鲁医院,淮阴仁济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皆资本雄厚,规模极大,驰名全国,每年活人无数,使中国医学,日见欧化。(40)

至 1919 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医院 326 所,分布各省医院之数目有:

安徽省——8 所
浙江省——19 所
直隶省(今河北省)——24 所
福建省——41 所
河南省——14 所
湖南省——18 所
湖北省——22 所
甘肃省——2 所
江西省——7 所
江苏省——29 所
广西省——4 所
广东省——39 所
贵州省——2 所
山西省——11 所
山东省——28 所
陕西省——2 所
四川省——26 所
云南省——2 所
东三省——25 所
新疆省——3 所(41)

有关近代西方医学译著介绍于中国,以合信医生为最早,诸如《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全体新论》等,(42)均为医学基本理论。嘉约翰医生除著有《炎症论略》外,并译有《化学初阶》、《体质家源》、《体用十章》、《副症全书》、《炎症新论》、《裹扎新法》、《内科阐微》、《西药略解》、《眼科撮要》、《妇科情蕴》、《花柳指迷》、《皮肤新篇》、《卫生要旨》、《英汉病名表》等书。(43)是以中国近代医学之建立及发展,应该说是以教会医药事业为基础的。

五、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科技发展

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创办之会社(Society),应以1834年11月29日在广州成立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为最早,该会是郭士立(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发起的,以出版书籍启发华人思想对西方文艺和科学有所认识为宗旨。(44)该会曾去函英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教会呼吁支持。郭士立先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在“实用知识传播会”成立后,即转由该会主理,成为该会主要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每期除刊载有各国志略、地理、天文、新闻、贸易、物价、宗教等内容外,其中更有不少介绍西方科技之专论,为19世纪引进西方科技的一份重要刊物。

按《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道光癸巳(1833年)十月新闻载有“孟买用炊气船”谓:

炊汽船,或曰火蒸船,即俗称火船者是也。其用滚水

之蒸气，而使机关转行，令船快走，故名也。

又于道光甲午(1834年)四月绘图介绍“火蒸水气所感动之机关”(按即蒸汽机)；道光乙未(1835年)六月载有“火蒸车”，“一个时辰，走九十里路，不用马，不恃牛，任意飞跑”，将火车知识介绍于中国。《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于1838年停刊，“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亦于1846年停办，先后出版有西方历书、世界史、世界地理、英国史、美国史等书籍。晚清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所撰之《海国图志》，其中部分就多以《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为参照。(45)

马礼逊教育协会于1835年在澳门设立之“马礼逊学校”，于1842年11月迁校香港，其时所授课程包括历史、地理、数学、几何、生物、化学、音乐等科，固属西方科学基本知识的教导(46)，但由于该校于1850年结束，对西方科技的引进，实无多大贡献。

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有西教士之传播，一方面则在于国人的提倡。前者有伟烈亚力、艾约瑟、傅兰雅等人将西方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等西学的引进；后者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行洋务，筹设江南制造局，于1867年附设翻译馆，聘傅兰雅主持馆务。由是将西方之天文、力学、地质、矿物、热力、植物、动物、生理、光学、化学、采矿、冶金、电镀、制造兵器、铺设铁路、铸造钱币、纺织漂染、摄影留真、绘制铁船、电力工程等实用科技知识译为华文。协助科技译事的李善兰、华衡芳、徐建寅、江衡、赵元益、徐寿、乐学谦、贾步纬、丁树棠、王德均、周郁雨、应祖锡、华备钰、徐华封、汪振声、王树善、潘松、黄宗宪、钟天纬、徐家宝、王季烈、范本礼、钱国祥、程瞻洛等人均为中国近代之科技专门人才，由于与西方教士之接触，加深西学造诣，对西方各种科学之吸纳，而对中国社会有所传播，实有不可磨灭的功绩。(47)

中国第一所科技学校，应以1874年麦华佗(Walter Henry

Medhurst)、福弼士(Francis Blackwell Forbes)、伟烈亚力、傅兰雅、唐廷枢等人在上海筹设之“格致书院”为最有成绩。格致书院之设立,《申报》谓:

本书院创设沪上,专为招致生徒究心实学,其提倡者半为中西积学之士。院地板宏敞。拟以半造博物院,中国图书象物,为生徒考镜之资。半为学舍,比屋鳞次,可容数百人。学有二端,听其所向。例亦定为两则:一为学西国语言文字者,本书院延有名师,朝夕课责,来学者每岁纳四十金,本书院供给饮食;一为讲求格致学者,本书院于算术、化学、矿学、机器之学,皆为专家,其参据书籍器具,亦皆罗列,来学者先纳三百金,三年学成后,原银交该生领回,学未三年不成而思去者,其银罚充公项。当有志之士,先期赴院报名注册,及期甄收,有所通知可也。此启。(48)

格志书院西学讲习,包括矿务全课、电务全课、测馆全课、工程全课、汽掷全课、制造全课等六大项目。授课章程由傅兰雅所定,不论教授方式、科目类则、课业安排、成绩考核,均属中国科技教育之先河。(49)格致书院由1876年开办,至1914年结束,其中以傅兰雅、王韬、徐寿三人为最力,而傅兰雅之功最大。(50)

若论中国近代科技之报刊,以傅兰雅于1876年2月主办之《格致汇论》最具历史。内容以科学知识而言,载有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仪器、天文、自然现象、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动物学、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地理学、地形学、水力学、潮汐、医学、药理学、生理学、电学、机械学等;以工艺技术而言,包括蒸汽机、炮船、开矿技术、钻地机、纺织机、制糖、打米、制陶、造砖、造玻璃、弹棉花机、制皮革、制冰机、造啤酒、造汽水机、造扣子机、造针机、火

车、铁路、农业机器打字机、印刷机、选纸、炼钢铁、造水泥、造桥梁、榨油机、造火柴、照相机、幻灯机、潜水技术、电灯、电话、电报、鱼获养殖、制图等，(51)所论科技至为实用。

美国长老会狄考文牧师(Rev. Calvin Wilson Mateer)于1863年来华，在山东登州设立“文会馆”着力从事教科书翻译，出版天文、数学各类书籍，至1890年成立“中国教育会”，先后出版数学、代数、天文、几何、化学、物理、地质、植物、动物等教科书，(52)对中国学生教育，培植科学基本知识，为中国发展科技的主要基础。

综上所述，可知近代西方科技知识之传入中国，无论是报刊的介绍，西书的翻译，教育的提倡，凡此种种，都有基督教士居中从事，其成就均有史可证。

六、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想

晚清中西接触阶段之演进，实始于西艺而西知，由西知而至于西政。故有人主张，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观念之接受，是甲午战争后所产生之事物。(53)即如郑观应、王韬、何启、胡礼垣、陈炯、陈虬诸人所提倡之民主观念几属晚清末期之事，其民主言论是以自由、平等、议会、立宪等主张，确立民权之地位。(54)此等民主思想既属西方之政治制度，其能传入中国，实非晚清后期的演化。尤以《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所载之各国总论，对欧美各国政治制度，以及民情风土多有介绍，其中更有专论英美民主宪政之报道。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于道光乙未(1835年)六月论议会民权云：

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开诸阻档，自操权焉。五爵不悦，争论不止。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

不然人民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心竭力矣。是以英吉利良民不安，必须固执自主之利。

道光戊戌(1838年)三月谓“英吉利国”

上年八月理国事公会散，良民选拣乡绅代为兼摄。于是百姓眉开眼笑蜂集，候补相公多嘴多舌甘言应承，即供伸民之冤，而推各人之利。倘民悦意随抡选之。届时入公会论道，办理，以副国政，愈英姿敏慧愈名垂百世，万民景仰，且开升迁职位之路。

又载“亚米利加兼合国”：

国政裕宝，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故此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足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现今遍地行倒败，商客不利达，其害不尽焉。是以首领主按例招列老翁会议定耳，推国之科，免其陷害，倘各人众皆一心，执一见，饶此唇舌，事情如意，及民不期后与焉。

戊戌(1838年)有《自主之理》一文，亦论英国司法制度之独立：

情不皆理，律协乎情，上自国主公使，下而士民凡庶，不论何人，犯之者一齐治罪，不论男女、老幼、尊贵、卑贱。从重究治，稍不宽贷。……至于臬宪，其俸禄甚厚，不敢收陋规，人视之如见肺肝，真可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由是观之，此国之宪，不能稍恃强倚势，肆意横行

焉。设使国主任情偏执，藉势舞权，庶民恃其律例，可以防范。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弗能定案判决矣。至于自理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

英华书院于 1835 年 3 月在港创办《遐迩贯珍》，各期除介绍西国地理、轮船、火车、机器、贸易、物价外，对西方政治制度亦有详述。1853 年 10 月有论《英国政治制度》一文，提及英国议会制度、立法制度、司法制度、行政制度之产生及其运作。而 1854 年 1 月有《花旗国政治制度》一文，除详论总统、立法、司法、行政、联邦及各州之组织外，并将英美制度作一比较。载谓：

于此参观英国、合郡国政制大略相同，两国权柄，皆由庶民所出，所秉权者，俱为国例所钳束，无论官民悉为例范围。但两国亦有区别之处。一则合郡国主为民庶推举践位，在位限以四年为期；而英国嗣裔继统，绍传递及，践阼则终身在位，两法各有其善。合郡国法终乃能得长材绝诣之人，英国法似较妥静，免每期推选之时，纷纭更张，人心摇动，改变常度，俾枉生计也。次所区别，则英国凡有才能出众，能勤劳有裨益国家者，国主封锡以爵。而合郡国不然，在彼国想以无此制为尽善，在英国则以无比制为欠缺也。合郡国人每云，无论何人，皆属平等，不应偏有超越，庶类众生，均如一体。(55)

西教士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及各种西书译本，对于魏源、梁廷楠、徐继会等早期主张议院论者，实有直接之影响(56)及 1875 年郑观应于《易言》提倡君主立宪；王韬于 1880 年提出“上下一心、君民共治”之立宪言论；何启、胡礼垣于 1894 年所著《新政真诠》，亦主张君主立宪，以致甲午战争后已成“时论”。然究之郑

观应早岁于上海,已就学于傅兰雅(57);王韬本是基督教徒,在伦敦传道会墨海书馆任职,后抵香港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尝随理雅各赴英游历欧洲各国,思想自得启发(58);何启为中国第一位牧师何进善(何福堂)之子,自小深受教会培育;胡礼垣乃何启之同窗好友,在思想上多受何启影响。至于林乐知创办之《万国公报》,各教士发表之言论,更是晚清知识分子提倡西政,主张改革之思想来源。(59)其后中国驻外使节,以及出外之留学生可以直接接触外国事物,认识西方政治制度,故教士之言论才渐失其重要性。但是晚清之知识分子首先了解西方民主思想,教士之引介实具极大之影响。

七、结 论

近代基督教之传入中国,曾以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医药事业、科技事业、西政思想等作为传道之媒体。凡此种种均属文化事业,固足引起中国文化的冲击与持续。基督教建立之各种事业,在历史上已经构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故讨论中国近代文化之背景及发展,则不能忽视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之影响。

有言现代中国之转变,应以“五四运动”为其肇端,故孙中山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60)而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时代改革的需求。(61)此实反映中国在20世纪初叶政治制度缺乏“民主”,社会建设缺乏“科学”之实情。惟是探究晚清之“洋务运动”,原意本在接受西方“科学”的改革;“维新运动”亦在谋求西方“民主”的实施;“辛亥革命”则强调“民主”与“科学”的结合。而基督教之东来传教,为配合社会民生之需要,从事于出版、教育、医药、科技等类事工,对“科学”、“民主”均有所引介和贡

献,从而使近代中国文化事业对西方“科学”、“民主”有所融合、有所实践。

注 释

- (1)参见《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 14 节,《歌罗西书》第一章 21—23 节。
- (2)参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 17—18 节。
- (3)耶稣在世工作包括教导、宣讲、服务三大类型。参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 35—38 节。
- (4)转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7 年影印本,第 37—38 页。
- (5)参见吴泽主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5 月,第 7 页。
- (6)引注(5),第 21 页。
- (7)方豪所著之《中西交通史》共 5 册,其中第 4 册专论明清耶稣会士引进之西方学术和西方科技,及对中国所产生的作用。参见方豪著《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出版社,1959 年 1 月。
- (8)参见郭廷以撰《中国近代文化的延误》,载台北《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 1 辑,第 1 期。又,郭廷以撰《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载台北《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 1 辑,第 7 册。
- (9)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The Anglo - Chinese Press, 1820)P. 110—119, 137—139.

- (10)转引李志刚撰《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6月，第169—170页。
- (11)所列基督教早期在华出版之报刊，参考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9—20页。又张玉法撰《近代中国的书报录》上篇，载《新闻学研究》第7册，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出版，1971年5月，第293—309页。
- (12)参见林友兰撰《近代中国报业先驱黄胜——对黄胜、伍廷芳、陈霭亭三人在香港初期中文报业地位检讨》，载《报学》4卷3期。林友兰撰《陈霭亭与香港华字日报》，载《报学》5卷10期。赖光临撰《王韬与循环日报》，载《报学》5卷10期。
- (13)参见《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1932年，第12—14页。胡道静撰《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载《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2卷3、4期，第947—950页。
- (14)参见贺圣鼐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卢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12月，第257—260页。
- (15)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香港，太平书局，1964年3月，第119—120页。
- (16)参见古梅编著《现代中国及其教育》下册，中华书局，1934年11月，第340—346页。
- (17)参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43—148页。
- (18)参见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第217—221页。
- (19)参见注
- (16)，第306页。

- (20) Charles K. Edmunds,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P. 50—51.
- (21)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531—534.
- (22)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41—143.
- (23)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r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 7.
- (24)《香港基督教教育的先驱》，香港，浸信会出版部，1955年8月，第14—16页。
- (25) Ida Bella Lewis,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19) P. 18.
- (26)同上注(25)，第39—40页。
- (27) Y. S. Leung, *James Legge and the three Chinese Boys from Malacca*. (in *Asian Culture* 1, Singapore, February, 1983.) P. 55—59.
- (28)同上注(23)，第18—20页。
- (29)同上注(23)，第31页。
- (30)同上注(23)，第39—40页。
- (31)同上注(23)，第32—33页。
- (32)见李志刚撰《容闳与近代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2月，第83—119页。
- (33)参见王树槐撰《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台北，1971年6月，第365—415页。

- (34)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P. 45—48.
- (35)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Shanghai, Kelly and Waslsh Limited, 1935)P. 46—47.
- (36)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P. 653—655.
- (37) 参见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广州，岭南大学刊，1935年11月，第5—9页。
- (3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X. 1851. P. 514—519.
- (39) 参见陈邦贤著《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第188—189页。
- (40) 转引注(39)，第190页。
- (41) 参见《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171—1174页及各省统计。
- (42) 参引王尔敏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74—81页。
- (43) 同上注(39)，第191—193页。
- (44) 同上注(38)，第三册，第378—384页。
- (45) 参见陈耀南著《魏源研究》，香港，乾惕书屋，1979年3月，第188页。按魏源《海国图志》，卷85之“火轮船”，其中内文印有之蒸汽机图，与《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甲午四月所载《火蒸水气所感动之机关》相同。(46) 同上注(38)，第11卷，第550—554页。
- (47) 参见李志刚撰《傅兰雅对近代中国之贡献》，1987年9月

18 日发表于台北“基督教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 (48)转引注(42),第 24 页。
- (49)同上注(42),第 42—48 页。
- (50)同上注(42),第 90 页。
- (51)同上注(42),第 32 页。
- (52)同上注(36),第 582—584 页。
- (53)参见王尔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9 年,第 220 页。
- (54)参见熊月之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6 月,第 134—204 页。
- (55)《遐迩贯珍》,1854 年 1 月,第二号,第 4 页。
- (56)参见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 年 10 月,第 34—35 页。
- (57)参见夏东元著《郑观应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 11 月,第 271—272 页。
- (58)参见罗香林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学社,1961 年 2 月,第 44—68 页。
- (59)参见梁元生著《林乐知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年 2 月,第 130—143 页。
- (60)参见《国父孙中山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讨论》,载周策纵等著《五四运动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年 12 月,第 3 页。
- (61)参见劳思光撰《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载周策纵等著《五四运动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年 12 月,第 444 页。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

一、引言

马礼逊牧师 (Rev.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英国苏格兰人, 1806 年毕业于高士坡宣教学院 (Gosport Missionary Academy) 后, 随即被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遣派来华传教。他于 1807 年 9 月 4 日到达澳门, 9 月 7 日抵达广州, 是基督教新教第一位到华传教的牧师。

马礼逊对于传教事业固然有极大的贡献, 但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 则往往为人所忽略。事实上, 一百多年来有关马礼逊的著作确属不多, 而中文的编著更少。马礼逊的贡献在华人学术界, 以及教会神学界之所以未受重视, 显然是由于立场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观点, 以致对马礼逊没有全面的探究。一般人对马礼逊的认识, 主要有两种立场:

第一、政治性的立场: 马礼逊虽然是在 1807 年到达广州, 原意在于传教, 可是碍于清廷禁教, 不得已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翻译, 至 1834 年病逝广州, 前后历 25 年之久。(1) 按此时期中外交通以商务为主, 中英尚无外交关系, 双方亦无严重冲突。马礼逊只是东印度公司的译员, 东印度公司纯属民间组织, 公司在广州进行的一切贸易, 均不得直接与政府官员交涉, 而必须由十三行的行商居间处理, 可见马礼逊的职责主要是传递东印度公司与行商间的

信息,对公司并无决策性的影响。因此就政府立场而论,他不是参与中英外交关系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其所处地位被人忽视,是事属必然的。

第二、宗教性的立场:马礼逊牧师来华主要目的在于译经,而非在于传教,他在中国 25 年并没有设立任何教会,由他私下施洗的信徒不过五人。(2)虽则他在 1813 年出版《新约圣经》,1823 年出版《旧约圣经》,但却是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印行,在禁止传播外国宗教的中国社会中,实在难以广泛流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五口开放通商,教会采用的《圣经》并非马礼逊的译本。(3)马礼逊与米怜牧师(Rev. William Milne)亦曾在马六甲创办马华书院,但此亦非教会主导的工作。故从教会事业发展方面来看,马礼逊的传教事业未被重视,是自有其理的。

若就政治性的立场,或是宗教性的立场去了解马礼逊一生的功绩,实必有其局限性。但由于马礼逊生活处境及工作身份,他所做的隐藏性事业,实在需要从另外一种立场和角度深入探究,才能发现他的贡献。其中有关他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他不只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并且也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他可以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两轨性的先驱者,他一生的事业确有研究和发扬的价值。

二、马礼逊对中西文化隔阂的突破

明末清初中西交通的渠道,一则是传教,一则是通商。在传教方面,自康熙颁布禁教,天主教士活动大受限制,教务由是停顿。至于通商方面,葡萄牙人首开先河,及后则为英人所取代。清初之时,本开放宁波、厦门、广州为通商口岸,英人于 1671 年(康熙十年)在厦门设有商馆,商船可自由通行澳门、广州、厦门、宁波各地。

及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深恐外人在各海岸滋生事端,(4)难以照应,为防夷之计,遂下令只留广州一地对外通商,外国商船一概严禁在闽浙两地贸易。(5)1759年英国人洪任辉(James Flint)驾船直入天津,拟呈奏折告澳商陋习,因洪任辉擅自北上有违规章,终被囚禁澳门三年。自洪任辉案发生后,澳督李仕尧上奏防夷五事。(6)其主要事项有五:

(一)禁止夷商在省住冬。

(二)夷人到澳,令寓居行商所设商馆,俾便管束稽查。

(三)禁供外夷资本及雇请仆人役使。

(四)永除外夷雇人传递信息。

(五)夷船水泊黄浦,酌拨营员弹压。

此五项禁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公布实施,由是可知昔日外商在中国贸易是受到诸多限制的。

为求通商外交,英国于1792年派马嘎尔尼伯爵(The Earl of Lord Macartney)出任专使来华,翌年抵京觐见高宗,后以觐见皇帝须行三跪九叩礼仪而起争执,故中英通使首次挫败。(7)

18世纪以前,外人与中国之交往,仅限于广州的贸易,而外国商船进入广州亦以每年5月至10月之间为期限,其余时间外商必须随商船撤离广州返回原地,或在澳门居留。外国商人在广州只能在十三夷馆(Factory)一带活动,禁止洋人写稿,亦不得携翻译书籍入广州居住,内地史书严禁售予洋人,不得教外人习华文。(8)所以当时的中国对于外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谈不上有中西文化交流的可能。

英国在18世纪的时候,已是一个极其自由的社会,而英国人民对于中国的认识亦甚有限。据马斯顿(William Marsden)所编《东方书籍及抄本目录》(A Catalogue of Oriental Books and Manuscripts)一书,(9)其中刊载中国之书目多属拉丁文著述,英文著述则很少。其时英国殖民事业雄霸全球,而中英之交往不外商

业贸易,况且碍于地理空间的阻隔,所以英国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同样存在一个闭塞的环境。由此推知,马礼逊要认识中国文化已非易事,至于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社会,而又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马礼逊之能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至少要突破下列各项困难:

1. 人事的困难:马礼逊来华虽是被伦敦传道会遣派,但亦必须出于个人的意愿。伦敦会所遣派的任务只是翻译《圣经》,(10)可见马礼逊的来华,全属教会组织的支持,并无任何政治势力的保障。当马礼逊来华之时,东印度公司严禁属下船只乘载教士前往印度及中国,(11)因此马礼逊被迫前往美国转乘美国商船来华,抵达广州之后,亦无容身之地,一度辗转躲避于广州澳门之间,不得已受雇为东印度公司译员,方得安顿居留。马礼逊由于任职东印度公司,亦招致伦敦传道会的误解。(12)不久马礼逊在广州印《圣经》事被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获悉,惟恐触犯中国法令,于董事会中通过决议撤消马礼逊之职务,(13)虽则撤职在案,并命令广州东印度公司执行,但适逢马礼逊好友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在伦敦,他是广州东印度公司前任翻译,对马礼逊的处境甚为了解,于是向董事会力保。其时英国复派阿美士德勋爵(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为特使再度来华觐见仁宗皇帝,斯当东亦举荐马礼逊为随团翻译,马礼逊才免撤职。任职东印度公司实非马礼逊的原意,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则无法在广州澳门两地居留,对中国语文当无从学习,对中国文化无从深入了解。是以马礼逊在人事上有所突破,方有助他对中国的认识。

2. 环境的突破:马礼逊初到广州,遭到不受东印度公司的欢迎、不能在广州居留、不能在澳门居留和天主教教士的反对四大困难,(14)任职东印度公司之后各项困难亦告消除,但其工作环境只有广州澳门两地,至受局限。1817年7月7日随阿美士德勋爵北上进京,其后虽然因为觐见仁宗皇帝须行三跪九叩首礼无法协调,

未能达成外交使命,但得仁宗皇帝准予其游览颐和园,并从陆路南
下,途经山东、南京、江苏、鄱阳湖、江西、梅岭而抵广州,先后历时
一年之久。马礼逊此次游历曾抵山东孔子故乡,更游览南宋朱熹
在江西讲学的白鹿书院,对各省风土民情,以及天主教、回教、犹太
教(挑筋教)多有涉猎,使他对中国文化有实际的认识。1823年
春,马礼逊曾一度往马六甲和新加坡访问。其时新加坡莱佛士总
督(Sir Stamford Raffles)计划开发新加坡,特邀请马礼逊前往筹办
莱佛士学院(The Raffles Institution, 亦称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教育华人。(16)马礼逊南洋之行,对南洋华人文化当
有进一步的了解。可见马礼逊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决非徒托虚言,
而是在地理人文中有无数突破,使他获得亲身的经历。

3. 语文的突破:马礼逊来中国之前,对中国语文毫无认识,自
他接受伦敦传道会派遣他在中国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才开始
对中国语文的学习,当时他唯一的中文书本就是借用大英博物馆
所存《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的抄本,教导他学习
中文的老师亦是一位在英国学习商务的青年容三德(Yong Sam-
tak)。(17)马礼逊抵广州之后,不惜高价聘请多位华人教习。后
来他出任东印度公司翻译兼中文教育之时,更有助他对中国语文
的发展。至于他私下译经工作及出版中英文书刊,实需对中文有
正确的运用。综观马礼逊学习中国语文固然直接承受华人教师的
教导,而其应用亦多直接应用于中国华人的社会,此直接学习和直
接应用是其他一般学者难以比拟的。

三、马礼逊对汉学的研究

斯当东曾被誉英国汉学之父,(18)而斯当东与马礼逊实有
深厚情谊,他不但是马礼逊的挚友,也是马礼逊的恩人。马礼逊初

到广州之时,深得斯当东照顾并介绍华人教习。(19)1815年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马礼逊的撤职,而终得留任;(20)1817年得充当阿美士德勋爵译员北上帝京;(21)1834年东印度公司取消专利权,马礼逊能留在广州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的译官,(22)全属斯当东力保的举荐。马礼逊对斯当东亦敬重有加,斯当东于1818年返英不复东来,两人鱼雁至为频密,对汉学常有切磋。马礼逊逝世之后,亦委斯当东为遗嘱执行人,(23)因此探究马礼逊对中西文化的贡献,则不能忽视他与斯当东之关系。

马礼逊出行抵达广州后,对中国语文学学习绝非坦途,先后邀请教导有容三德、李先生(Le seen sang)、殷坤明(Abel Yun Kwanming)、罗谦(Low heen)、高先生(Ko seen sang)。(24)容三德是最先教导马礼逊学习中文的老师,自伦敦返广州后亦尝教授《四书五经》;李先生教导粤语;殷坤明是来自北京的天主教士,用拉丁文教导马礼逊学习国语及《圣经》;而罗谦和高先生则教导中国经史之学。据马礼逊记载,高先生原属满人,以教学为业;罗谦擅于写作,(25)汉学基础受此二人影响至深。从马礼逊学习及其发表之著作,可得知其研究汉学的过程:

1. 从儒家经典着手:马礼逊在英国随容三德学习之时,已获容三德介绍“孔夫子”其人其学,(26)及抵广州或返澳门,罗谦、高先生均授以《四书五经》。所以马礼逊在1811年出版一本英文著作 *Horae Sinicae*, 其中就有《三字经》、《大学》、《三教源流》、《太上老君》等部分。就事实所见马礼逊之研究汉学,均以儒学为主张。

2. 从文学着手:马礼逊对伦敦传道会主要的工作是译经,而入东印度公司任职的原旨,则以出版《华英字典》为原务,而先后出版有:

A. *A Gramme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

B.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五车韵府》)

1st Part—(1815)

2nd Part—Volume 1(1819)

Volume 2(1820)

3rd Part—(1822)

C. Vocabulary of Canton Dialect (《广东省土语字汇》1828)

马礼逊自出版《五车韵府》后,即深得欧美学术界的重视,为其一生不朽的巨著。此为英语系统第一部华英字典,无怪乎马礼逊逝世后,英美友人为他立碑无不以此字典的贡献作为表扬。(28)

3. 从民俗学着手:由于马礼逊负有翻译《圣经》的责任,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有关儒学传统、社会风俗、民间宗教等都必须有所学习与体会才易进行。诸如儒家的拜天、天子、理、性、太极、易、卦、圣人、君子、贤人、德者、才者、善者等理论和观念,以及其他宗教的佛、菩萨、道、神仙、天后、喇嘛、清茶门教、茅山、挑筋教等信仰和主张,在《印支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中均有撰著发表,(29)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风俗的认识。

4. 从中国文学着手:据克兰玛贝恩(J. L. Cramer Bynd)在《第一位英国汉学家斯当东与马礼逊牧师》(The First English Sinologists Sir George Staunton and the Reverend Robert Morrison)一文之附录,在开列出的1810—1892年英语系统主要汉学论著中,有1817年马礼逊撰写的《中国一览》(A View of China),这是一本论述中国历代王朝地理、政府、宗教、风俗的历史书籍,(30)也是英语系统第一本中国历史书,是当时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通典。

以上所列各点均属马礼逊研究汉学形成的方法和体系,而其后的英美汉学家多循此方法进行研究。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 University)于1817年向马礼逊颁授神学博士学位,表扬他在学术方面所作的贡献。(31)

四、马礼逊对中学西传的贡献

马礼逊对于中国文化学术固然有所热爱,并有湛深的研究,他亦身体力行向欧美各地倡导中国文化,鼓励西方学者对汉学研究的兴趣,甚而提携后进致力汉学的探究。有关马礼逊对汉学的倡导计有三方面:

1. 文字倡导:马礼逊在华25年,先后出版之英文书籍共有21种,(32)涉及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的有14种,此外创办或倡导《印支搜闻》,《广东记录报》(The Canton Rejester)及《中华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并在各期刊发表论著,(33)引起英美学者对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兴趣。诸如马礼逊自从在《印支搜闻》刊载论述,即导致英、法、美等各地学者来函就教。(34)其时,英国赫尼奇(Hackney)有园艺公司函请马礼逊代为搜集中国野生植物,为此马礼逊先后购入中国药书八百卷,(35)导致东印度公司李文斯敦医生(Dr. John Livingstone)对中国药学的研究,实为英人研究中国药学之鼻祖。影响近代西方对中国文化至巨的编著,应以1832年5月在广州出版的《中华丛报》月报,至1851年12月停刊,相继20年之久,为研究近代中西交通的重要文献。该刊虽由美国公理会裨治文牧师(Rev. Elijah Coleman Bridgman)及卫三畏教士(Samuel Wells Williams)主办,但美国公理会教士来华从事出版工作,实是马礼逊致函美国教会求援所致,而该刊早期三年均刊有马礼逊的撰述,(36)显见马礼逊对“文字倡导”不遗余力。

2. 言论倡导:马礼逊在华工作16年,1823年12月获准回国度假,其时并带返中国图书一万册。第二年3月返抵伦敦,旋获英皇乔治四世召见,马礼逊借由呈献所译中文《圣经》,不久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The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37)旋即被各地社团及教会邀约演讲,期间亦往法国会见各著名东方学者。马礼逊在英国大力鼓励设立一所中文图书馆及一所学院,(38)并主

张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开设中文讲座。马礼逊回英国度假期间在家中主办《中国杂志》(The Chinese Miscellany), 开办“妇女中文研究班”, 以提倡中国学术。(39)马礼逊亦曾被邀在各教堂讲道, 在讲道中论述中国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 唤起信徒对中国的向往。(40)

3. 教育倡导: 马礼逊对于教育工作甚具远见, 1818 年与米怜牧师(Rev. 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 该院创设不但专为华人学生提供教育, 亦为西方学童提供教育。创校宗旨是“本以和平传播基督教及东方一般文化之原则, 以达有效影响为目的。”(41)据马六甲英华书院校友记载, 马礼逊之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及汉学家亨德(William Hunter)亦在该院就读。(42)马礼逊回国度假, 曾提议牛津剑桥两大学开设汉学讲座, 虽则未为所动, 但马礼逊于 1834 年病逝时, 其遗嘱特意将全部中文藏书捐赠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不过以接受曾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任教的修德牧师(Rev. Samuel Kidd)出任大学学院中文讲座五年为条件, 1837 年大学学院接受马礼逊所定之条件, 修德出任该职历五年之久, 至 1843 年病逝即止。(43)按大学学院即今日伦敦大学前身的一所学院, 马礼逊所捐赠的中文图书现则库藏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可以推知伦敦大学设立中文讲座较诸牛津、剑桥两大学尤早, 而马礼逊的贡献实不容否定。

五、马礼逊对西学东传的贡献

马礼逊对中学西传所用的文字自然是英文, 对西学东传所采用的文字亦应以中文为主。至于马礼逊应用中国语文的程度, 无论是粤语或国语都与华人无异, 其中文写作能力极优。(44)据其

日记所载,1817年随阿美士德勋爵出使中国,英皇呈递仁宗的国书,皆由马礼逊译为中文;(45)1823年新加坡总督莱佛士筹建莱佛士学院,亦由马礼逊以中文草拟章程,(46)可见马礼逊的中文造诣,足以用中文传播西学于中国。马礼逊身处广州澳门两地,不得展开传教活动,于1814年建议伦敦传道会在马六甲成立传教总部,藉出版、教育、译经等事业推广教务,甚而透过出版工作,传播中西文化,以收传教的效果。马礼逊所传播的西学主要有三:

1. 西方知识的传播:有关知识的传播,一则可以“口传”,一则可以“文传”。而在马礼逊时代是以“文传”为主。马礼逊与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47)至1821年因米怜病逝停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实为中国近代报业的鼻祖,(48)内容有宗教知识、各地新闻、文化地理,(49)派送的对象为南洋一带的华人,(50)显然尚未流布中国内地,1833年马礼逊在澳门出版《杂文编》(Serial Miscellany),为期甚短。(51)然而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有人说是郭士立牧师主办,实际是马礼逊与郭士立合办,(52)其后马礼逊逝世,则由郭士立主持,至1837年才告停办,该刊内容载有不少西方知识,包括天文、地理、宗教、商业、科学、政治、国情等等,而流布中国沿海较广。据陈耀南博士在《魏源研究》一书中说及魏源之《海国图志》,其中有引用马礼逊的《外国史略》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资料,(53)可见这份月刊对于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具有实质性的影响。马礼逊倡导的中文出版事业,对西学的传介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其带动近代中文报业的发展,尤有历史的意义。

2. 西方教育的传播:中国之现代教育,应以马六甲英华书院为发端,其开办旨趣是“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为旨趣,(54)学校课程及教材,师资及方式均采西方教育设计。后来出任伦敦大学学院首任中文讲座的修德牧师,以及出任牛津大学首任中文讲座的理雅各牧师,都曾先后出任该院教师或院长。该院1843年迁至香

港,而理雅各在 1845 年携同三名学生赴英留学,实开中国青年留学之先河。(55)至今英华书院仍属香港历史悠久的著名中学,历年造就学生无数,人才辈出,对于香港及中国均有极大贡献。

新加坡莱佛士学院的创办,是以培植华人青年接受西方知识为首务,马礼逊亦属该校之创办委员。及至英华书院首批留学生于 1848 年返港,其中亦有一名学生前往该校任职,对西学传播当有所贡献。(56)

3. 西方医学的传播:马礼逊早在高士坡宣教学院学习传道之时,亦曾到伦敦圣巴多罗买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兼习医学,是以对西方医学常识已具基础。1820 年马礼逊为要搜集中国医书,同年在澳门开设一所医馆,聘用华人医生专为贫苦人民服务,(57)其后亦得东印度公司李文斯敦医生相助,继而加设西医赠诊。(58)1827 年有郭雷植医生(Dr. Thomas Richardson College)到任,后在澳门广州两地开设眼科医院。(59)由于就诊人数日增,马礼逊去函英美教会请求派遣专业医生教士到中国行医布道。至 1834 年首有美国公理会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来澳,翌年开设博济医院,为中国最早的一所西方医院,关亚杜医生(Kwan A To)为伯驾医生培训的第一位中国西医。(60)其后于 1839 年伦敦传道会即有雒魏林医生(Dr. William Lockhart)及合信医生(Dr. Benjamin Hobson)相继来华,在鸦片战争后分别进入广州、上海、北京各地开设医院,培训不少中国西医学生,西方医学由此得以在华传播。(61)

六、结 论

论及 19 世纪英语系统的汉学家,常以郭士立、卫三畏、理雅各、威妥玛(Sir Thomas Wade),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诸学

者著称,甚少提及马礼逊对汉学的贡献。而上述诸人与马礼逊无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无不受马礼逊的影响。郭士立和卫三畏(耶鲁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的来华固然受到马礼逊的鼓励,及抵澳门后亦得马礼逊的照顾及帮助。(62)理雅各出掌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为当时西方空前的汉学家,他深受马礼逊的影响,足可称为马礼逊的承继者。(63)威妥玛为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曾于1848年在香港从郭士立学习中文。(64)翟尔斯继威妥玛出任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虽然出生较马礼逊为晚,最初却是从马礼逊所著的《五车韵府》学习中文,他出版著名的《华英字典》亦为马礼逊的《五车韵府》的章本,对马礼逊至感佩服。(65)马礼逊逝世后,广州澳门各西方友好为纪念马礼逊对西学东传的劳绩,先后成立了“在华知识实用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及“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66)对于传播西方知识和教育均有良好建树。

综观一般汉学家,其事业以“中学西传”较多,而以“西学东传”则较少,对中西文化交流只属单程性的贡献。而马礼逊既能使“中学西传”,又能使“西学东传”,此种双程性的贡献,才更能促进中西文化相互往来的交流。

注 释:

(1)按马礼逊于1824~1826年回国度假,在华工作应属25年。参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1841, p.34-36.

(2)Carl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a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12-213.

(3)按马礼逊逝世后,即有麦都思(Rev. Walter Henry

- Medhurst)、郭士立 (Rev. Kao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裨治文 (Rev. Elijah Coleman August Bridgman)、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 等重修马礼逊《圣经》译本, 1837 年出版《新约》, 出于麦都思手; 1838 年出版《旧约》, 出于郭士立之手。而其后郭士立再将《新约》略加修订, 改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圣书》, 此译本《圣经》亦为日后太平天国所采用之《圣经》。参见 (Alexander Wylie, Chinese Researches. Taipei,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 101 - 103。
- (4) James Bromley 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 (London, Curzon Press Ltd. 1909) p. 32—33。
- (5) 参见《国朝柔远记》, 清光绪七年刊本, 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五, 第 8 - - 9 页。
- (6) 参见《史料旬刊》第九期 307—310 页, 《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 台湾国风出版社影印本。
- (7) 同注(4), p. 121 - 130。
- (8) 参见许地山著《达里集》,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1 年, 第 138—146 页。
- (9) William Marsden, A Catalogue of Oriental Books and Manuscripts. (London, 1827)p. 172—182。
- (10)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17)p. 54—59。
- (11) 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24) p. 33—34。
- (12) Elizabeth Morrison, Memorie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Longmans, 1839) Vol. I. p. 254—258。

- (13)同注(12), Vol. I. p. 417—419。
- (14)同注(12), Vol. I. p. 153。
- (15)同注(12), Vol. I. p. 450—458。
- (16)Charle Burton Buckley,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 - 1867*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p. 55, 122—123。
- (17)同注(12)Vol. I. p. 77—82。
- (18)J. L. Cranmer—Byer, *The First English Sinologists Sir George Staunton and the Reverend Robert Morrison*, in. F. S. Drake (e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7)p. 239—255。
- (19)同注(11), p. 51—52。
- (20)同注(12), Vol. I. p. 420—426。
- (21)同注(11), p. 92—93。
- (22)同注(11), p. 213。
- (23)参见陈尧圣撰《英国汉学的研究》,载陶振誉等著《世界各国汉学论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2年,第185—186页。
- (24)同注(12), Vol. I. p. 159, 163, 168; 237—238; 274, 293。
- (25)同注(12), Vol. I. p. 343。
- (26)同注(11), p. 81—82。
- (27)同注(12), Vol. I. p. 304—309。
- (28)按 1843 年 10 月 8 日 广州澳门众友好为马礼逊所立之中文墓碑,是以其出版《五车韵府》(即《英华字典》)作为表扬。碑文载有:“……罗伯马礼逊者,乃万世不朽之人也。当其于壮年来中国时,勤学力行,所以致中华之

言语文字无不精通,迨学成之日,又以可得于己者作《英华字典》等书,使后之习华文汉语者皆得藉为津梁,力半功倍。故英人仰慕其学不厌、教不倦之心,悉颂为英国贤士,由此不忘其惠……”见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 1846, p. 105 - 106。

(29) *Indo—Chinese Gleaner*. Vol. I. p. 18—23; 84—87。

(30) 同注(18), p. 258—260。

(31) 同注(11), p. 105。

(32) 据 Alexander Wylie 所著之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一书,马礼逊牧师出版英文之书目计 19 种。但尚有下列两书之遗漏。1. Robert Morrison,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London, Printed for Francis Westley, 1825) 2. Morrison and Milne, *Baptism for the Dead*. (London, Thomas Ward and Co., 1835)

(33)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9。

(34) 同注(12), Vol. I. p. 490—551。

(35) 同注(11), p. 105—106。

(36) 参见 *General Index of Subjects Contained in the Twenty Volumes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with An Arranged List of the Articles*. (Reprinted in Shanghai 1940) p. CXXV。

(37) 同注(11), p. 161—162。

(38) 同注(12), Vol. I. p. 294—296。

(39) 同注(11), p. 164—166。

(40) Robert Morrison,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London, Printed for Francis Westley, 1825) p. 14 - - 15。

(41) *Indo—Chinese Gleaner*, Malacca No. VI. October 1818,

Appendix。

(42)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p. 193。

(43) H. Hale Bello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826—1926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29) p. 119—120。

(44) 同注(16), p. 54。

(45) 同注(12), Vol. I. p. 558—563。

(46) 同注(16)。

(47) 同注(10), p. 155—156。

(48) 参见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87—92页。

(49) 参见张玉法撰《近代中国书报录》(1811—1913)，载《新闻学研究》第七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72年，第294页。

(50) 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嘉庆丙子年全卷24页告帖载有：“凡属呷地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每月初一二三等日打发人到弟（按为米怜牧师，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封面刻有博爱者纂，而博爱者即米怜牧师之署名）之寓所受之。若在葫芦、槟榔、暹罗、安南、咖啡吧、寥里、龙牙、丁几直、单丹、万州等处，所处各地方之唐人，有愿看此书者，请于船到呷地之时，或寄信与弟知道，或请船上之朋友来弟寓所自取，弟均奉送可也。”

(51) 同注(33), p. 7。

(52) 同注(50), 第296页。

(53) 参见陈耀南著《魏源研究》，香港，乾惕书屋，1979年，第186—189页。

(54) 同注(41)。

- (55) Y. S. Leung, James Legge and the Three Chinese Boys from Malacca. in *Asia Culture I*,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 Studies, 1983) p. 55—59。
- (56) 同注(42), p. 70—77; 194。
- (57) 同注(11), p. 104—106。
- (5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 1833, p. 16—24。
- (59) Samuel Well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Chades Scitbneis Sons, 1883)p. 333—334。
- (60)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p. 150。
- (61) 参见陈邦贤著《中国医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88—189页。
- (62) 同注(11), p. 193—196。
- (63) Lindsay Ride,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1957)p. 36—37。
- (64) E. J. Eit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s, 1882* (Hong Kong, Kelley & Walsh, Ltd., 1895)p. 254。
- (65) Herbert A. 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imited., 1912)Preface, p. Vii. XV。
- (66)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 1834, p. 378—384, Vol. I. 1836, p. 373—381。

傅兰雅在华之事业及贡献

一、傅兰雅生平事略

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1839年8月6日生于英格兰之海德镇(Hythe),父亲为英国圣公会牧师,家境清贫,对中国传教事业素为向往。傅氏幼时入本镇学校就读,后转毕列图(Bristol)之圣雅各学校(St. James School)。及长因获政府奖金乃入伦敦海伯里师范学院(The Highbury Training College)升学。1860年毕业,旋即应聘香港圣公会圣保罗书院校长。1863年由英国圣公会包尔腾牧师(Rev. John Shaw Burdon)荐入北京同文馆任英文教习,以代替其职务。(1)1865年转任上海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校长。1866年出任《上海新报》主编。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之翻译馆聘傅氏专事译书工作,至1896年离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加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出任东方语文教授。傅氏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职历28年之久,其间于1875年与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福弼士(Francis Blackwell Forbes)、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唐廷枢(景星)等筹办格致书院;1876—1892年出版《格致汇编》,先后翻译西洋书籍计有二百余种。(2)如果把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与北京同文馆的设立至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视为中国洋务运动(自强运动)时期,则傅氏在华35年即适逢其时,在江南制造局工作的28

年,正属其献身洋务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外国人,其贡献与近代中国之现代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一生在华之事业更需加以研究。

有关傅兰雅的一生事迹,宾纳(Adrian Arthur Bennett)在《傅兰雅译书考略》(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中对傅氏到中国之原因、在中国政府工作之目的、为何在江南制造局服务 28 年、其委身希望的所在等问题均有所质疑。(3)而史宾斯(Jonathan Spence)在《中国帮助者》(The China Helpers)一书中虽将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与傅兰雅视作近代中国的“挑灯芯者”(Trimming the Lamps),但言外之意似以傅氏为追求名利之徒,(4)此种观点,显然是外国立场的说法。傅兰雅自小已受父母熏陶,对中国事物极为神往,常阅读有关中国事物的书籍,撰写有关中国事物的文章,是以 1860 年毕业于师范学院后,旋即来华服务,虽然在香港圣保罗书院、北京同文馆、上海英华学校等地工作未甚称心,实因对中国环境及中国语言尚未习惯之故。至于史宾斯引用傅氏日记指其热衷名利,此则不明白傅氏原非一位传教士,而青年向上力求进步,事属人之常情。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编译馆任职 28 年,持之以恒从事译书工作,对中国政府未有不利主张,亦未为同僚所诋毁,其对中国社会的认同,对职务的投入,对华人的接纳,若非基于傅氏对中国之热爱,则难有更佳的解释。傅氏于 1896 年赴美之后,亦未尝忘怀西书译述工作,译著达 10 余种之多。(5)至 1928 年尚有圣诞新年贺片寄香港圣保罗书院致候,(6)凡此种种实可佐证傅氏一生对中国人民的爱心及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二、对西方科技的提倡

晚清洋务运动之产生,原因始于鸦片战争满清战败,中国官绅有感外国“船坚炮利”对西方有新改观,为使国势得以振兴,由是谋求变革。王尔敏在《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衍生之新观念》一文(7)中指出晚清思想有四大阶段:

(一)1840~1860年:为“初步认识与反应”,而取“用民制夷”、“以商制夷”、“以美制美”之法。

(二)1860~1880年:为“西力冲击下衍生之新观念”,谋求“变局”之法,以应世变;为求“自强”而洋务。

(三)1880~1895年:为“西方观念之吸收与融会”,对外力求“均势”,对内重视“富民”。在言论上则有“论西学”、“论议会政治”、“论法律”。

(四)1895~1900年:为“民族主义与西方思想之移植”,其时西洋教士书刊广受欢迎;时务、富强、经世、西学等各种丛书大量出版;中国官绅广泛创办报纸;中国官绅组织学会,藉以对西方民主制度有所吸取及仿效。

从上述所论时代的阶段,可知中国近代发展是“世变”而“衍生”的过程。所以在中国现代化力求改进的事实上,用现代人的观念加以批判是不恰当的。

论及近代中国对西知、西艺、西政之认识,则不能否定早期来华教士引介之功。就以马礼逊所创办的事业而言,其在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33年他在广州创办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是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8)此等早期报刊亦是介绍西方知识、西方政制、西方历史的重要报刊。(9)而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其著名的《海国图志》中就有援引马礼逊的著述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资料。(10)及后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于1853年在香港创办之《遐

途贯珍》，内容亦多刊载西方新知，书流行国内官民之间。(11)因此论晚清洋务运动的衍生，则不能否定早期教士对洋务运动的影响。(12)

王尔敏之论《洋务》曾说：

洋务的途径除外交的折冲尊俎之外，首先表现在国防工业的需求。就此方面来说，常与“海防”并论。这包括造船造炮、陆军、船坞、炮台，以及电线等等兴设，其本质毫无疑问的是西方技术与组织的承受，而尤侧重于国防之需要。其次洋务亦注意在民生工业的创设，诸如航运、煤矿、织布铁路、造船、钢铁厂等，均采用西方机器生产。采纳西方技术，虽不免起步迟缓，经营烦难，但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无疑义的，民生工业有若干项可与国防需要配合，如战船需煤，运兵需铁路，而铁路则需钢铁。同时其观念部分创发动力，无疑地乃是来自官绅求富的意愿。而求富的动机，一部分乃由于求强观念透进一层的追索而得，另一部分则为国人对通商口岸西人企业经营如轮船、棉纺织品等之直接反应。亦与所谓“利权概念”有关。求富观念，虽随求强观念之后应运而生，但内容则更复杂，发展并很曲折。民生工业建设是一单纯构想，然凡经营推动，则不免引起许多关联问题。诸如机器、原料、厂地、工人，以及生产，大部分关系西方技术知识。(13)

由上述所见，洋务运动早期思想，实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江南制造局的创设可谓近代中国从事现代化事业之肇端，未设厂之前曾国藩于 1863 年先派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购买机器运返后，即设厂于上海高昌庙，由是推行洋务。(14)西方机器固可购得，至于机器的运用和生产，则必须要有了解机器知识的翻译人才，方易投入服务，是以于 1867 年附设翻译馆，并聘请傅兰雅从事译书工作。傅氏之任职当照政府之规定进行有关技术西书之翻译。因此傅兰雅不仅介绍西方技术，诸如开采矿藏、冶金电镀、制造兵器、铺设铁路、铸钱造币、纺织漂染、摄影留真、绘制铁船、电力

工程等等实用知识,甚而亦将西方天文、重力、地质、矿物、热力、植物、动物、生理、光学、电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加以引介,以及将吉伯特(William Gilbert)、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波义耳(Robert Boyle)、虎克(Robert Hooke)、牛顿(Isaac Newton)等各种物理学说翻译于中国。(15)所以傅氏既着重于技术知识,又不忽略科学的知识;既着重于应用知识,又不忽略理论知识;既着重于自然科学,又不忽略社会科学;无论技术与科学、应用与理论、自然与社会均属全盘性整体性的知识。

傅兰雅于 1855 年与应祖锡合译之《佐治刍言》,计有下列各章:

总论

- | | |
|------|--------------|
| 第一章 | 论家室之道 |
| 第二章 | 论人生职分中应得应为之事 |
| 第三章 | 论文教 |
| 第四章 | 论名位 |
| 第五章 | 论国人作事宜有争先之意 |
| 第六章 | 论驳辩争先之误 |
| 第七章 | 论人类分国 |
| 第八章 | 论各国交涉事宜 |
| 第九章 | 论国家之根源 |
| 第十章 | 论国政分类 |
| 第十一章 | 论律法并国内各种章程 |
| 第十二章 | 论国家职分并所行法度 |
| 第十三章 | 论教民 |
| 第十四章 | 论财用 |
| 第十五章 | 论产业 |
| 第十六章 | 论保护产业 |
| 第十七章 | 论保护产业所生之利 |

第十八章	论平分产业之弊
第十九章	论工艺并造成之物料
第二十章	论人工能定物料之价值
第二十一章	论分工并管理人工之法
第二十二章	论机器
第二十三章	论工资
第二十四章	论资本
第二十五章	论贸易之利
第二十六章	论国家准人独造货物出售之弊
第二十七章	论各国通商
第二十八章	论钱法
第二十九章	论钞票
第三十章	论开设银行
第三十一章	论赊借

此书为论及民生、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管理、贸易、金融等西方知识，被梁启超视为极为重要之言论。在此可见傅氏之言科学，并不忽略政治、社会、经济整体关系的重要性。傅氏对西方科技的推介，不仅限于技术和科学，此外更涉及西方人文知识的推广，使社会发生整体性的运作。

三、格致书院之创办

马礼逊来华，曾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该院可称为中国实行现代教育的鼻祖。1835年英美友好为纪念马礼逊的贡献，于澳门开办马礼逊纪念学校(又称马公学校，Morrison School)。鸦片战争签约后，中国开放五口岸通商，西方教士相继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学校。教会初期所办学

校,虽讲授中国经典及西方近代知识,但设立学校均以培植华人教士为宗旨。至于在中国提倡西学,建议创办一所科技学院(定名为格致学院),实以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为首倡。(16)1874年3月24日(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在上海召开筹备会,并举麦华陀、福弼士、伟烈亚力、傅兰雅、唐廷枢五人为董事。(17)是以足证,傅兰雅实为格致书院创办人。格致书院之筹办应属私立性质,校址设立于租界之内,有关经费是向中国官绅、中国外商及外国友好捐募。为争取南洋及北洋大臣支持,拟有格致书院章程六条。内容如下:

谨拟格致书院章程六条恭呈钧核,计开:

一、设立格致书院,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之事,彼此更敦和好,先在上海通商码头购地建院,以便访求新法,格致机器小样,并购买泰西新出书籍,邀同西士,讲解理法。盖以现在讲求之人尚少,不得不借才以为倡导,将来风气日开,人才愈众,再行广推于各省会另设分院,自可无藉西人矣。

一、院中肄业,蠢鲁浮游之人,不得混收。其来历清白,资性聪颖者,概听入院,由董事验明,司事登记籍贯、姓名、来历、年岁,然后逢期进院学习,均须自备资斧。惟院中亦不取备金。至官绅富商亦可随意进院游观,并与董事等讲究一切。其倡捐之西人,亦听进院游观。

一、经理书院各务,公举董事八人。首先一二年邀同捐银之西人合办,并于董事中选出精晓艺术者四人,以为院师,均须自备资斧。每月拟订日期,轮流讲论格致一切,如天文、算法、制图、舆图、化学、地质等事,惟门类繁多,现在人才尚少,只可统讲大纲,日后学者益众,即可各习一门,以期专精。均系专考格致,毫不涉传教,并不干预别项事。

一、院中陈列旧译泰西格致诸书、各种史志、上海制造局新译诸书、各处旧有及续印新报、西国文字各种格致机器新旧之书格致

机器新报、机器新式图册、及天球、地球、各种机器小样、天文仪器、化学仪器、格致入门仪器、五金矿石各样。又备中国经史子集，以期考古证今，开心益智，广见博闻。今在创设，自宜择其尤要搜罗购备。盖此等书院在西国原为聚精会神之所，一切制造之学，由此以兴。日后果能经费充足，亦当尽仿其规模。

一、专派妥实司事一人，看门一名，常住院中。薄给薪水工食，以资养贍。所有肄业生徒及游观绅商，其籍贯姓名，出入时日，以及书籍器具，均令该司事分别登记号簿。至书籍器具，责成留心看管，不准任何人损坏携去。又经费既蒙上审赐给，其银钱收支，尤其登记明晰，由董事接款验核，于年终汇开简明清单，恭呈审核。

一、书院每日晨十点钟开门，晚七点钟关门，院中不准闲人嘈杂；游戏赌博更应严禁。院旁另设自房，如欲商议他事，可以入内谈论，以昭肃静。(18)

格致书院之建立是“讲论格致”、“专考格致”，而不涉传教，与早期教会主办之学校实不相同。格致书院主要设有“博物馆”、“格致堂”、“书房”。有关买地建屋章程初稿，以及对外国通告之函件均由傅兰雅经办。(19)格致书院开设的课程，包括：矿务科课程、电务学课程、测绘学课程、工程学课程、汽机科课程、制造科课程。矿务科课程、电务学课程、测绘学课程、工程学课程等，多由傅氏所设计。(20)

格致书院是于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一(1876年6月22日)正式开办，初办之时由于人事问题，颇甚阻滞，至1879年始收生徒，惟就学者亦不甚踊跃。自华人董事徐寿于1884年(光绪十年)去世，乃集议改进，对青年士子灌输新知，诚聘王韬出任山长，此议以傅氏主张最力，贡献良多。自王韬掌院，院务由是振兴，而其后傅氏亦尝建议创引士子从事西学新知考课，特聘院外名流命题及评阅，参与应考之士子官绅至众，凡属后秀前矛之课卷，全部发刊，印成专书，题稿《格致书院课艺》。(21)

格致书院自 1874 年筹备开办,至 1914 年停办,实为中国近代科技教育之先驱,其后影响各口岸相应仿效,使中国技术建立实质基础。徐寿、王韬、傅兰雅可以说是书院核心人物,而傅兰雅则贡献至鉅。王尔敏在《上海格致书院志略》一书中评论说:

格致书院之经营,先后有三位灵魂人物,即傅兰雅、徐寿、王韬三人,其中尤以傅兰雅为最重要,始终从事其间,致力最勤,用心最专,贡献最大。徐寿初期参与筹计,联络官绅捐款,始终其事,直至光绪十年(1884 年)病故。王韬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受聘为书院山长,课士评文,极尽心力,影响中国青年士子之思想最大。可惜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去世,抑且傅兰雅已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赴美定居,格致书院由是渐趋下坡。(22)

四、出版《格致汇编》

早期来华教士出版书籍报刊,主要是利于传教。自 1842 年中英签定和约至 1876 年间,各教会教士于各口岸先后创办之中文报刊计有:

1. 《遐迩贯珍》——1853 年 8 月在香港出版之月刊,1856 年 5 月停刊。
2. 《中外新报》——1854 年在宁波出版之半月刊,至 1861 年停刊。
3. 《六合丛谈》——1857 年在上海出版之月刊,因次年迁日本停刊。
4. 《上海新报》——1861 年 12 月在广州创办之周刊;1862 年

- 5月7日改为两日刊;1872年7月2日改为日报,至1872年12月31日停刊。
5. 《中外杂志》——1862年在上海创办之月刊,至1868年停刊。
 6. 《中国圣教书会月刊》——1864年在上海创办之月刊。
 7. 《中外新闻七日报》——1865年在广州创办之周刊,至1871年停刊。
 8. 《教会新报》——1868年9月6日在上海创办之周刊;1872年8月改为《教会新闻》;1874年改称《万国公报》,改为月刊,1907年停刊。
 9. 《圣书新报》——1871年在上海创办之周刊,1874年停刊。
 10. 《中西闻见录》——1871年在北京创办之月刊,1876年停刊,迁往上海,后易名为《格致汇编》。

(23)

综述上列教会在各城市创办之报刊,年期固有长短之别,但各刊物均载有宗教言论,藉以传播教理。而傅兰雅于1876年2月(光绪二年正月)主办之《格致汇编》(英文名称为 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 1877年改名为 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纯属科技新知之刊物。徐寿在序文中指出:

傅兰雅先生,英国之通儒也,来游中国十余年,通晓中国语言文字,特将西文格致诸书择其有益于人者翻译华文,月出一卷问世。盖欲使吾华人探索底蕴,尽知理之所以然,而施诸实用。吾华人固能由浅入深,得其指归,则受益定能量哉! 所谓格致之有益于人而可施诸实用者,如天文、地理、算术、几何、力艺、制器、化学、地学、金矿、武备等,此大宗也。(24)

《格致汇编》自发行以还，除 1878～1880 年傅氏返国，至 1892 年方行停刊，共七卷六十期：

卷一、1876 年 2 月至 1877 年 7 月 1 日(月刊)。

卷二、1877 年 2 月至 1878 年 1 月(月刊)。

卷三、1880 年 2 月至 1881 年 1 月(月刊)。

卷四、1881 年 2 月至 1882 年 2 月(月刊)。

卷五、1890 年(季刊)。

卷六、1891 年(季刊)。

卷七、1892 年 2 月(季刊)。

《格致汇编》所载西方科技知识内容至为广泛。以科学知识而言，包括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仪器、天文、自然现象、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动物学、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地理学、地形学、水力学、潮汐、医学、药物学、生理学、电学、机械学等。以工艺技术而言，包括蒸汽机、炮船、开矿技术、钻地机、纺织机、制糖、打米、制陶、造砖、造玻璃、弹棉花机、制皮革、制冰机、造啤酒、造汽水机、造扣子机、造针机、火车、铁路、农业机器、打字机、印刷机、造纸、炼钢铁、造水泥、造桥梁、榨油机、造火柴、照相机、幻灯机、潜水技术、电灯、电报、电话、渔获养殖、制图等，对西方多种科技引介实创新献。(25)

《格致汇编》创刊之初，仅出三千份，其后销量逐年增加，1876 年代销处仅有 24 处，至 1880 年 4 月则增至 38 处，同年年底突增 70 多处，分布通商口岸 18 城市及其他大小城镇 21 处。计有：

(1)辽宁省：牛庄。

(2)江西省：南昌、九江。

(3)山西省：太原。

(4)江苏省：扬州、苏州、上海、南京、镇江、邵伯。

(5)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

- (6)福建省:福州、厦门。
- (7)广东省:广州、汕头。
- (8)安徽省:安庆。
- (9)直隶:北京、天津、保定。
- (10)山东省:烟台、济南、青州、登州。
- (11)湖北省:汉口、武昌、宜昌、沙市、武穴、兴国州。
- (12)湖南省:长沙、湘潭、益阳。
- (13)四川省:重庆。
- (14)广西省:桂林。
- (15)台湾省:淡水。
- (16)香港。
- (17)新加坡。(26)

《格致汇编》除刊载有关科技知识外,并设有“互相问答”专栏,使各读者得以来函请求释疑,引起各方共鸣反应,增益学者兴趣甚大。(27)由是可知傅兰雅出版之《格致汇编》实属晚清科技知识之宝库,影响知识分子至钜。

五、西方科技书籍之翻译

马礼逊来华主要目的是在翻译《圣经》,及后相继来华的教士所刊行之报刊、出版之书籍,多有将西方之天文、算学、历史、政治、格致等翻译为华文。(28)上海江南制造局于同治六年(1867年)设立翻译馆,由徐寿主持其事,另聘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金楷理(Carl T. Kreyer)等外人从事西书翻译,而有关西书翻译事宜,则由傅兰雅主持。华人方面则有徐寿、徐建寅、赵元益、李凤苞、王德钧、江衡、郑昌棧、钟天纬、贾步纬、李善兰、严良勋、徐华封、瞿昂

来、周郁雨、俞世爵、汪振声、于树棠、朱恩赐等人从事。(29)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书中载有傅兰雅译书之方法：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读，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30)

傅兰雅对于科技专门名词的翻译，为免译西书常有混名之弊，是以提出三条方法：

(一) 华文已有之名：设拟一名自为华文已有者，而字典内无处可查，则有二法：一、可查中国已有之格致或工艺等书，及前在中国之天主教及近来耶稣教师诸人所著格致、工艺等书；二、可访问中国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应知此名目等人。

(二) 设立新名：若华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则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砷、铈、矽；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二、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氧气、氢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是也。三、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凡前译书人已惯用者则袭之，华人可一见而知为西名；所已设之新名，不过暂为试用，若后能查得中国已有古名，或见所设者不妥，则可更易。

(三) 作中西名目字汇：凡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为事物人地等名，皆宜随时录于华英小簿，后刊书时可附书末，以便阅者核查西

书或西人。而各书内所有之名,宜汇成总书,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查,可免混名之弊。(31)

傅兰雅提议的译名三方法,至今仍为翻译学生所沿用。光绪三年(1877年),傅氏倡组之“益智书会”(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为了统一译名问题,分由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麦嘉谛(Divie Bethune McCartee)、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等人进行,傅氏则专责于工艺译名之搜集,足见傅氏在翻译学上之贡献。(32)

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所载,1866~1907年翻译馆译书种类如下:

类别	种数	卷数	类别	种数	卷数
史志	6	45	算学	7	89
政治	10	73	电学	4	17
兵制	12	73	化学	8	62
兵学	21	109	声学	1	8
船政	6	11	光学	1	2
学务	2	2	天学	2	22
工程	4	38	地学	3	51
农学	9	45	医学	11	74
矿学	10	72	图学	7	55
工艺	18	106	补遗	2	15
商学	3	6	附刻	10	91
格致	3	9			

(33)

傅氏之在江南制造局任职历 28 年之久,而其自译或合译者,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物理、数学、化学、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绘图、生理学、解剖学、自然学等。在应用科学方面

有：制造、工程、测量、医药、卫生、航海、农业等在军事学方面有：炮术、防御等。在社会学科方面有：历史、政治、经济、政府等。此外尚有各种字典及名目表，细分有 26 类，不下 210 余种。傅氏所译科技西书固然对洋务运动有极大助力，而其所译政治、经济、政府等社会科学，对康有为、梁启超亦极具影响力。(34)至于晚清首先接触西学之知识分子，如徐寿、徐建寅、赵元益、李善兰、华蘅芳等人，自然受到傅氏的启发和影响。

六、对现代教育之推动

傅兰雅原属师范学院出身，其在华之事业亦以教育为本务，并以教育事业贡献于中国。其早年任职的香港圣保罗书院、北京同文馆、上海英华学校及其所创办之格致书院，全属教育范畴之工作。虽则傅氏在江南制造局任翻译之职，但其所译各类西书，更属文字教育推广工作。事实上他对中国教育极具远见与抱负，1866 年尝撰文，建议满清政府派遣青年士子在中国进行三年英国语文之训练，然后送往欧洲各国学习新知，藉此引进西方科技，促进社会的现代化，此项主张随后深获朝野官绅的反响。(35)

早期教会在各口岸开设之学校，没有一套现代化的中文教材，多采“圣经班”的模式，与西方学校教育制度实有极大差距。在华西方教士有见及此，遂于 1877 年(光绪三年)在上海召开首次教士会议(The First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会中并讨论教会开设学校之宗旨问题，其间有人主张教会办教育首要在于传教，也有人主张教育不应强行传教使命，于是形成两派意见之争辩。其后决议教会应积极推行高等普通教育，旋举丁韪良、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林乐知、黎力基(Rudolf Lechler)及傅兰雅成立委员会，组织“益智书会”出版

两类教科书,一供初等学校之用,一供高等学校之用,课本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并以浅易文言文撰写。可见“益智书会”之成立,实为中国学校设计现代教科书之滥觞。而“益智书会”工作之推动,以傅氏贡献最多。(36)据 1890 年该会报告,出版教科书已超过三万册。(37)由“益智书会”经费出版 35 种书籍,傅氏所编图书有 13 种可供初级中学或高等小学之用;宗教书籍则有 9 种。而由傅兰雅自费出版大纲性之书籍计 28 种,可供初级中学或高等小学之用,多为动力学、水力学、光学、热学等自然科学用书。(38)所以傅氏不仅是教育理论家,更是一位务实的力行者,其主张之科技教育不但在高等教育中有新发展,并且在中小学的基层教育中行之有效。

傅氏虽于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离华赴美出任加州大学东方语文教授,但仍未忘怀对中国教育之工作,于 1911 年尝捐款在汉口设立盲人学校,在上海倡设聋哑学校;1928 年设立基金会在上海购地建立一所盲女学校,由其子乔治·傅兰雅(George B. Fryer)主理该校事务至 1950 年,(39)足证傅氏为一言行一致的教育家。

七、结 论

论及晚清对中西文化交流贡献重大者,若以中学西传而论,则理雅各牧师(Rev. James Legge)实为翘楚;若以西学东传,则非傅兰雅莫属。考诸傅氏一生,其在华之时适逢中国积羽图强之时,其忠心供职江南制造局,专事科技西书之翻译,实为中国步向现代化重要的功臣。满清政府先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钦赐傅氏三品顶戴;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颁赐三等第一双龙宝星勋章,(40)以表嘉奖其对中国之贡献,此为傅氏实至名归所致。

傅兰雅之在中国,提倡西方科技,创办“格致书院”,出版《格致汇编》,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推动现代教育,凡此种种全属傅氏对中国之贡献。其为人处世足为时人所影响者有二:

(一)信徒生命的践履:傅氏之来华工作绝非教会差派之教士,自1865年后与圣公会更无从属关系。(41)是以傅氏之热心于中国,对国人并无歧视态度,凡事安分守己,尽其所能,贡献于中国社会,实基于信徒内在信仰的实践。傅氏之成就,足以说明信徒对社会归属,对中国认同而有的表现。换言之,处于变动的时局中,信徒以其所具才智服务于人群,贡献于社会,自当有益于国家的进步。是以从傅氏之表现来看,实反映信徒对社会国家应有的责任,较之神职教士之参与尤有效益,影响更大。

(二)中国现代化之推行:要使国家现代化并非只重理论而无实际,傅氏之在华,事实以生命投身于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中,其着重之三点足以作为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借镜。第一着重科技:科技是中国推进现代化最弱的一环,科技之落伍自难谈得上现代化。而“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之事,不只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上着力关注,更需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所协调,有所配合,才能使社会整体层次步上现代化之途。第二着重翻译:论及现代化,西方欧美国家实较我国先进,对于科技以及其他的科学,我们固然要有敏感的触角,并且以最快速的时间,将西方先进国家的发明和发现、最新的主张和理论作出正确的翻译,使各种进步的信息传播于社会,国民受到新知自然有所启发,继而亦有新发明。由此推知,国家设立各种的编译馆都是促进现代化的必要机构。第三着重教育:整体国民所受的教育与国家现代化的程度成正比例,而教育的成绩不只以高等教育作为重点教育,而应普及中小学的基层教育。至于各类型和等级的教育,在教学的课程上都必须有所关连,有所衔接,使社会群体发生共鸣,国家才能积极推行现代化。

注 释

- (1)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262.
- (2) 参见本文附表。
- (3) Adrian Arthur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2.
- (4) Jonathan Spence, *The China Helpers,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London, Sydney, Toronto, The Bodley Head, 1969) p. 140—160.
- (5) 参见(3), p. 67—68.
- (6) 香港圣保罗书院档案室现存傅兰雅于1927—1928年致该院之圣诞及新年贺片一张。
- (7) 参见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 世华出版社, 1975年, 第1—55页。
- (8) 参见戈公振撰《外资经营的中文报刊》, 载于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初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57年, 第66—67页。
- (9) 参见张玉法撰《近代中国书报录》(1811—1913), 载于《新闻学研究》第七集, 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 1971年, 第294页。
- (10) 参见陈耀南著《魏源研究》, 香港, 乾惕书室, 1979年, 第186—189页。
- (11) 参加《遐迩贯珍》, 1856年5月1日, 第5号《遐迩贯珍告止序》。

- (12) 见李志刚撰《西教士与洋务运动缘起之关系》，载于《世界华学季刊》第五卷，第二期，台湾，1984年6月第1—14页。
- (13) 引用(7)，第20页。
- (14)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p. 153—169。
- (15) San - pao Li (李三宝): *Letters to the Editor in John Fryer's Chinese Magazine, 1876—1892, An Analysis*. 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下册，台北，1974年，第771—772页。
- (16) 参见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5页。
- (17) 参见(16)，第6—7页。
- (18) 引《申报》，大清同治甲戌十月初三日，第780号，第2—3页。
- (19) 参见《万国公报》第三册，台北文华书局影印本，第1558—1564页，第1590—1598页。又，Knight Biggerstaff,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hinese*. 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2) 1965, p.135—137。
- (20) 参见朱有璩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88—193页。又，参见(16)，第42—48页。
- (21) 参见(16)，第53—54页。
- (22) 引用(16)，第90页。
- (23) 参见(9)，第301—308页。
- (24) 转引(16)，第35页。

- (25) 参见(16), 第 32 页。
- (26) 参见(15), 第 772 页。
- (27) 参见(15), 第 772—776 页。
- (28) Alexander Wylie, "Appendix: Catalogul of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p. 20—26。
- (29) 参见马祖毅著《中国翻译简史》,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 第 233 页。
- (30) 转引(29), 第 233 页。
- (31) 转引(29), 第 233—234 页。
- (32) 参见王树槐撰《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 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一期, 台北, 1969 年, 第 55—56 页。
- (33) 转引刘勇坚编辑《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 第 54 页。
- (34) 参见(3), p. 72。
- (35) 参见(4), p. 146。
- (36) 参见王树槐撰《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 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期, 台北, 1971 年, 第 368—371 页。
- (37) Irwin T. Hyatt, Jr.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 1877—1890: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 in Kwang—Ching Liu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01—102。
- (38) 参见(35), 第 381 页。

(39)参(3), p. 68。

(40)参见(3), p. 70—71。

(41)参见(1)。

傅兰雅译著一览表

自然科学——物理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声学	徐建寅	八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三年 (1874)	
2	电学	徐建寅	十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五年 (1879)	
3	格物图说(体性图说)				光绪十一年 (1885)	
4	重学图说			益智书会	光绪十一年 (1885)	
5	气学须知				光绪十二年 (1886)	
6	声学须知				光绪十三年 (1887)	
7	电学图说			益智书会	光绪十三年 (1887)	
8	电学须知				光绪十三年 (1887)	
9	重学须知				光绪十五年 (1889)	
10	力学须知				光绪十五年 (1889)	
11	光学须知				光绪十六年 (1890)	
12	热学图说			益智书会	光绪十六年 (1890)	
13	水学图说		二卷	益智书会	光绪十六年 (1890)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4	水学须知				光绪十七年 (1891)	
15	热学须知				光绪二十年 (1894)	
16	电学纲目	周郁雨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 (1894前)	
17	物体过热改 易记	徐寿	四卷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又名 《物质遇热 改本》
18	重学汇编	傅兰雅				
19	重学图说			益智书会	光绪十一年 (1885)	
20	摄铁气说	徐建寅		江南制造局		
21	光学图说			益智书会		
22	显微镜远镜 说			格致汇编本		
23	水学器气学 器			格致汇编本	附于《格致释 器》	

自然科学——数学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运规约指	徐建寅	三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年 (1871)	
2	代数学	华衡芳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二 年(1873)	
3	微积溯源	华衡芳	八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三 年(1874)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4	算式集要	江衡	四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三年 (1877)	
5	三角数理	华衡芳	十二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四年 (1878)	
6	数学理	赵元益	九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五年 (1879)	
7	代数难题解 决	华衡芳	十六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五年 (1879)	
8	代数须知				光绪十三年 (1887)	
9	画法须知				光绪十三年 (1887)	
10	微积须知				光绪十四年 (1888)	
11	曲线须知				光绪十四年 (1888)	
12	三角须知				光绪十四年 (1888)	
13	格致书院西 学课程数学 课题	傅兰雅			光绪二十年 (1895)	
14	决疑数学	华衡芳	十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 (1897)	
15	算式解法	华衡芳	十四卷			
16	周髀知裁	徐寿		江南制造局		附于《西 艺知新》
17	质数证明	徐寿		江南制造局		
18	奈端数理	李善兰		江南制造局		即牛頓 名著《自 然的哲学 原理》

自然科学——化学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化学鉴原	徐寿	八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年 (1871)	
2	化学分原	徐建寅	八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年 (1871)	
3	化学鉴原续编	徐寿	二十四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一年 (1875)	
4	化学鉴原补编	徐寿	六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六年 (1880后)	
5	化学考质	徐寿	八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六年 (1880后)	
6	化学求数	徐寿	十五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六年 (1880后)	
7	化学须知	傅兰雅撰			光绪十二年 (1886)	
8	化学卫生论	乐学谦	四卷	格致汇编本	光绪六至七年 (1880 - 1881)	
9	化学易知			益智书会	光绪六年 (1880)	
10	化学器		二卷	格致汇编本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前)	

自然科学——地质学 地理学 天文学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测候器说	江衡	一卷		光绪六年 (1880)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2	地志须知				光绪八年 (1882)	
3	地理须知				光绪九年 (1883)	
4	地学须知				光绪九年 (1883)	
5	矿石图说			益智书会	光绪十年 (1884)	
6	天文须知				光绪十三年 (1887)	
7	矿学须知				光绪十九年 (1893)	
8	恒星经纬表	贾步纬		江南制造局		
9	风雨表说	华衡芳		江南制造局		
10	燥湿表说	徐寿		江南制造局		
11	地学稽古论			格致汇编本		

自然科学——植物学 动物学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植物须知				光绪二十年 (1894)	
2	动物须知				光绪二十年 (1894)	
3	植物图说		四卷	益智书会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前)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4	植物利用			益智书会		
5	西国名菜嘉花论			格致汇编本		
6	虫学论略			格致汇编本		

自然科学——绘图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画形图说			益智书会	光绪十一年 (1885)	
2	画器须知				光绪十四年 (1888)	

自然科学——生理学 解剖学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全体须知				光绪二十年 (1894)	

其它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西体须知				光绪十一年 (1885)	
2	戒体须知	傅兰雅			光绪十二年 (1886)	

自然学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人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重学水学气 学器说		一卷		光绪二十年 (1894)	
2	格致须知	傅兰雅	三集		光绪前刊行	
3	格致略论	傅兰雅				
4	格致释器			格致汇编本		

应用科学——制造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人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制火药法	丁树棠	三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年 (1871)	
2	开煤要法	王德均	十二 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年 (1871)	
3	器家显真	徐建寅	四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一年 (1872)	
4	汽机必以	徐建寅	十二 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一年 (1872)	
5	冶金录	赵元益	三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二年 (1873)	
6	傅兰雅历览 记略	徐寿			同治十二年 (1873)	
7	铎板印刷	江衡	四卷		光绪二年 (1876)	附《测地 绘图》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8	西艺知新	徐寿	二十二卷		光绪三年(1877)	
9	造铁金法	徐建寅	四卷		光绪六年(1880)	
10	宝藏兴马	徐寿	十二册	江南制造局	光绪六年(1880)	
11	电器镀金略	周郁雨		江南制造局	光绪六年(1880, 1-9月)	
12	银矿指南	应祖锡	一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十七年(1891)	
13	兵船汽机	华备钰	六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	
14	电器度镍	徐华封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	
15	化学工艺	汪振声	四卷		光绪二十四年(1898)	
16	开矿器法图说	王树善	十卷		光绪二十五年(1899)	
17	美国铁路汇考	潘松	十三卷		光绪二十五年(1899)	
18	铸金论略	黄宗宪	六卷		光绪二十八年(1902)	
19	照相干片法	傅兰雅		格致汇编本	光绪十三年(1887)	
20	照相略法	傅兰雅		格致汇编本		
21	汽机尺寸	徐建寅		江南制造局		
22	造汽机等手工	徐寿		江南制造局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23	纺织机器图说			格致汇编本		
24	矿工辑要论			格致汇编本		
25	金石略辨			益智书会		
26	实验铁煤法	徐寿		江南制造局		
27	新式汽机图说			格致汇编本		
28	工程机器器具图说	傅兰雅				
29	西国写字机器图说					附《西学通考》
30	照相器			格致汇编本		
31	西灯说略			格致汇编本		
32	西国造纸法			格致汇编本		
33	灭火器说略			格致汇编本		
34	泰西工艺			益智书会		
35	造指南针法	徐寿		江南制造局		
36	造橡皮法	徐寿		江南制造局		

应用科学——工程 测量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人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汽机新制	徐建寅	八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二年 (1873)	
2	海塘辑要	赵元益	十卷	江南制造局		
3	测地绘图	徐寿	十一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年 (1876)	
4	井矿工程	赵元益	三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五年 (1879)	
5	造船全法	徐建寅		江南制造局	光绪六年 (1880)	
6	考试司机	徐华封	七卷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前)	
7	工程致富论略	钟天纬	二册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前)	
8	考土记要	钟天纬	十二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 (1894年)	
9	艺器记殊	徐建寅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后)	
10	工艺准绳	徐家宝		江南制造局		
11	测绘海图全法	赵元益	八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12	制机理法		八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13	西画初学			格致汇编本		
14	海面测绘	黄宗宪		江南制造局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5	绘图测量诸器图说	赵元益		江南制造局		
16	绘画船线	徐建寅		江南制造局		
17	火车铁路略论			格致汇编本		

应用科学——医药 卫生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儒门医学	赵元益	三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年(1076)	
2	西药大成	赵元益	十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五年—二十年(1079—1094)	
3	延年益寿论			格致汇编本	光绪十八年(1892)	
4	孩童卫生编			益智书会	光绪十九年(1893)	
5	幼童卫生编			益智书会		
6	法律医学	徐寿 赵元益	1-4卷 5-24卷		光绪二十五年(1899)	
7	通物电学	王季烈	四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五年(1899)	
8	全体图说	傅兰雅		益智书会	光绪十年(1884)	
9	脉表论病论			格致汇编本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0	泰西本草撮要			格致汇编本		《西药大成》节本
11	西药大成药名表	赵元益		江南制造局		
12	人与微生物争战论			格致汇编本		
13	人秉双性论			格致汇编本		
14	居宅卫生论			格致汇编本		
15	初学卫生论			益智书会		

应用科学——航海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大清同治十年岁次辛未航海通书	贾步纬			同治九年 (1870)	
2	大江图		五册		同治十三年 (1874)	附于《海道分图》
3	海道分图		十七册		同治十三年 (1874)	
4	海道图说	王德均	十五卷			附于《长江图说》
5	长江图说	王德均	一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三年 (1874)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6	大清光绪六年岁次庚辰航海通书	贾步纬			光绪五年(1879)	
7	行船免撞章程	钟天纬	一卷			
8	长江新图说	徐家宝		江南制造局		

应用科学——农业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农务要书简 明目录	王树善			光绪二十七年(1901)	
2	农务化学简 法	王树善	三卷		光绪二十九年(1903)	
3	农事略论			格致汇编本		
4	西国漂染棉 布论			格致汇编本		
5	种蔗制糖论 略			格致汇编本		
6	西国养蜂法			格致汇编本		

应用科学——其它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美国博物大 会图说	傅兰雅		格致汇编本	光绪十八年(1892)	
2	铸钱工艺	钟天纬	三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1894前)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3	治心免病法		二卷	益智书会		
4	意大利蚕书	约翰 傅兰雅 王树善			光绪二十四 年(1898)	
5	求矿指南	潘松	十卷			
6	铸钱论略	汪振声		江南制造局		
7	历览纪略	徐寿		格致汇编本		

军事科学——炮术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水师操练	徐建寅	十八 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一年 (1872)	
2	格林炮操法	徐建寅	一册		同治十三年 (1874?)	
3	炮甲合论	徐建寅	六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六年 (1880年前)	
4	西炮说略			格致汇编本		
5	回特活德铜 炮说	徐寿		江南制造局		
6	水药机器	徐寿		格致汇编本		
7	炮与铁甲论	徐建寅		江南制造局		

军事科学——防御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防海新论	华衡芳	十八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三年 (1874)	
2	营城揭要	徐建寅	三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年 (1876)	
3	营工要览	汪振声	四卷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后)	
4	轮船布阵	徐建寅	十二卷		同治十二年 (1873)	
5	船坞论略	钟天纬		江南制造局		
6	造船全法	徐建寅		江南制造局		
7	西船略论			格致汇编本		
8	西国兵制源流	范本礼		江南制造局		
9	陆军战法	范本礼		江南制造局		
10	海军水雷法	华衡芳		江南制造局		

军事科学——其它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行军测绘	赵元益	十卷	江南制造局	同治十二年 (1873)	
2	开地道轰药法	汪振声	三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十九年 (1893)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3	西国陆军制考略	范本礼	八卷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后)	
4	行军铁路工程	汪振声	二卷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前)	
5	英国水师考	钟天纬	二册?	江南制造局		
6	俄国水师考		一册?			
7	美国水师考	钟天纬	一册?	江南制造局		

历史及社会科学——法律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各国交涉之法论	俞世爵			光绪二十年 (1894)	
2	公法总论	汪振声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前)	
3	各国交涉便法论	钱国祥	六卷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后)	
4	邦交公法新论	程瞻洛	五卷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5	比国考察罪犯记略			格致汇编本		
6	西法洗冤录	赵元益		江南制造局		

历史及社会科学——历史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俄国新志	潘松		江南制造局		
2	法国新志	潘松		江南制造局		
3	年代表	徐建寅		江南制造局		

历史及社会科学——政治经济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富国须知				光绪十八年 (1892)	

历史及社会科学——政府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佐治刍言		三册	江南制造局	光绪十一年 (1885)	

历史及社会科学——其它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保富述要	徐家宝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后)	
2	国政贸易相关书		三卷	江南制造局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后)	
3	美国加邦大书院图说	傅兰雅			光绪二十六年 (1900)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4	教育警人理 法论	傅兰雅		时中书局	宣统三年 (1911)	
5	译书事略			格致汇编本		

字典

编号	译著书名	合译者	卷数	出版	日期	备注
1	化学材料中 西名目表			江南制造局	光绪十一年 (1885)	
2	西药大成药 品中西名目 表				光绪二十三年 (1887)	
3	金石中西名 目表				光绪十五年 (1889)	
4	汽机中西名 目表				光绪十五年 (1889)	

说明：一、本表所列书目采自：Adrian Arthur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王尔敏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朱振华撰《傅兰雅与西学东渐》(载《南开史学》1984年第2期)。

二、本表分类采用 Adrian Arthur Bennett 之分类法。

林则徐禁烟与澳门基督教士关系初探

一、引言

满清政府推行禁烟于 1729 年已有颁令,至 1780 年皇帝下诏禁食鸦片,再申禁止贩卖鸦片。(1)其后虽则三令五申,但鸦片走私,烟商贩卖遍及全国,迨至道光年间,鸦片问题日益严重。道光十六年有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2),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重典严禁鸦片贩卖(3),形成“弛禁”与“严禁”两派争端的对峙。黄爵滋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1838 年 6 月 2 日)上奏《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尤是引发朝野鸦片问题严重性之认识。林则徐时为湖广总督,对黄爵滋主张极表支持,在两湖收缴民间烟土烟枪,甚有成效(4);八月奏陈鸦片与银价关系,获道光帝赏识,谕旨晋京朝覲;十一月召见八次,颁发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5)。

林则徐于 1839 年 3 月 10 日到达广州,随即进行禁烟工作,与外国洋商周旋。1840 年 2 月 6 日就任两广总督,其后为琦善构言。林氏留粤以备查问差委(6),琦善于 11 月 29 日抵穗履任。故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运动,为期不过一年零八个月。其间林氏以广州为督轅所在,于 1839 年 8 月 23~24 日抵澳门巡阅,禁烟运

动与澳门实有直接关系。按葡人于 1535 年在澳门开埠,以后为欧美外商聚居之所。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约束外商五事:

(一)夷商在省住冬,永行禁止,夷船向系五六月收泊进口,九十月扬帆归国,即间有因事住冬,于洋船出口后,即往澳门寄住。

(二)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历来夷商到广贸易,向系寓歇行商馆内,原属事有专责。

(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汉人役使并应查禁。

(四)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宜永除。

(五)夷船收泊处所应请酌拨管员,弹压稽查。(7)

其后对外商颁布九条禁例:(一)外洋战舰不得驶进虎门水道;(二)妇女不得携入夷馆,一切凶械器亦不许携带来省;(三)公行不得负欠外商债务;(四)外人不得雇用汉人婢仆;(五)外人不得乘轿;(六)外人不得乘船游河;(七)外人不得申诉大府,事无大小有需申诉者亦必经行商转递;(八)在公行所有之夷馆内寓居之外人须受行商管束,购买货物须经行商之手,尔后外人不得随时自由出入,以免与汉奸结交私货;(九)通商期间过后,外商不得在省住冬,即在通商期间内,如货物购齐及已卖清,便须随同原船回国,否则亦须前往澳门居住。(8)由上述禁令可知,外商在广州活动有很多限制,妇孺既不能入住广州,而一般外商有半年时间必须撤离中国,澳门遂变为外商定居之地。

自乾隆以来,外国输入鸦片不断增加,造成中国严重的银荒,继而产生“商业停滞”、“农村衰落”、“财政支绌”等问题(9),闽粤海口有男女幼童被贩卖外洋,人口拐带和“猪仔”贩卖亦因此形成(10)。中国商民为图厚利,云南、广西、贵州、浙江各地均有罂粟种植(11)。有关鸦片输入,除南洋入粤水路外,亦由云南、广西陆路运销内地(12)。至于贩卖鸦片之外商,英国、美国、葡国、荷兰固然

有之，而远在西北之克什米尔、巴达克山、音底等部落亦有运入，以谋暴利(13)。林则徐禁烟专以英商为对象，显然由于英商输入为大宗，而澳门可谓其烟贩聚居的渊藪，据宣宗实录载，林则徐奏谓：

“巡阅澳门，抽查华洋户口情形一折，澳门为洋商聚集之所，洋楼囤贮烟土久成弊藪，悉此查办之时，必当于该处先清其源，方为尽善。该大臣等既委该地方官查明华洋户口，复由香山统领将备，整队出关，宣布恩威，申明禁令，并查西洋洋楼，现无存贮烟土，办理甚属妥协。惟该处华洋丛杂，保甲之法，难以施之洋人。且由同知县丞每岁编查，恐有名无实，易滋流弊。至督抚两司分年轮往抽查之处，亦涉烦琐。其应加何立定章程，以清弊窦而垂久远。”(14)

林则徐于 1839 年 5 月 2 日下令扣留 16 名贩烟夷商，以英人较多，而此 16 名夷商所属公司，均以澳门为基地。(15)《信及录》及《林则徐公牍》所载林氏之禁烟文书，多有涉及澳门之夷情。是故若论林则徐禁烟运动，则不能忽略澳门与夷商贩烟的关系。

二、基督教士在澳门之活动及外商贩卖鸦片之关系

明代天主教士东来传教，先抵澳门然后进入中国。1807 年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前往广州，从事翻译《圣经》工作，(16)因清廷禁教，外人不能在广州立足，遂退居澳门学习中国语文，至 1809 年受

聘英属东印度公司为译员,才得在广州、澳门两地活动。马礼逊除一度返英休假,至1834年8月1日病逝广州,在华服务计25年之久,这25年均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其所谓传教者,只是公余之暇翻译《圣经》及撰述书报。东印度公司之对华贸易,实以贩卖鸦片为大宗,马礼逊只属公司译员,在公司决策上并非重要角色。

据《中华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十二卷及第二十卷刊载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名表分析(17),来华服务教士共有64人,而1839~1840年在澳门之教士只有12人,分属伦敦传道会、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亦译美国海外宣教会)、浸信会(The Board of the Baptist Triennial Convention)、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医药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也有个人自由传道者。这12位教士是:

1. 郭士立牧师(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德国人,自由传道,1831年进入中国境内传教。
2. 裨治文牧师(Rev. 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国人,美部会,1830年到达广州。
3. 雅裨理牧师(Rev. David Abeel):美国人,美部会,1839年抵澳门。
4. 卫三畏教士(Mr. Samuel Wells Williams):美国人,美部会,1833年抵广州。
5. 伯驾牧师(Rev. Peter Parker):美国人,美部会,1835年到广州。
6. 叔末士牧师(Rev. Jehu Lewis Shuck):美国人,浸信会,1836年抵澳门。
7. 罗孝全牧师(Rev. Issachar Jacox Roberts):美国人,浸信会,1837年抵澳门。
8. 雒魏林医生(Dr. William Lockhart):英国人,伦敦传道会,

1839年抵澳门。

9. 勃朗牧师 (Rev. Samuel Robbins Brown): 美国人, 马礼逊教育协会, 1839年抵澳门。
10. 美魏茶牧师 (Rev. William Charles Milne): 英国人, 伦敦传道会, 1839年抵澳门。
11. 合信医生 (Dr. Benjamin Hobson): 英国人, 伦敦传道会, 1839年抵澳门。
12. 戴华尔医生 (Dr. William Beck Diver): 美国人, 美部会, 1839年抵澳门。(18)

由美部会派遣来广州服务的教士, 是以出版书刊及医药传道为主, 而美部会早期来华教士受美国商人奥利芬特 (D. W. C. Olyphant) 支助, 奥氏为美国公理会虔诚教徒, 奥利芬特与塔尔博 (Talbot) 在广州组织之“塔尔博·奥利芬特公司” (Talbot, Olyphant & Co.) 是当时广州美国商行中唯一不贩卖鸦片之公司, 因此奥氏有“顽石不灵” (Zions Corner) 之绰号。(19) 浸信会叔末士牧师及罗孝全牧师在澳门专向华人传道为事。勃朗牧师应聘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 于1839年2月抵澳门主理马礼逊纪念学校。伦敦传道会自马礼逊病逝后, 至1839年始派雒魏林医生、美魏茶牧师、合信医生相继东来, 除雒魏林医生及合信医生协助医药传道会在广州、澳门工作外, 美魏茶牧师未能展开传教工作。从各早期教士所属传道机构之背景来看, 与协助外商贩卖鸦片实无根据。

对于曾在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and Co.) 工作, 并曾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 (Charles Elliot) 译官的郭士立争议最多。郭氏先于1826年为荷兰传道会 (The Netherland Missionary Society) 遣往爪哇巴达维亚城 (Batavia, 今称雅加达) 求学之时, 因受马礼逊鼓励, 对中国传教素为向往, 1828年曾抵曼谷宣道, 其间入籍福建同安郭氏宗祠, 受名郭实猎 (Kwo Shik - lee) (20), 1829

年脱离荷兰传道会,至 1851 年病逝香港,均未受职任何传道会。郭氏富有语言天赋,在南洋已经通晓华语及闽南方言,于 1831 年 6 月 3 日乘中国帆船,以回乡祭祖为名,沿中国南海北上福建同安,继而北上天津、远东一带游历,顺道派发传教书册,藉此接触各省人民,故郭氏可谓深入中国境内传教的第一位基督教士。同年 12 月 12 日郭氏返抵澳门,即为东印度公司邀聘,随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乘罗尔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北上,充当鸦片贩卖传译。郭氏对此职务本多考虑,但因东印度公司附有准予其私人从事宣教工作,权宜下才接任邀聘,1832 年 2 月 27 日起程,途径厦门、台湾、福州、高丽、琉球等地,进行贸易,探察内地情报,暇时郭氏则不忘传教工作,9 月 5 日返回澳门。不久东印度公司将有“气仙号”(Sylph)与“耶米锡纳号”(Jamesina)起航,诚邀郭氏协助,直驶奉天,为朝廷获悉,旋颁令禁止,于是折回上海,再往舟山、金门、厦门,于 1833 年 4 月 29 日返抵澳门。同年 5 月至翌年 3 月间,郭氏亦为“约翰·碧嘉号”(John Bigger)及“杨上校号”(Coloney Young)入福建充任鸦片船之传译工作;4 月南下马六甲撰写《中国沿岸三次游历记》(The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此书出版后引起欧美各界对中国之关注。1834 年 8 月 1 日马礼逊病逝,郭氏旋被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聘为译官,常随英方官员与中国进行交涉,多次远赴高丽、日本,协助英方刺探各地情势,是以郭氏亦为高丽、日本基督教之先导。

1834 年 6 月郭氏偕夫人汪施娣(Mary Wanstall)定居澳门。郭夫人原为伦敦传道会派往马六甲英华书院之教师,于翌年 9 月在澳门开设女校,招收女生十人;而马礼逊教育协会倡办之马礼逊纪念学校亦附设女校之内,首招男生两人,其中一人为容闳(22)。郭夫人开设之女校,以及附设之马礼逊纪念学校,实为基督教在澳

门所办之西式学校,课程包括英文、《圣经》、地理、历史、中国文学等科目,以传授西方近代知识为主。郭士立公余之暇兼教中国语文,管教学生甚为严谨(23)。郭氏尝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后迁新加坡,至1838年停刊。郭氏曾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上著文劝告中国人民戒食鸦片,故其参与英商贩卖鸦片之传译,是非功过都不应为之掩饰。郭氏在林则徐推行禁烟运动期间曾随义律奔走各地,作英方通事。(24)

自裨治文牧师于1830年抵粤,至林则徐进行禁烟,英美在华基督教士,除郭士立外,其余教士与贩卖鸦片的活动均无关系,是可定论的。

三、林则徐禁烟与澳门基督教士之接触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正月二十五日)抵广州就任钦差大臣,翌日出示慎密关防,并择期收受各海口之呈禀。林则徐进行禁烟,先以广东贩卖鸦片华商及参与鸦片活动之官员为查禁对象,着令一千人等于两月内交出鸦片及烟枪。至5月12日已拘捕1600名吸烟违禁者,没收28845斤烟土,42741枝烟枪。3月18日发出谕帖饬令外商呈缴鸦片(25)“限三日内取结禀覆”,此为清朝官方首次对外国商人直接发出之公文(26)。三日后,仍未见外商有缴交鸦片行动,22日即下令逮捕英国烟贩颠地(Lancelot Dent),以惩首恶(27)。在林则徐发出禁烟谕帖之际,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仍在澳门采观望态度,及至颠地被捕,深觉事态严重,旋赴广州图谋营救(28)。林则徐继而在黄埔港实行封舱,派兵包围商馆(夷馆),切断食物供应。义律终于3月27日递禀允缴鸦片20383箱。4月9日林则徐下令外商出具不带鸦片切结,翌日偕邓廷桢亲赴虎门验缴鸦片。在林则徐未赴虎门之前,曾遣裨治文之

学生梁进德往澳门邀请裨治文赴广州相见，林氏请裨治文带函给义律(29)，转呈英女王，请求禁止种植罂粟、制造鸦片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林则徐此函实属中国官方首次呈函外国元首之创举。按该函谓：

“照得天道无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远，孰非恶杀而为生。贵国在重洋二万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于死生利害者也。以天朝四海为家，大皇帝如天之仁，无所不履，而遐荒绝域，亦在并生并育之中。广东自开海禁以来，流通贸易，凡以内地民人与外来番船相安于乐利者，数十年于兹矣！且于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天朝一视同仁，许其贩卖出洋，决不断惜，无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为心也。乃有一种奸夷，制造鸦片烟，夹带贩卖，诱惑愚民，以善其身，以谋其利。从前吸食尚少，近则互相传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蕃昌，虽在此等愚民，贪口腹而戕其生，亦属孽由自取，何必为之爱惜。然以大清一统天下，务在端风俗以正人心，岂肯使海内生民，尽甘心鸩毒。是以现将内地贩卖鸦片并吸食之人，一体严行治罪，永绝流传。惟思此等毒物，系贵国所属各部落内鬼蜮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贵国王令其制卖。但各国之中，亦只数国制造此物，并非诸国皆然。稔闻贵国不准人民吸食，犯者必惩，自系知其害人，故特为之厉禁。然禁其吸食，何如禁其贩卖，并禁其制造，乃清源之道。若自不食，而仍敢制造贩卖，引诱内地愚民，则是欲己之生而陷人之死，欲己之利而贻人以害，此皆人情之所痛恨，天道之所不容，以天朝力震华夷，何难立制其命？而仰体圣明宽大，自宜告戎于先。且从前未有公文移会贵国王，一律

严禁则犹得诿为不知。今与贵国王约，将此害人之鸦片永远断绝。我内地禁人吸食，贵国禁人制造，其从前已经造作者，贵国立即颁行搜尽投之海底，断不许天地间更有毒物，非独内地民人不受其害，即贵国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果并造作而禁之，则该国亦不受其害，岂不各享太平之福，益昭贵国恭顺之忱。如此，则明于天理，而上不致降灾，协乎人情，即物亦能感化。况内地既经严禁，无使吸食，即使该国制造，终亦无处可卖，无利可图。与其亏本徒劳，何不改图别业。况内地搜出鸦片，尽行付火油烧毁，再有夷船夹带鸦片前来，不能不一体烧毁。恐船内所载他货，难免玉石俱焚，是利不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也。天朝之所以巨服万国者，正有不测之神威，毋谓言之不早也。贵国之接到此文，即将各海口缘由速行移覆，幸勿谎饰支延。道光十九年二月日。”(30)

裨治文对于林则徐之要求加以婉拒，但将此照会在 1839 年 5 月之《中华丛报》上译载刊登(31)，其意义与转呈英女皇无异。林则徐在虎门主持烧毁鸦片，曾邀裨治文前往观察。林氏五月初七日记有云：

“昨晚有咪利京夷等，向游击羊英科禀称，见有告示，奉旨销毁烟土，俾夷人共见共闻，伊等请来看视，当即传谕允准。今日巳刻，晾夷带其女眷与裨治文、弁邈等，同驾小船，由师船带至虎门，在池上看视化烟，并至厂前，以夷礼摘帽见，令员弁传谕训戒，犒赏食物而去。是日化公土一千六百箱。酉刻邓制军、奕楚江都护俱到，是夜在厂同饭，二鼓散回。”(32)

裨治文对林则徐此次焚毁鸦片，所表示之观感有谓：

“其全部工作进行中所凭藉之严谨与忠诚的程度，实远出于我们意想之外，我们无法想象世上可有比这个更见忠诚的执行的任何事业。”(33)

美部会伯驾是藉医药传教之医生，在 1835 年租得广州新豆栏街泰丰行三号一屋开设“博济医馆”，是为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式医院，开办后深得绅商官民信赖。林则徐到粤禁烟后，因患疝气病，尝托人请伯驾医理，竟获痊愈，对伯驾亦表嘉许。(34)伯驾于 1839 年 8 月至 1840 年 6 月 16 日仍得在广州行医。

在中英关系紧张之时，郭士立跟随义律为传译，郭夫人在澳门开设之女校及附设之马礼逊纪念学校亦告停办，并携三盲女童往马尼拉走避。(35)在义律拒交毆杀林维喜凶犯之后，林则徐于 8 月 25 日驱逐英人出澳，英人维魏林医生 9 月 7 日离澳赴巴达维亚(36)；而美魏茶牧师与合信医生则受庇于裨治文，分别在马礼逊纪念学校及医馆栖身(37)。故在林则徐禁烟期间，除郭士立、维魏林离境之外，其余十位教士均在澳门。

四、中英交涉之传译人员与基督教士办学之关系

林则徐禁烟前之中外关系，只属民间商业之交往，并无官方外交关系，一切商务多赖十三行行商处理，而通事则居中传译。至于外人在中国境内学习语文，华人严禁传授。英属东印度公司自 1715 年在广州设立商馆以来，对中国语文之翻译，以马礼逊最具

学力,先后出版之《华英字典》,为19世纪西方学者研究汉学之津梁。1834年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专利,马礼逊复受聘于英政府,充任驻华商务监督译员,履任不久即告离世,马氏之遗缺则改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及郭士立出任。鸦片战争期间,马儒翰属首席译官。按马儒翰之习中国语文,是于1827~1830年就读于其父亲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之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38)英华书院创办宗旨为:

“本院之设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二则举凡恒河外方各族,即中国、印支及中国东岸诸藩属之琉球、高丽、日本等民族,其就读于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语接受西欧文学及科学之造就。本院各项课程之设计,均本以和平传播基督教及东方一般文化之原则,冀以达致有效影响为目的。”(39)

汉学家亨特(William C. Hunter),美国商人,1825-1827年肄业于英华书院,其后任职广州旗昌洋行(Russel & Co.)。(40)当林则徐抵达广州时,亨特曾参与欢迎之列(41),在禁烟运动中,亨特亦助林则徐翻译澳门之西文报刊(42)。

在林则徐幕中曾助翻译之外国人有亨特、伯驾二人;华人则有袁德辉、梁进德等人。袁德辉、梁进德曾肄业于马六甲英华书院(43)。惟林氏在诸译员中,以梁进德至为亲信。梁进德乃梁发之长子,12岁在广州即随裨治文习英文(44),1834年10月梁发因在广州派发传教书册,为清吏追缉,幸裨治文及时营救,梁发偕进德逃离广州,安抵新加坡(45)。1835年梁进德回广州后,得裨治文照顾,并寄予厚望,极力授以高等教育,以期大成,将来从事中文《圣经》修订工作(46)。麦都思论及梁进德时,曾说:“他英文已经研究得很好了,同时并不荒废他的国文。他是一个沉静,谨慎和富于服务的青年。”(47)

由于梁进德匿居商馆,恐为官吏侦悉,故将梁进德送往马六甲

英华书院,与梁发相聚。梁进德随裨治文学习,计有八年之久,故外文程度甚优(48)。至于林则徐之信任梁进德,以及林则徐之能接触裨治文,实与裨治文梁进德二人关系有所牵连。迨至林则徐被撤职,调赴浙江,梁进德亦退居澳门翻译新闻报纸(49),未从琦善任事,足见梁进德对林氏之忠诚。在林则徐禁烟运动中,中英外交接触,英方由马礼逊之子马儒翰为译官,而中方则由梁发之子梁进德为翻译,两人均出身英华书院,同属教会中人,可谓历史之巧合。

五、林则徐对西方之认识与基督教士在澳门办报之关系

明季以还天主教耶稣会士由澳门进入中国,澳门成为中西交通孔道,诸耶稣会士在澳门出版之中外书刊为数不少,影响东西方至钜。(50)基督教士自马礼逊来华,澳门亦为基督教士出版中西书刊之据点。所出版之西文书刊则以介绍中国文化为主;而出版之中文报刊以宗教性者居多,其中亦有涉及西方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商业、风俗等引介。(51)

林则徐在粤禁烟,为对西方事物有所认识,常雇佣专人翻译英文书报,所译者有:

1. 《四洲志》:一卷,译自英人慕莱(Hugh Murray) *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36。

2. 《华事夷言》:一卷,译自英人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1836。

3. 《各国律例》:译自瑞士人滑达尔(Emeric deVattel)。

4. 澳门新闻纸 La Loi des Nations. 1785。

①《澳门杂录》: Canton Register, 周刊。

②《澳门新闻录》: Canton Press, 周刊。

5. 《澳门月报》: The Chinese Repository, 月刊。(52)

就林则徐进行翻译之书报所见, 当时澳门实为出版西文书刊的重要地方。《四洲志》及《各国律例》是由伯驾协助翻译的。所谓“澳门新闻纸”, 包括当时在澳门出版的《澳门杂录》与《澳门新闻录》。《澳门杂录》于 1827 年 11 月 8 日由美国报人吴特(William W. Wood)在广州创办之双周刊, 后改为周刊, 为中国第一份中文报刊。由吴特兼任采访、编辑、排字等工作, 印制机器则由怡和洋行三孖地臣(Alexander Matheson)借出, 后转让给马地臣(James Matheson)经营, 改由施赖德(John Slade)主笔, 马礼逊曾定期投稿, 以迄离世之年。《澳门杂录》是以报导商业经济、商业行情及中国官方布告为主。《澳门新闻录》于 1835 年 11 月 12 日在广州创办, 较多报道各国消息。《澳门杂录》及《澳门新闻录》于 1839 年均迁澳门出版。(53)《澳门月报》之创办, 起因于美部会派遣裨治文入粤传道, 1830 年, 裨治文抵达广州后, 与马礼逊等在广州组织“基督徒团契”(The Christian Union at Canton), 马氏首倡出版《中华丛报》, 后由奥利芬特在美募捐一套印刷机器赠予广州教士, 作为出版《中华丛报》之用, 至于出版经费则由奥氏补足, 故马礼逊、裨治文、奥利芬特可谓《中华丛报》之创办人。1833 年后卫三畏尤着力于《中华丛报》工作。《中华丛报》起先在广州秘密进行, 后为清吏查悉, 于 1836 年迁往澳门出版。《中华丛报》自 1832 年 5 月创刊至 1851 年 12 月停刊, 前后共 20 年, 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内容分为论说、书评、时事报导、宗教消息等项。(54)其类别与篇数如下:

类别:	篇数:	类别:	篇数:
1. 地理	63	2. 中国政府与政治	81

3. 财经与海陆军	17	4. 中国人民	47
5. 中国历史	33	6. 自然史	35
7. 科学、工艺与艺术	57	8. 游记	57
9. 语言文字	124	10. 商业	6
11. 船运	56	12. 鸦片	55
13. 广东、夷馆等	36	14. 中国对外关系	34
15. 中英关系	38	16. 中英战争	74
17. 香港	22	18. 中美关系	21
19. 日本、韩国等	24	20. 交趾支那半岛	21
21. 南洋群岛	36	22. 其他亚洲诸国	18
23. 异教	43	24. 传教	103
25. 教会医院	48	26. 修改《圣经》	40
27. 学会	31	28. 宗教	29
29. 传记	38	30. 其他	37 (55)

《中华丛报》主要撰稿人有：马礼逊 91 篇；马儒翰 85 篇；郭士立 51 篇；卫三畏 114 篇；裨治文 350 篇；显见裨治文、卫三畏至为着力。《中华丛报》稿文严谨，从宗教信仰立场出发，极力反对鸦片贸易，谴责烟贩，为中国政府禁烟运动作辩护。裨治文曾于林则徐禁烟时期，撰文《论鸦片事件的危机》(56)，指出鸦片为万恶之源，对英国大加指斥。王树槐教授在《卫三畏与中华丛刊》一文中指出：

“林则徐来广州后，即着人翻译西书西报，以窥测西人情势与舆论，而以翻译《中华丛刊》最多，辑为《澳门月报》。传教士反对鸦片的言论，自为林则徐所见。《澳门月报》中有《论禁烟》一文，记林则徐焚毁鸦片之前曾“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观看。惟时来观之夷人，撰为夷文数千言，以记其事，大意为天朝法令，足服人心。”此即裨治文所撰之文，林则徐禁烟态度之坚决，自与《中华丛刊》之言论

有关。(57)

四、结 论

林则徐于 1839 年 3 月 10 日抵广州展开禁烟工作,因琦善构陷,于翌年 10 月革职,在粤任事不过一年零 8 个月,惟禁烟运动乃林氏一生最为显著之政绩,由是引致国人对烟毒危害国民生计之认识,发起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抗争,故林氏实为中国近代史序幕关键性人物。究诸史实,当年外商贩卖鸦片,虽在广州进行交易,而澳门则为外商贩毒的渊藪,林氏有见及此,对澳门烟贩活动尤为关注,并到澳门巡阅肃清弊窦。因此不了解澳门外商之活动,则不能洞悉近代烟祸之由来,更无法探究林氏禁烟实情。然而澳门外人活动,常涉及基督教士之行止,每谓基督教士协助外商贩卖鸦片,以此卑劣行径达到宣教目的,此种言论实有偏颇,本文之申论亦在纠正此种错误观念。

林则徐到粤进行禁烟,主要严禁外商继续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以及本地人继续吸食鸦片自戕其身。就林氏与外人交涉过程所见,实非由于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凡事皆禁,凡外人皆反。在其处理禁烟政事及与教士接触中,“无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为心”,表明“天道无私,不容害人以利己”。其时外人之居广州、澳门两地者,以商人较众,基督教士只有 12 人。林则徐与裨治文接触,必然了解裨治文之背景,对其禁烟主张亦必认识,可见裨治文与贩烟绝无关系,才能获得信任。

林则徐对西方事物之认识,有赖基督教士出版之书报作为引介。各西方教士对于林氏之厉行禁烟固表支持,而对林氏正义人格更表推崇。(58)甚至参与英国事务的郭士立在他所著的《道光皇帝传》一书中对林氏亦表崇敬。(59)

注 释

- (1)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19—221.
- (2) 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1—3页。
- (3) 参见注(2)，卷二，4—9页。
- (4) 参见林崇墉撰《林则徐传》，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4月，216—232页。
- (5) 参见注(2)，卷五，16—17页。又《林则徐集·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6页。
- (6) 参见注(2)，卷十二，38—39页。
- (7) 参见《史料旬刊》第九期，《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207—310页。
- (8)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1) Vol. p. 69—71。又，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台湾，私立东海大学，1960年3月，76—77页。
- (9) 太平山人撰《道光朝银荒问题》，载《中和月刊论文选集》，第三辑，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印行，23—36页。
- (10) 参见《大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二，27—28页。
- (11) 参见注(10)，卷三百十八，19—20页；又，卷三百二十一，21—23页。
- (12) 参见注(10)，卷三百十九，13—14页。
- (13) 参见注(10)，卷三百二十九，31—32页。
- (14) 转引注(10)，卷三百二十六，7—8页。
- (15) 按16名烟贩为：颠地(L. Dent)；打打披坡(Dadabhoy)；

化林治(Framjee);轩拿厘(G. Chinnery);央顿(Andrew Jardine);央孖地臣(Alexander Matheson)三孖地臣(Donald Matheson);噫之皮(J. Jeejeebhoy);单耶厘(J. F. N. Daniell);士丹弗(Stanford);吗文治(Merwanjee);记连(J. C. Green);加士(Keasge);孖地臣(James Matheson);英记厘士(R. Inglis);依庇厘(Ilberry),以英人居多。参见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实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36页;又《信及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11月),90—91页。

(16) Richard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9) Vol II. p.403—404。

(17)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 p. 223; Vol XX p. 514 - 519。

(18) 见李志刚撰《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6月,第75—80页。

(19) Kenneth Scott Lat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p. 85—109。又,绍溪著《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第6页。

(20)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71。

(21) 参见注(17),卷二十,第511—521页。

(22)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1—7。

(23) 参见注(17),卷六,第237页。

- (24) 参见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实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41页。
- (25) 参见《信及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11月，第22—24页。
- (26) 参见注(1)，第259页。
- (27) 参见注(25)，第24—26页。
- (28) 参见注(8)，第249—250页。
- (29) 参见注(24)，第114—115页。
- (30) 转引梁廷楠著邵循正校注《夷氛闻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26—27页。
- (31) 参见注(17)，卷八，第9—12页。
- (32) 转引《林则徐集·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4月，第343页。
- (33) 转引注(4)，第321页。
- (34) 参见注(1)，卷八，第634—639页。按林则徐在博济医馆病案编号为6565号。
- (35) 参见注(22)，第8页。
- (36)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12.
- (37) 参见注(36)，第122—125页。
- (38)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93 - 194.
- (39) 转引注(18)，第204页。
- (40) 参见注(38)，第139页。
- (41) William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Shanghai, The Oriental Affairs, 1938) p. 83—84.
- (42) 参见注(4)，第343页。

- (43) 参见注(4), 第 343 页; 又, 注(17), 卷八, 第 77 页。
- (44) George Hunter McNeur, *China's First Preacher Liang A-fa*. (Shanghai,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1934.) p. 67—68。
- (45) 参见注(44), 第 73 页。
- (46) 参见注(44), 第 82 页。
- (47) 转引麦沾恩著胡簪云译《梁发传》, 香港, 基督教辅侨出版社, 1959 年 2 月, 第 81 页。
- (48) 参见注(44), 第 87 页。
- (49) 参见注(44), 第 90 页。
- (50) J. M. 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o*. (lisboa, de STVDIA, 1963.) p. 1—2。
- (51) 参见注(18), 第 185—191 页。
- (52) 参见杨国桢著《林则徐论考》,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3 月, 第 258—260 页。
- (53)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Shanghai, Kelly, Walsh, Limited, 1933) p. 27; 33. 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1917) p. 459。
- (54) 参见王树槐撰《卫三畏与中华丛报》, 载于《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 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 第 171—191 页。
- (55) 转引注(54), 第 178—180 页。
- (56) 见注(17), 第 1—8 页。
- (57) 转引注(54), 第 184 页。
- (58)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LL. D.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New York, G. p. Putman's Sons, 1889) p.

114 - 115. G. R. Williamson, *Memoir of the Rev. David Abeel, D. D.* p.183—184.

(59) Charles Gutzlaff, *The Life of Tao - 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52)p.159.

中国基督教徒对孙中山先生之认同新探

一、引 论

基督教的产生是始于教徒对耶稣的认信,藉著洗礼,遵守耶稣的教训,其后形成“三一教义”的信仰,教徒取得信仰共识,因而建立“圣徒相通”的团契生活。(1)因此论及基督教徒的“认同”,有纵横的关系:在纵的方面先有人与神交往关系,继而在横的方面才有人与人交往的关系。所以基督教徒对于人际的认同,是以对神的认同为基础,信徒交互的认同则属信仰生活的延续。(2)

基督教徒对人际的认同,非仅限于教会内部信徒的认同,更包括对整个人类的认同;因为基督教的认同观,包括人性认同、文化认同、批判性认同的三个层次。每当教徒承认神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神为人类的天父,此即认同普天下人类皆属神的儿女,进而认同人类存在的文化,并参与文化活动,承担文化的责任;此外更透过信仰的认知对文化作出批判,使人类除去罪恶回归上帝,文化得着新生,人类获得拯救。(3)

基督教徒对人际的认同,是以耶稣为效法的典范,按着耶稣的教训过彼此相爱、患难与共、休戚相关、欢乐分享、共同服务热心捐输种种团契生活,促进生命的成长,为基督活出美好的见证。(4)

孙中山先生自 1883 年在香港受洗归信耶稣以后,自始至终表证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为中国人民从事革命工作,以期解救中国人民于水火。孙中山先生临终前曾说:“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5)

孙中山先生对神认同于上帝,对人则认同于中国人民,为尽国民责任,以革命方法,达成批判认同的目的。

二、孙中山先生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同

基督教徒入教,必须依照耶稣的吩咐接受洗礼,方能加入教会成为教徒。然而,教徒决志洗礼,必经内心思维的抉择,而对会众作出公开的认信。孙中山是 1883 年冬,在香港必列者士街二号美部会(今之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由喜嘉理牧师(Dr. Charles R. Hager)施洗,改名为日新(6)。孙中山信仰基督之意念,缘起于就读檀香山英国圣公会所设的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至 1883 年入美国公理会主办的奥厚书院(Ouhau College)升学,因有意受洗礼入教,被兄长孙眉遣回香山,使与教会隔离。返抵翠亨村后,孙中山为破除迷信及偶像崇拜,乃联同陆皓东折断北帝神像一臂,用小刀割断“金花夫人”手指,触怒乡人,大兴问罪之师,遂与陆皓东逃港走避。孙中山破除偶像之举,可说是信仰耶稣、敬拜独一真神的一种诚挚表现。陆皓东参与孙中山破除偶像行动,同年在香港美部会接受洗礼,可见他是受到孙中山信仰影响的第一人。

孙中山受洗后,热心信仰见证,对于传教工作至感兴趣,曾于 1884 年协助喜嘉理牧师到澳门、香山各地布道。兄长孙眉知悉孙中山受洗入教消息,特召孙中山先生再赴檀香山,托言委以生意经营,目的使孙中山先生断绝与教会的接触,但为孙中山拒绝。虽然孙眉以中断经济作为要胁,务使孙中山屈服就范,期间幸获芙兰谛

文牧师(Rev. Frank Damon)及众教友等筹集三百美金,孙中山始得返回香港,在中央书院(今之皇仁书院)继续学业。1886年孙中山在中央书院毕业,本有志入神学院就读,日后献身传教事业,只因其时广州并无一所完善的神学院,后由喜嘉理牧师荐入广州博济医院习医。喜嘉理牧师在《孙逸仙信教的追述》一文中记载:

“既抵檀岛,其兄胁迫禁阻之,又不予一钱,使无以为饘粥资,而竟不改其初志也。侨居之中华信徒,廉得其情,乃贖资遣之归国,学习传道科。盖彼时其传道之志,固甚坚也,倘向使当日香港及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核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辅助,孙中山先生迨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以其热忱毅力,必能吸引多数人归服基督,无如事不出此,蹉跎数月,而年龄加长矣!乃拟舍此而学医,以为传道而外,惟行医最能功于社会。余徇其请,为作介绍书与坎尔医学博士,且为说项减轻其学费,当时医学之费,全年只二十元矣!先生就学约二年余,复返香港,时香港医学堂已设,乃入而肄业焉。”(7)

孙中山自1887年10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由于西医书院毗邻为道济会堂(今之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故常从王煜初牧师学道,结交不少教会青年。而孙中山先生亦为教会活跃分子,曾于1891年3月27日创立少年会,称为“培道书室”,曾记载说:

“此会之设,所以杜渐防微,消邪伪于无形,培道德于有基业,集俊秀于一室,交游尽属淳良,备琴书于座右,器玩都成雅艺,从此耳濡目染,有不潜移默化,油焉奋兴,发其苗于沃壤,结实以百倍者乎。是晚为开创之夕,同贺盛

举，一时集者四十余人，皆教中俊秀。日叨从其列，喜逢千古未有之盛事。如知此会为教中少年之不可少者，望各省少年教友，亦有仿而行之，故不辞谫陋，谨书之以告同道。”(8)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越年孙中山由美赴英，10月11日被清吏诱入使馆囚禁，事起于孙中山前往教堂参加礼拜之故(9)，后为康德黎老师营救，幸免于难，不久致函区凤墀老师，表明虔诚祈祷，终蒙上帝拯救(10)。1896年孙中山应剑桥大学翟尔斯(Herbert Giles)之约所写的自传，文中说“教则崇耶稣”，实证孙中山先生早年对基督信仰的认同。

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但军阀割据，政局动荡不安。至五四运动发生，知识分子思想益加活跃，学说主义纷纭，反教言论盛行。蔡元培之“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尤其是反教先声。因为1922年4月4日在北京清华大学有“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而早在3月10日上海即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组织，3月21日北京亦有“非宗教同盟大会”的成立，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等人先后发表演说，引起各省市反教的风潮。在国民党人中，蔡元培、李石曾、朱执信、汪精卫等都是激烈反教的代表。孙中山先生对当时反教运动亦有意见：

“季龙等既有志于宗教救国，则正应对精卫等革命同志加以解释，同时亦应促起教会自身之注意，决计不作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则反基督教运动自可渐归平静，而基督教之真义，且因此次之运动已经唤起多人注意研究，反加明了，且予于前日亦尝以私人意见劝告精卫，君等何不同样为之。”(11)

又说：

“初时，予因从事革命，教会深恐连累，故不敢认识予，予非不认识教会也，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父、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而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礼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师闻道讲学，孰谓予非基督徒乎。惟中国亦有固有之文化，其数千年之礼教，根蒂已深，只以习俗相沿，驳杂不纯，亦有待于彻底整理。此项工作非常繁重。予一身既从事政治革命，不欲再分其心，然希望同志中有能为此工作者。庸之孔门之后，身受大学教育，又崇信基督教，季龙等既有志于宗教救国，予甚愿彼等对于中西文化礼教有所阐扬。”(12)

孙中山在反教运动期间除表明个人信仰外，更说到其亲属之信仰。因为孙中山岳丈为宋耀如牧师，宋氏家族早有教会信仰的传统。至于孙中山本身之原配及子女，据考证均在澳门浸信会受浸为基督教徒。按《澳门浸信会会友人名录》所载记录如下(13)：

册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施浸	入会	住址	职业	亲属	特别
	孙文师奶(中山)	香山	52	1911年4月14日		文第士街一号		孙科之母	子一人，女一人，谢北士牧师施浸；1952年9月7日上午1时35分魂归天府死
126	孙振	香山			1917年	东山陪正	学		
127	孙权	香山			1928年	东山陪正	1934年上海		

册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施浸	入会	住址	职业	亲属	特别
128	孙满	香山			1928年	东山陪正	学		
129	孙眉 师奶	香山 翠亨 村			1917年				嗜麻雀 于1938年3 月6日逝世,8 日出殡葬于澳 门西洋坟场 死
158	孙二姑				1915年 5月				
184	孙科	香山			1920年 6月6日	文第 士街 一号	政		古约翰牧师施 浸
185	孙陈氏 (淑英)	香山 茶园 村			1920年 6月	文第 士街 号			古约翰牧师施 浸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在大殓仪节上曾起极大争议,有人认为总理既为基督教信徒,应按基督教仪式成殓;也有人认为总理为革命领袖,不应受某一宗教利用。最后由汪精卫调解,依孙中山信仰,于3月19日在协和医院大礼堂举行祈祷会,然后将灵柩舁至中央公园社稷大殿灵堂安放举行国葬典礼(14)。由此可见国人对于孙中山的宗教信仰表示尊重,肯定他的基督徒地位。

三、基督教徒对孙中山先生信仰的认同

孙中山先生在求学的年代,不论是在檀香山得芙兰蒂文牧师及众教徒捐款协助返港续学,或是入广州博济医院学习,以及转学香港西医书院,均有教徒从中相助支持,足证孙中山有良好信德,获得教徒的认同。

对孙中山先生信仰的认知,当以喜嘉理牧师最为清楚。1911

年，喜嘉理在《美国公理会月刊》上发表《孙逸仙信教的追述》一文，诚为教徒撰写孙中山先生事迹的第一人。其中论及孙中山在奔走革命之时，在信仰上不变其志的情况：

“倏忽光阴又数年矣！天涯海角，音信阔疏，至 1904 年，始于旧金山重遇之，先生谓余曰：‘国中病疾已深矣！除推翻帝制外，别无挽救之法。’余解之曰：‘君曩者主张之改革，中国现已采行矣！先生雅不乐闻？’第曰：‘满清恶政府，必不可使复存。’同年冬季，余又遇之于纽约华人礼拜堂，形容枯瘁，畴昔英锐之气已销，然于基督教道，则复虔心如初，当时余职司募捐，将于香港建堂，承其介绍某君，即今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之戚畹也。嘱余往访，或能得其资助也。”(15)

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脱险后，其致香港道济会堂区凤墀长老一函，可谓教徒认同孙中山信仰的最佳明证。孙中山被囚清使馆，因祈祷得恢复自由之事件，影响教徒对孙中山的认知颇大，即如厦门基督教会许春草长老，深受孙中山蒙难时虔心之感动，故于 1907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日后成为厦门著名的革命党人。(16)孙中山先生所致区凤墀一函，属孙中山重要遗墨，更是基督教会珍贵的文献。此函原有上下款，区凤墀为避清廷之嫌，特去上下款，而平日亦不轻易出示于人，迨至革命成功，方赠礼贤会麦梅生长老保管。其时麦梅生任香港《大光报》主笔，于 1923 年在香港《大光报》第二期《基督号》上，将孙中山墨宝制成锌版发表，基督教浸信会出版之《真光杂志》于 1925 年 5 月亦借版刊登，并多印单张分赠各省教会，以作布道传单。(17)

上海著名《良友》画报，为岭南大学之基督教徒校友所创办，于 1926 年 11 月出版《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专载孙中山先生生平

事迹图片,其中刊有孙中山致区凤墀的函件及耶稣教联合会欢迎前大总统孙中山君合照,在说明上特别载明:

“先生为基督教徒,且信仰极诚,其伦敦脱险后致友之书,及逝世前亲囑廖仲恺夫人勿与基督教作难之语,与逝世后家祷时徐季龙所述先生之语,均是证明。先生初次回粤,基督教各教会联合开会欢迎。英法德美等国教士均到,颇极一时之盛。”(18)

特刊上还载有家属为孙中山先生逝世举行宗教仪式的图片,说明中有:

“先生为基督教徒,故逝世后家族特在协和堂举行宗教仪式之家祷。由朱有渔博士主礼,徐季龙先生述先生之宗教信仰。”(19)

《良友》画报出版《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目的在于见证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基督教徒,对孙中山先生的信仰表示认同。(20)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美部会受洗,香港基督教会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成就深以为荣。香港基督教联合会(今之“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于1941年出版香港基督教会史,在第七章个人传记中,则有《孙总理信奉基督教之经过》一文,以表香港教徒对孙中山先生的推崇。(21)孙中山先生原洗礼的美部会(公理堂),现在所属的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认为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贡献之伟大,实为教会之光,故于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决议在所属之上水堂筹建新堂之时,特将圣堂命名为“孙中山先生纪念堂”(22),营造工程于1986年4月11日落成举行奉献礼(23),可谓中国基督教会之

创举,足证基督徒对孙中山先生之怀念与景仰。

四、基督教徒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认同

孙中山先生对政治发生兴趣,应以在广州博济医院结交郑士良开始。郑士良,广东归善淡水墟人,及长即往省城德国礼贤学校修业,旋受洗为基督徒,毕业后入博济医院习医。郑士良任侠好义,结纳江湖中人,投入会党以反清复明为职志,自与孙中山同处一校,畅论国事,共商救国大计,郑氏实为孙中山先生革命同志的第一人。(24)至于孙中山革命思想受郑士良之影响,抑或郑士良之革命思想受孙中山之影响,确有考究的必要。因当时广州基督教已有革命思想的酝酿(25),孙中山亦必受到启发。1887年孙中山转读香港西医书院,由区凤墀引介陈少白结识孙中山,自属教会信徒的关系。(26)其后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结合为“四大寇”,孙中山之认识尤列、杨鹤龄是得陈少白介绍。(27)1892年香港有辅仁文社之发起,是以杨衢云、谢纘泰为领袖,二人皆为基督徒。由于尤列居中联络,孙中山得以结交杨衢云,1895年归并兴中会(28)。据冯自由之《革命逸史》,载有早期兴中会会员人名录,可考之教徒有:孙文、李多马、陈白(即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区凤墀、杨衢云、谢纘泰、黄咏商、朱贵、丘四、王质甫、左斗山、容星桥、赵明乐、史坚如、史古愚、史憬然、苏复生、李自重、邝华泰等,全属兴中会之骨干分子。(29)而支持兴中会友好之教徒有喜嘉利(按:即喜嘉理牧师)、喜约翰、何了然、杨襄甫、尤裕堂、廖翼鹏、尹文楷、康德黎、毛生、黄康卫、吴杰模、何启、关心焉、郑汉琪、江英华、王煜初、芙兰蒂文、威利士、菅原传、王韬、何汝铭、宋嘉树、廖

德山、梁乾初、香忞文等。(30)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先是得陆皓东在上海介绍认识宋耀如牧师,二人成为莫逆,由是孙中山大得宋耀如在经济上之援助,而宋耀如亦以秘密革命家身份参与孙中山之革命工作。因为宋耀如认同孙中山革命事业,二女宋庆龄自美国学成返国,得任孙中山之秘书进而结为夫妇,与宋耀如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有极大关系。(31)

1895年孙中山第一次在广州领导起义,事机外泄遭清吏搜捕,陆皓东、朱贵、丘四就义,陆皓东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32)。陆皓东可说是对孙中山由信仰认同,以至革命认同的一位挚友。而孙中山得逃离广州,亦有赖王煜初牧师及各教友之掩护,辗转由澳门前往香港,由香港而檀香山。(33)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是由孙中山、郑士良、杨衢云、史坚如等主力策动,此亦可称之为基督徒领导之运动。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事败牺牲。史坚如曾指出其革命思想来源谓:

“我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要为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原则而工作。”
(34)

史坚如是广州“格致书院”(Canton Christian College)之学生,学校备受牵连,随后迁址澳门,改名为“岭南学堂”(35)。其时基督教长老会所定岭南学堂之宗旨为:

“该种学校,要基于经济事实,商业管理常识,政治现状及社会认识。但必求其生息于想象力,对人类作广泛之了解与同情,以及充实学问,坚持信仰。

该种学校须具备获得英语知识为手段,并以基督教立场,面对各部门广泛学习西方知识。

基督大学(按:即格致书院)之目标,乃造就教育人才,从事牧师、教员、医生,以及其他人生历程中之使命,用以传授西方科学、医学以及宗教。”(36)

史坚如、陈少白、钟荣光均是岭南学堂学生,支持革命工作最力,可见岭南学堂不但是传授西方知识的教育场所,更是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影响近代中国甚巨。

1896年孙中山逃抵檀香山,芙兰谛文牧师建议在“寻真书院”(Mills School)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其后成立之“练兵会”,鼓励兴中会会员接受训练,足证教会牧师对孙中山革命之支持。(37)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因获芙兰谛文牧师及亲友之鼓励与帮助,于1904年3月14日取得“夏威夷土生证书”,以利进入美国从事革命宣传活动(38),遂于3月27日前往旧金山,保皇党党员向旧金山领事何佑告密,请通知美国海关阻止孙中山入境。3月31日美国海关以孙中山先生非夏威夷土生理由拒绝入境,并扣于木屋,后为基督教徒知悉,联络致公堂延聘律师营救,4月6日获保释;4月28日得美京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居留,应有美国公民居留权利。(39)孙中山在旧金山获教徒司徒南达、伍于衍、邝华泰、雷清学、邓干隆等礼待。孙中山为扩充革命组织,亦先从基督教徒着手,假旧金山华埠士作顿街长老会教堂召开“救国会议”,演说革命要义,并鼓励听众购买“革命军需债券”(40)。随后孙中山到美国各埠宣传,8月抵纽约,寄寓纽约第一华人长老会堂,为许芹牧师接待,旋联络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王宠惠到长老会堂首草《五权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public)(41),以英文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宣言(42)。许氏为美著名华人牧师,对孙中山革命向表赞助,纽约第一华人长老会堂成为中国革命党人活动之处。王宠惠是香港道济堂王煜初牧师第四子,在孙中山就读香港

西医书院之时相识,王宠惠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由美转往欧洲进修法学,经济上亦得孙中山相助(43)。王宠惠为牧师后人,虔信基督,对孙中山之信仰及革命事业素表认同,他在《恭读国父自述感言》中说:

“谨就平素阅读国父于民国纪元十五年,应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翟尔斯氏之请,所作自述一文,摘叙阐述,以显扬国父人格之伟大。

上开自述一文,虽只三百八十三字,而意义深长,尤其后段‘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数句,更是值得人人寻味。按此语,实融合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耶稣的教义在舍己救人,替人服役,所以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载有人生在世‘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之明训,且终殉难于十字架上,为人赎罪。至中国之汤武,乃伸张正义吊民伐罪的革命家,亦即视大众生命福利而冒险犯难的实行家。又美国之华盛顿,则主张人类自由平等,历经艰难,以谋脱离英国统治,建立独立民主之美国。是国父所信仰的,皆为图谋公众福利,不计个人生死之先哲。所以遗教常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以救国救民为志,于此可知国父信仰的正大,思想的正确。”(44)

孙中山在香港接受教育,在香港教会受洗信耶稣,在香港推动革命事业,香港基督教徒多予认同支持,除何启、王煜初、区凤墀、尹文楷、陆皓东、黄咏商、谢纘泰、容星桥、关景良等人外,在教徒商人方面,先施公司创办人马应彪(45)、广东银行创办人李煜堂(46)、联益建筑公司创办人林护等(47),均常协助革命党人运送枪械弹药,并大量捐款支持孙中山领导之革命工作,此外斥资在港创

办《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大光报》以助革命之宣传。至于此等教徒商人，日后在中国内地扩展业务，以“商战”救国，亦有赖孙中山在各省人事之联系(48)。香港教徒商人实业的发展，与孙中山革命运动确有密切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各地教徒有感共和政体有利于信仰自由，教会除举行大会为新民国祷告外，并呼吁教徒为新政府捐输军饷，以尽信徒义务，承认基督教与中华民国密不可分。1912年元月(辛亥年十一月)上海中国基督徒致孙大总统庆贺电文如下：

“南京大总统孙鉴：民国成立是上帝简其忠仆以成其旨，基督教徒不胜欢跃赞颂，敬于元宵开会祷祝，愿上帝锡佑，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49)

五、基督教徒对孙中山先生政治思想的认同

孙中山先生之政治思想应以他提倡的三民主义为最高成就。孙中山先生提述三民主义，先于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阐说三大主义：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公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

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种胥治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50)

孙中山早年所说三大主义，是以西方政治历史之演变作为立论。1919年虽有文言本三民主义出版，所述尤为简略。及至1924年1月27日在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作系统演讲，经出版后才成完整学说体系。由于孙中山逝世前的政治势力以广州为根据，三民主义理论极难广泛传播，民间社会更难有所认知。1922年中国学界引发的反教风潮，教会正疲于护教的应付，对于孙中山先生之政治理论则少有关心。至1927年2月始有徐松石《基督教道如何适应今日中国之需求》一文，论及今日中国需要民主精神，需要国家和国际主义，需要物质进步，指出基督教义与中国需要并不相背，而且基督教徒更可作出贡献。在其总结中有所谓“基督教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提倡救国的三民主义，我们查考基督教，也觉得非有真正的三民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基督教怎样解释三民主义呢？第一，在民权方面，我们要用基督教发展真正的民主精神。第二，在民族方面，我们要用基督教发展正当的国家和思想。第三，在民生方面，我们要用基督教改良物质的社会。我们该当感谢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不过我们该以基督教为实施的根据。”(51)

基督教徒对三民主义作系统研究，以1930年王治心所著《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一书最具代表性。王治心开宗明义地说：

“我是孙文的信徒，也与孙文同样做耶稣的门徒，觉得孙文的主张与耶稣的主张，不但没有丝毫的冲突，而且都是从耶稣的精神

中产生的。”(52)

王治心认为三民主义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即如:

民族主义——自由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平等
民生主义——博爱 (53)

他认为孙文主义是采各派社会主义的优点,以符合民治、民有、民享为宗旨,与各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所区别。而耶稣主义亦即:

自决
奋斗
自由 互助
耶稣主义——平等——救国救世
博爱 改造
无畏
牺牲 (54)

他认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耶稣一生的奋斗亦在于为人类争取精神的自由;民权主义是要求取消特权阶级,在民主中人人平等,耶稣要求人类信仰上帝为天父,则产生“人类弟兄主义”,人人彼此相爱达到平等;民生主义以博爱精神,实践“均分共享”,耶稣则主张勤劳做工,以达“凡物公用”的目的。所以王治心归纳说:

“总之,三民主义是孙文主义的中心,立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而自由平等博爱的最初倡导者,要算是耶稣,所以孙文主义就是耶稣主义,同用这样精神去达到救国救世的目的。”(55)

1970年章力生出版《孙文主义的神学基础》一书,强调孙中山思想是由“神道而入治道”(56),基督的道是超凡的启示,上帝的拯救,并不可以用自由、平等、博爱的道理相提并论,研究孙文主义,必须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上,才有可靠的依据。所以他认为要把孙文主义纳入神学上探究,方有清晰的了解。(57)

六、结 论

基督教徒之彼此认同,最终目的是要见证耶稣基督,传扬福音。(58)孙中山先生有见于此,故主张政教分离。(59)为免被宗教利用,有误革命事业,或是因革命事业而连累教会,是以在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已经绝迹教堂礼拜,而他所强调的,信奉基督不在于形式,而在精神,对举凡束缚之礼制教义,不表赞同。此外,他认为各国教会与基督精神相去甚远,致令他对教会却步。孙中山先生的信仰与传统教徒的信仰固有出入,惟其追求信仰之完美则可理解,因此有人说孙中山先生的宗教经验,乃属本色化的表现(60)。然而孙中山先生一生以教徒本分贡献于中国,缔造共和,解救人民脱离专制,及至临终之前仍能坚信基督,此亦足为基督教徒所认同和钦敬的。

注 释

(1)高昭龙译,《基督教教义纲要》,下卷,台湾,东南亚神学协会台湾分会,1966年5月,第139-147页。

(2)同上书,第89-97页。

(3)宋泉盛著,《认同与合一》,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8年8月,第51-61页。

(4)《约翰福音》十三章34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6节;《腓立比书》四章3节;《罗马书》一章12节;《哥林多后书》八章4节。

(5)张亦镜编,《孙中山自历明证》,附《卢夫人答香山商会函中之——孙中山先生历史》,上海,美华浸会印书局,1931年

6月,第78页。

- (6)同上书,第75页载有:“按先生信教领受入会之水礼时,系在香港,非在布哇。所入之会,为今中华基督教会之公理宗。受洗名曰日新,或取汤盘铭语意;或取与逸仙音谐;或以香山口音报逸仙,而录其名者为新宁(今改台山)人,仙新音相近,故讹逸仙为日新,或初本系日新后乃谐日新音而改为逸仙,均不能确知。”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页则有:“总理初号日新,原取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之义,厥后其师友区凤墀为之号逸仙,后数年先后从学于广州博济医院及香港雅丽氏医院,皆以此名行之。”
- (7)刘粤声编,《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香港基督教联合会,1941年,第244页。
- (8)孙日新撰,《教友少年会纪事》,载于《中西教会报》,上海,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6月,第24-25页。
- (9)张亦镜编,《孙中山自历明证》,第12页。
- (10)《国父全书》,台湾,国防研究院,1963年2月,第358页。
- (11)包世杰撰,《孙中山逝世私记》,载《近代史料》,总7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17页。
- (12)同上书,第216页。
- (13)本表据澳门浸信会第一、二分会友名册资料编。孙振、孙权、孙满系孙眉之子;孙二姑即孙中山先生之女。
- (14)包世杰撰,《孙中山逝世私记》。
- (15)刘粤声编,《香港基督教会史》,第245-246页。
- (16)张圣才撰,《许春草传》,第10-11页
- (17)张亦镜编,《孙中山自历明证》,第78页。
- (18)《良友》,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26年11月,第15页。
- (19)同上,第34页。
- (20)据友人李伟才先生面告,《良友》画报之出版《孙中山先生

纪念特刊》，其用意在于见证孙中山先生是一位虔诚教徒，藉收传福音之效。李伟才先生为革命党人李自重之长子，李煜堂之嫡孙，于岭南大学毕业后，即与岭南大学同学伍銮德等人在上海创办《良友》画报。李伟才先生与父亲、祖父及姑丈冯自由先生全属香港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教友，与孙中山先生同属一个教会。

(21) 刘粤声编，《香港基督教会史》，第 239—248 页。

(22) 《会讯》，293 期，香港，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1981 年 10 月 15 日。

(23) “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座落在香港新界上水马会道。

(24) 《国父全书》，第 32 页，又《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广州，孙逸仙博上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1935 年，第 8—9 页。

(25) 《陈少白先生哀思录》，第 4 页，载有陈少白 15 岁（1883 年）时，“是年公之四叔梦南公逝世。梦南公崇拜基督教，当时基督教会，知识界人物尚少，教会书籍中，有与女史论道一书，乃梦南公著作。梦南公尝携翻译西籍多种，归以饷公，公悉心浏览，自谓革命思想，多得于是，四叔父之恩，实不可亡云。”由此可见早于 1883 年，广州教徒已有革命思想之流布。

(26) 同上书，第 93 页。

(27) 同上书，第 117 页。

(28) 尤嘉博著，《尤列集》，香港，1987 年 8 月，第 543—546 页。

(29)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 4 集，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年 3 月，第 26—65 页。

(30) 同上书，第 3 集，第 1—23 页。

(31) 谢燕鸣撰，《宋耀如襄赞革命大业》，载《广东文献季刊》第

- 18卷,第4期,台北,1988年12月,第22-25页。
- (32)《国父全书》,第32页。
- (33)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4集,第9-14页。
- (34)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52页。
- (35)杨日华著,《钟荣光先生传》,香港,岭南大学同学会,1967年11月,第21-22页。
- (36)同上书,第19页。
- (37)罗家伦编,《国父年谱》,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11月,第75-76页。
- (38)项定荣著,《国父七访美檀考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3月,第87-88页。Henry Bond Restarick, Sun Yat Sen, Liberator of China (Connectic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7-9。
- (39)项定荣著,《国父七访美檀考述》,第88-92页。
- (40)同上书,第92-94页。
- (41)Huie Kin, Reminiscences (Peiping, China: San Yu Press, 1932). p. 68-69.
- (42)王宠惠著,《困学斋文存》,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年3月,第3页。
- (43)冯自由撰,《王宠惠轶事》,载于《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中央文化出版社,1965年11月,第550-551页。
- (44)王宠惠著,《困学斋文存》,第7页。
- (45)郑卓德讲述,《一个不求名利的革命家》(手稿)。
- (46)《革命先烈先进传》第553页。
- (47)冯自由著,《华侨革命开国史》,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53年8月,第11页。又逸民口述,《忠信的故事》。
- (48)郑卓德讲述,《一个不求名利的革命家》。

- (49)《基督徒报》，上海，1921年1月，封面里页。
- (50)《国父全书》，第391—392页。
- (51)同上，第27卷，第11号，第50页。
- (52)王治心著，《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30年7月，第1页。
- (53)同上书，第11页。
- (54)同上书，第19—20页。
- (55)同上书，第29页。
- (56)章力生著，《孙文主义的神学基础》，香港，圣道出版社，1970年5月，第40页。
- (57)同上书，第41—44页。
- (58)宋泉盛著，《认同与合一》，第62—63页。
- (59)《国父全书》，第441页，《复美以美会高翼圣韦亚杰论中国自立耶教会函》。
- (60)招观海撰，《孙中山先生之宗教经验》，载《真光》，第24卷，第11至12合号，第40—44页。

五四运动与中国基督教复兴之探讨

一、引 论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项重大运动,影响历史极为深远,五四运动源起于北京学生对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所作的不平等决议,激于救国热诚,实行要求军阀政府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被日本侵占之权利。因事态日见紧迫,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决定四项办法: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和会专使坚持不签字;三、明日(即5月4日)即采取行动,联合北京大专各校同学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游行,并向各国驻华使馆要求其转达各该政府予我国以正义的援助;四、推定代表20人办理一切进行事宜。(1)5月4日上午9时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齐集北京大学,由北京大学学生代表报告北大学生会四项决议,旋获各代表赞成通过。下午一时各校学生列队前往天安门集合,参加游行之学校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法政专门、工业专门、医学专门、农业专门、铁路管理、警官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三院校,参加者约三千余人。游行之时,旗帜标语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保我主权”,“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罢免曹章陆”,“诛卖国贼”等。学生会

印发的传单内容为：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了，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道。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2）

各校学生游行队伍先由天安门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行进，因为是星期日，各国公使均已外出，遂由馆员接受学生意见书。各学生继而游行至石大人胡同，入赵家楼曹汝霖之府第，要求会见曹汝霖。适逢是日曹、章、陆三人与日人在曹府开会，章宗祥适与学生相遇，群情汹涌致被殴伤，曹汝霖则匿藏未见。约一时之后，曹宅突然起火，游行队伍撤退，大批军警赶至，先后拘捕学生 32 人。致学生代表焦急万状，会商营救办法，并请北大校长蔡元培协助。5 月 5 日上午 9 时后召开会议，决议请各校校长请大总统释放被捕同学；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各校公推代表进谒教育总长陈述游行及罢课理由；通电全国教育会商请一致行动；电请我国专使对青岛问题力争不予签字。蔡元培校长以身家作保，接受临时内阁会议代表及教育总长提出不许学生参加国民大会及各校须于 7 日复课为条件。人狱的 32 位学生，于 7 日上午 11 时由警厅派车送回各校。

五四运动本属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目标。政府亲日派官员以五四运动为北京大学主持,故认为蔡元培校长是幕后策动人,蔡元培处境险劣,于9日秘密离京,直回绍兴息隐。5月下旬,津、鲁、沪、闽、苏、直、粤、汴、鄂、皖等各省市之学校均宣告罢课,学潮日益扩大。其后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外交团体均对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因6月3日、4日北京军警大捕学生讲员,由是引起各地罢工、罢市;6月10日曹、章、陆三人终被免职,蔡元培于8月初回任,学界风潮平息。而我国代表因国内坚决反对,故于8月28日不签署对德和约。至1921年5月20日德国宣布放弃山东省之一切权利,翌年中日代表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二十八条,规定日本将德国在山东之权益交还中国;12月10日中国开始接收德国租界地。足见五四运动是获得成功,达到了原有目的。(3)

胡适论及五四运动关系中国民族存亡,其中有三种精神:学生牺牲精神、社会裁判精神、民族自决精神。(4)至于五四运动的引发,亦可说是留学知识分子的贡献,其中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主要人物,而蔡元培居功至伟。(5)五四时期他们均在北京大学任职,由此推知北京大学实为推动五四运动的大本营。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国家意义普遍的醒觉,与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有极大关系。蔡元培称“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6);胡适亦谓“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述及六点要义:

-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宣言》载有：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相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9)

又说：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10)

由“五四运动”而演化成为“新文化运动”(11)，使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教育产生新的转变和改革，故亦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12)

中国基督教信徒面对新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同样受到思想上的冲击，而具有时代使命感的教会知识分子，与一般知识分子同有爱国心态(13)，对新思潮当然作出反响与回应，因此使中国基督教会产生了一次“基督教复兴运动”(The Christian Renaissance

Movement)(14)。五四时代基督教会的著名知识分子如赵紫宸、刘廷芳、吴雷川、徐宝谦、简又文、许地山、谢扶雅、诚静怡、王治心、罗运炎、范丽海、张钦上、司徒雷登、吴耀宗、余日章、张亦镜、梁均默、招观海、贾玉铭等人，多是留学生(15)，并有论著对当代知识分子之言论作出响应。其中北京燕京大学于1919年创办，首任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延揽赵紫宸、刘廷芳、徐宝谦、简又文、许地山、洪煨莲等留美学学者到燕京大学任职(16)，故“基督教复兴运动”是以燕京大学为领导。若说北京大学为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所在，则燕京大学便为基督教复兴运动之所在，更是回应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反教运动之所在。

二、五四运动引发教会问题之检讨

五四运动是以提倡“德谟克拉西”(Democracy, 民主)和“赛因斯”(Science, 科学)为口号。要推行“民主”则须反对孔教、礼法、贞操、旧伦理、旧政治；要推行“科学”则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民主”和“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思想等一切的黑暗。(17)可见新文化运动带动科学、宗教、道德、文学、教育、政治、哲学等多元性发展。由于知识分子对现存社会的不满，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因而促使基督教知识分子对现存教会有所重估。为探讨中国高层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意见，基督教会曾于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召开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会议，是次会议有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应邀出席，坦诚发表对基督教之观感，基督教知识分子藉此讨论“基督教复兴运动”之取向，(18)其后亦通函国内数十名知识分子，征求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并将各人意见登载于《生命月刊》。

周作人在《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中说：

我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运动去替代他的宗教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能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有两大条件，要紧紧的守住：其一是这新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念去同化，以至变成一个西装的玉皇大帝；其二是切不可造成教阀，去妨害自由思想的发达。这第一第二的覆辙，在西洋历史上实例已经很多，所以非竭力避免不可。(19)

张东荪在《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中说：

果真如此，则基督教似乎也分占西洋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基督教传到中国来，并未起何等恶影响。他不象佛教，佛教的本身我虽认为是至高无上，但他对于一般社会却……所以佛教只可以有高深知识的人来谭，而不能通俗化，耶教似乎不然，很有许多地方可以矫正中国的习惯。所以专从实用上讲，我以为基督教比较适宜些。

以上是我就假定必要宗教的前提而推论的，但我个人的立脚地却以为宗教是不必要。至于何以不必要宗教则非本篇的范围了。(20)

胡适在《基督教与中国》中说：

但中国基督教徒对于基督教的神学问题的不经意，

也是很明显的事实。还有一层，中国的知识阶级对于基督教的种种迷信和仪式大都存一种藐视或忽略的态度。这也是不可讳的事实。

基督教的将来全靠他能否了解这些事实的涵义。基督教的迷信是二千年前的产物，现在应该抛弃了。基督教的神学是中古时代的产物，现在也应该抛弃了。基督教的道德教训，虽然也是二千年前的产物，但因人类行为上的进步远不如知识进步的快，故还有一部分可以保存。这种道德的教训本不靠迷信与神学的帮助。

至于中国知识阶级对于基督教，我以为应该有两种态度。第一是容忍（Toleration）；第二是了解（Understanding）。承认人人有信仰的自由，又承认基督徒在相当范围以内有传教的自由：这是容忍。研究基督教的经典与历史，知道他在历史上造的福与作的孽，知道他的那一部分是精华，那一部分是糟粕：这是了解。（21）

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说：

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闇、污浊、坑中救起。

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中国底基督教状况怎么样？恐怕还是吃教的人占多数。

最可怕的，政客先生现在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

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是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底永远生命而来；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邻人如爱我们自己；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我们的敌人，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他大骂无产社会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他忘记了耶稣是穷人底福音，耶稣是穷人底朋友。(22)

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所提出的意见，实引起教会知识分子对教义、礼仪、信仰、道德等问题作出反省，而对中国社会、文化、人民等问题作出重估。其后全中国基督教会于1922年5月2日至12日在上海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出席代表一千余人，均属各省市、各宗派、各机构选出之代表，大会之主题为“中国教会”。(23)大会会长诚静怡于开幕词中指出：大会要旨为使中国教会找出未来的发展和适应社会事业的方法，以及拿出诚实的态度和勇敢的精神来对付教会内外的情境。(24)大会分五股进行研讨，归纳各股结论之要点如下：

第一股 基督教在中国今日之实况

第一章 观察调查表《基督教调查统册》书报部博医会等等之报告。抉其紧要之事实，或论数目，或论地点。

第二章 二十年来中国基督教会之进步。

第三章 教会之外围。

第四章 论基督教之感力。

第五章 论基督教运动在中华今日之强弱。

第二股 教会将来之工作

第一章 培养基督教团体之宗教生活。

第二章 促进业经工作地面之教会事业，俾基督教之各

种工作,均能于十年中获有进步。

第三章 注意未工作之地面,及对于该地面开始基督教事业之特种建议。

第三股 教会的宣言

第一章 敬告同道书。

第二章 敬告国人书。

第三章 附件——本股的事务及经过情形。

第四股 教会领袖人才之启发

第一章 受薪的领袖。

第二章 不受薪的领袖。

第三章 结论。

第五股 教会的调剂合作

第一章 目的——报告一切基督教会所论“机关协进”与“人员合作”的如何进步。

第二章 本股有必当进行的意见数条,呈于全国大会,以资采择。

第三章 全国大会当设立一个基督教全国议会,可将大会的意思,实行出来。(25)

第一股第二节有专论“新思潮运动”,认为新思潮之发起人为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刘复、胡适、周作人,六人均为北京大学教授,新思潮运动目的在输入世界最高文化国家之一切哲学、科学与社会之优点,使中国文化与他国并驾齐驱。其中指出杜威与罗素讲学均对中国新思潮有极大影响,如罗素之吸引力非在于其哲学及数理的特识,而是他所主张之经济社会主义;更因为罗素与妻子离婚,而来华之时与一女学生同居,其主张自由离婚及自由恋爱,故引起中国近代自由恋爱之思潮。杜威素来主张自由教育,认为宗教不当纳入学校课程,到 21 岁后方可传教感化,由是引起国人

反对教会办学之思潮，而不知杜威所在之美国已有信仰宗教的背景。此外，更指出新思潮运动与基督教会种种关系，而各种反教言论，不过欧西已有之学说，用词虽有轻重之不同，其伪则无差异，是以鼓励信徒对新思潮运动多所认识。(26)

由于五四运动新知识分子促成了社会之转变，教会亦须而对“内外的境况”，重新探究教会问题的存在。刘廷芳在“基督教全国大会”后，指出当时教会应着重之问题，包括：教会统一的问题，教会中国化的问题，教会灵修的问题，教会研经的问题，教会改造社会的问题，教会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亲善的问题，教会布置问题。(27)中国教会问题之自由探讨，实为五四运动之新思潮所导致。

三、五四运动引发之反教运动及基督教之反响

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物是蔡元培，他可以说是中国美学的倡导者，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说”(28)，是现代中国反教重要的学说(29)。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曾以没有宗教信仰为会员入会条件，其中当然受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影响(30)。“五四”后之反教运动肇始于“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The 11th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Conference)定于1922年4月4日至9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而3月10日上海即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之组织，15日上海《先驱》杂志出版一张《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特号》，登载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通电、组织章程，表明宗教与科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违反科学，更是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之工具。3月21日北京各校有77人发电组织“非宗教同盟大会”，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

先后发表演说，遂引起各省市学界之响应，其后并定12月22日至27日为“非基督教周”。6月发表《非宗教论》，载有蔡元培、李石曾、罗素、陈独秀、汪精卫等反教言论(31)。其时反教主要人物不但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

(一)在共产党方面如：

李大钊指出：

宗教的教义，多有以神为介而阐导博爱的精神。但我很怀疑，没有自由平等作基础的博爱，而能达到博爱的目的么？即如基督教义中所含的无抵抗主义，如“人批我右颊，我更以左颊承之”，“人夺我内衣，我更以外衣与之”，“贫贱的人有福了”，“富者之入天国，难于骆驼之度针孔”等语，其结果是不是容许资产阶级在现世享尽他们僭越的掠夺的幸福，而以空幻奇妙的天国安慰无产阶级在现世所受的剥削与苦痛？是不是暗示无产阶级以安分守己的命示，使之不必与资产阶级争抗？是不是以此欺骗无产阶级而正是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资产阶级是不是听到这等福音便抛弃他们现世的幸福而预备入天国？这是大大的疑问。(32)

陈独秀指出：

在现在人智发达的社会里，一切古化人智蒙昧社会所遗传的宗教教义底缺点自然都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必对基督教教义的缺点特别攻击；至于基督教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恶，真是堆积如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愤而且战栗！(33)

(二)国民党方面如：

朱执信指出：

历史的耶稣，是由现在所传的《圣经》以外，可信的记载，和想象得来的事实里头表现出来的。这个耶稣不过是一个私生子，反抗当时的祭司，被人拿去杀了的一个人。属性很简单，人格也不一定是卓越的。如果单是一个耶稣死了，恐怕还比不上宋子贤、唐赛儿、徐鸿儒、土匪的大师兄、湖北的九龙大王，左右不过是三十几岁一个少年，哄动几个人，在村乡里鸟乱一场罢了。所以如果单讲历史的耶稣，我们用不着多费气力。(34)

汪精卫指出：

他说信耶稣的享天堂极乐世界，不信耶稣的永死落地狱受苦，这种狭隘酷烈的态度，比起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实在愧死。本来常常听见人说佛教入中国，和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冲突，何以耶教入中国，却激起大乱，直到现在还讨人嫌恶。这里头虽有种种原因，便是佛教广大，耶教狭隘。佛教因为广大，所以头头是道。耶教因为狭隘，所以见了不同教的人，便拿他落地狱受苦……他说耶稣是真命天子，做天下万国太平皇。这些话，亏他说得出来，竟是保皇党复辟党一流人物，民主国内容他们不得。(35)

谢扶雅认为反教运动主要动机有三：一是反帝国主义；二是科学精神；三是发扬东方旧文化及思想。这些动机都是五四运动新思潮的产物(36)。自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以及七月间全国学生

总会在上海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要求政府向教会收回教育权,由是激发更大反教浪潮(37)。因为澎湃的反教运动,导致教会知识分子的反省,从而谋求教会改革,以期取得社会的认同。

基督教面对各方之反教言论,而在出版之报刊上对反教运动作出回应之刊物以北京出版之《生命月刊》、《文社月刊》、《紫晶》,上海出版之《青年进步》,广州出版之《真光杂志》。《真光杂志》于1922年5月1日已出版《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并纪事》对反基督教者有所回驳,而基督教当年刊载反基督教言论书目甚多。(38)徐庆誉在《非宗教同盟与教会革命》一文中指出反教运动对促进教会的革命有积极性的意义。(39)由于反教的理由中有:

基督教的教义,不及佛教圆满,其哲学不及佛教深邃。基督教太穿凿狭隘,杂人事,经行为,重外轻内,舍本逐末,与中国国情民性不合。中国知识阶级需佛教,而基督教对于中国,利少害多。(40)

为此,基督教全国大会在宣言中提出了“中国本色的教会”之建议,指出:

我们对于西来之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评判,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是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这是吾们教会同胞的公意。中国的历史,国人的特性,教务的性质,经验的指示,以及国内种种迅速的变迁,莫不要求一个中国本色的基督教会,俾得宣传中国本色的基督教。吾们所称的本色的基督教会,一方面仍与世界各宗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有连续不绝的关系,一方面是要实在适合中华民族本有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经验。

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标。我们宣告，时期已到，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统系，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41)

1924年7月31日赵紫宸在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第二届年会论及《本色教会的商榷》，认为本色教会要把基督教和中国古文化所孕涵的一切真理化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底宗教生活和经验合乎国土国风，不至于发生不自然的反应。在中国领袖中应有本色的牧师和本色的著作家，并且要将诗歌、祈祷、圣餐仪式、宗教论说发挥本色的精神。(42)

中华全国基督教为推进教会本色化运动，于1924年成立“本色教会常备委员会”，专研究中国文化中具有永久价值之各种要素；调查我国各种宗教团体之近代运动；细心调查“非教运动”之产生、组织、领袖、著作、理由；研究国内独立教会之状况；研究社会与中国教会之关系；研究中国教会之礼拜、圣诗、婚丧礼节等事。其后有关反教思潮、崇拜礼节、教会圣诗等均有倡议及专著。(43)

为使中国教会达到本色化，各地方教会必须推行“自理”(Self-governing)、“自养”(Self-supporting)、“自传”(Self-propagating)之“三自运动”(Three-self Movement)。此种三自主张(44)，不外从“自理”、“自养”、“自传”、“自修”、“自觉”的精神中，寻求经济独立，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成为一个自立的教会(45)。在此证明中国教会之提倡“本色化运动”及“三自运动”，与五四后之反教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四、中国基督教会 对“民主”、“科学”之 回响

五四运动是以“民主”、“科学”为标志。其所以提倡“民主”，实因其时中国为军阀割据，在四分五裂的国势中，在政治上并无完善的民主体制。五四运动初期之知识分子对“民主”一词固没有充分的讨论，更无系统思想的表达，他们接受西方的民主观念，多属杜威之引介。(46)然而教会信徒对于“民主”的意义，是认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主张。原因孙中山先生自小在檀香山及香港之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早年师友多属教会中人，在港之何启医生、区凤墀长老、王煜初牧师均为孙中山之老师，他们倡导的民主言论对孙中山多有熏陶。及至孙中山先生在港进行革命，亦获陆浩东、杨衢云、陈少白、郑上良等教徒之支持及参与。(47)孙中山先生1883年在香港公理堂受洗，在香港西医书院接受教育，与道济会堂、伦敦会、礼贤会、圣公会、浸信会循道会之教徒均有往来，部分信徒对于孙中山先生策动之革命事业，多表支持。迨至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之中华民国军政府，先施公司之马应彪、联益建筑公司之林护、广东银行之李煜堂、安乐园之张吉盛等人全是教会信徒，对广州政府均有大量经济支援。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先生即表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的自由。(48)

范到海在《共和主义之与基督教》中说：

“基督教者，共和主义之渊泉也。行完全基督教之国不能不共和。基督教流行之国初虽专制，而终必至于共和。世界共和之趋势，即基督教发达之现状，而所谓全球大联邦之共和宪法，为万国平和会所企望。而欲成之

者，不啻基督天国之条例……

数月以来，我国企图共和之目的，正为全国人寻源探本之日。然则为基督徒者，值此时机，宜如何大昌明其宗旨之所在，俾知建造新共和国屋角之首石，舍基督教而莫属也，共和主义万岁，基督教万岁！”(49)

崔爱光在《基督教与中华民国之关系》一文中亦云：

“基督教所抱之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是也。果能人人皆明白自由、平等、博爱之理，行自由、平等博爱之事，则民国之巩固，自可操券而获矣。此吾所谓基督教与中华民国之密切之关系也。非然者，争权夺利，伏莽思逞，民国虽已成立，恐不免有推翻之一日，至斯时凡不皈依基督之人，不但灵魂不能得救，即肉躯亦无安枕之时矣！基督教之有关于中华民国岂浅鲜哉。”(50)

孙中山先生在反教运动炽烈的时候，论及宗教说：

“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譬如现在我们用眼光看远方之物，多用千里镜帮助，看得很清楚。千里镜是近来科学发明的。古时没有科学，所以没有千里镜，看远方之物，当然不及现在看得清楚。这就是宗教不及科学。因为这样的原故，现在宗教知道专迷信古人经传之不方便的地方很多，便有主张改《新旧约》的，推广《约》中的文字范围，以补古人所说之不足。至于宗教之优点是讲到人司神的关系，或同天的关系。古人所谓天人一体。以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的，既成人形更进化而入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

灭善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极点。

宗教徒是不是问政治呢?宗教徒是问政治的。”(51)

当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时,基督教会均认为根据“三民主义”建设国家,是信徒共同的责任。(52)王治心在《孙中山主义与耶稣主义》一书中说孙中山的主张与耶稣的主义并没有冲突,是从耶稣的精神产生出来的。“德谟克拉西”的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即“自由”,民权主义即“平等”,民生主义即“博爱”。所以基督教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民主”的所在。(53)

五四运动之高举科学,是因知识分子在外国体验西方科技之进步、工业之发达、社会之繁荣、国民之富裕、生活之自由,显然与科学的成就有极大的关系。一般知识分子之排斥宗教,均认为宗教就是迷信,与科学相背,有了宗教便阻碍科学的发展。为要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强化中国的地位,则非提倡科学不可。(54)然而五四时代之论“科学”,只是概念上的探求,以及整理国学所提出的方法,对实际的科学并无重大贡献。(55)

就以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而论,鸦片战争以前先有教士创办报刊而有所引介;鸦片战争以后更有专书译述;洋务运动时代,基督教徒傅兰雅(John Fryer)移译西方科技书籍至丰;“格致书院”开创中国科技学院之先河;广学会出版之《万国公报》,全属基督教介绍西方科学的桥梁。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之开设,亦是为中国谋求科学为本意。五四运动之前,基督教在中国开办之十三所大学,已为中国科学之发展奠下良好基础。而领导五四运动之知识分子,大多不是自然科学学者,因为受到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共产主义的唯物论,以及实证主义的求证论等等之影响,以至笼统的反对基督教。教会为使一般知识分子对宗教与科学两者有正确的认识,曾先后出版了种种书籍作为回应。(56)

在神学教育上,亦有书籍论述科学与神学之关系。如贾玉铭

在《新辨惑》一书中则有“科学与神学之辨异”，论及科学与神学是两个不同范畴，科学有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别，神学则穷究灵魂依归，造物之真宰，及超自然界之事物和真理。科学之发明与神学之研究因有不同，而产生的效果亦有不同，影响亦有不同。在科学与上帝的学说方面，有的是否定上帝，有的是需要上帝，有的是发明上帝等等。对于圣经神学和神学观，科学固然不能解释神学，但神权则可以表现于物理，可取用于物理，可管理于物理，可超越于物理，但非破坏物理。神学实有助于科学，而科学亦符合于神学，两者不应有所冲突。（57）

五、中国基督教对爱国运动之回应

五四运动始于青年学生之爱国情操，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备受列强侵袭，割地赔款，以至民穷财尽，沦为半殖民地。知识分子有见国内政治、主权、经济、社会均受外人宰制，由是触发时代呼声，形成一次爱国运动的浪潮。其时中国社会虽然弥漫着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证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种种思想，但是基于爱国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则属一致，国家主义因此形成。正因国家主义高涨，有人认为基督教既属“洋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教会牧师恃着帝国主义为后盾，于是“恐吓官民”、“武断乡曲”、“袒庇罪犯”、“包揽诉讼”。（58）所以从爱国主义的眼光而言，反对基督教徒，反对基督教会，反对传教士，反对教会学校，反对教会出版，反对教会员工，反对《圣经》，反对耶稣等等都是爱国的表现。（59）教会陷于被攻击的处境，对于国家主义固有所申辩，在爱国行动方面亦有所回应。

徐宝谦在《反基督教运动与吾人今后应采之方针》中说：

国家主义派本爱国的前题，揭“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旗帜，其用意当然为吾人所赞成，且爱国的思想，与基督教教义，本不必发生任何种冲突。惟基督教之在中国，一方面因与国际条约发生关系，招致被帝国主义利用之嫌疑。他方面又因基督教之精神，虽不反对爱国，而究竟超乎国家界限之上，且其方法，尚和平仁爱而抑武力，与国家主义者所主张之国家自卫权利，似不相容，于是引起了国家主义者的非难。加以事实上，教会学校因授必修宗教科及不在政府立案的原故，迹近破坏中国国家教育权及宪法上信教自由之规定，尤使反对者振振有词。我以为中国基督徒当此时机，应参加反对不平等条约（包括传教条约）及收回教育权各种运动，使人们得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间，并无何种不能断的姻缘，使人们得知基督徒爱国之心，不居人后。根据以上的研究，吾人此后应采取下列的几个方针：

（一）吾人应尽力培养吾人的灵性生活，使“耶稣基督崇高的人格热烈的感情”（引陈独秀语）先注射吾人到自己的血里。

（二）采用科学方法，作不断的重新发现吾人信仰的工夫。

（三）用文字及口舌的宣传，尽量发挥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及国际主义。

（四）参加反对不平等条约及收回教育权各种运动。

（五）从速谋求中国教会之自养自传。惟同时保持基督教之国际性，对于国外传道（广义的）事业，取交换政策。

（六）使基督教的思想制度组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神，不相背驰。并使基督教作促进中国自觉对于世界

有一种使命的工具。

(七)吾人不仅应发挥基督教的国际主义,并应与世界各国优秀分子携手,实际上对于强暴之国家及个人,及有背正义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作精神抵抗的工夫。

(八)对于宗旨相同的团体,无论是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取合作的政策,尽力与社会上的恶势力相奋斗。

(九)对于非难或反对基督教者,取虚心领教及当仁不让的态度。

(十)努力谋求言行的一致,对于牺牲服务改造社会的工作,精进不懈。(60)

基督教信徒为对国家主义的回应,先后成立下列两大组织:

(一)救国联合会之成立:本会于1922年在北京,由徐宝谦、马湘伯、柏文蔚、钮永建、谭惠然、李登辉、吴山、沈仪彬、陈家鼐等署名发起。该会联合全国各团体及个人,共同实行和平的,经济的而又彻底的方法以救国,而定名为“救国联合会”。有感全国分裂,内忧外患非常紧迫之时,唤醒全国各实力派之觉悟,促成救国会议,解决统一问题。(61)

(二)中华基督教文社:本社为中国基督教协进会为推行基督教出版事业之本色化,于1923年12月由余日章、赵紫宸、刘廷芳、诚静怡、李荣芳、洪燮莲、范子美、胡貽谷、简又文、陆志韦、邝富灼、陶知行、仝绍武等文坛健将所组成,于1925年10月出版“文社月刊”。(62)该社成立之宗旨为:

现在人类所需求的是新生活,这是文社使命之一。文字有两种功能:在当代可以改革人的生活,在以后可以保守人的生活。有新文化运动,而后有马克思主义之尝

试,自由恋爱主义之实行,白话文的不胫而走,把牢不可破的中国社会,一变而为世界新思想之藪,什么古怪说教行为,都应有尽有,这是新青年、少年中国努力等出版之造作。不问他们所造的是孽,还是福,但影响到中国人生活之丕变,是无可否认,故曰:文字有改革人生活之能力。(63)

六、结 论

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留学知识分子带动的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之“德谟克拉西”及“赛因斯”。所谓“民主”,实以个人自由为基础。为使人人发展机会均等,则接受教育机会之均等,人人之能接受教育,白话文推行语文之通俗化、大众化是属必要的因素。所谓“科学”,首重科学精神,极力主张实验主义。因此使哲学、政治、社会、经济、文学、教育等种种思潮受到重大的影响,致有“新文化运动”之称。

由于五四运动主要的领导人物均非基督教徒,而基督教知识并无参与五四运动行列,但因五四运动而产生之实证主义,重于疑古与批判;共产主义,重于无神与唯物;国家主义,重于爱国与排外,故基督教成为攻击的对象事属必然。至20年代所产生的反基督教运动,更使基督教受到严重的考验。教会面对时代思潮的转变,敌对性的攻击,是以对外必须要有认同与反驳;对内更须要有检讨与重估。在此情势下,于是有教会“本色化运动”的产生,又由“本色化运动”化为“三自运动”。中国基督教会在五四运动后,无论在神学、信仰、教义、圣诗、礼仪、出版、自养、自治、自传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估计的成就,可以称为基督教会空前的“复兴运动”。就该时代教育人才之辈出,思想之澎湃,教会之创新,出版之宏丰,

事工之发达,至今仍难出其右,故五四运动对中国基督教会复兴之影响,应有肯定性评价。

注 释

- (1) 参见《五四爱国运动纪要》,载《五四爱国运动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台北,国立北京大学台湾同学会编印,1959年5月4日,第2页。
- (2) 参见注(1),第3页。
- (3) 参见注(1),第7—12页。
- (4) 参见胡适撰《纪念五四》,载《五四爱国运动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25页。
- (5) 参见蔡尚思著《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年10月,第17—22页。
- (6) 转引1925年《新青年》第一卷全,重刊合订本,蔡元培题辞,上海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印。
- (7) 转引注(6),胡适题辞。
- (8) 参见注(6),一卷一号,第1—6页。
- (9) 转引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宣言》,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85页。
- (10) 转引注(9),第386页。
- (11) 孙中山先生称“五四运动”为“新文化运动”。载于《为建设英文杂志印刷机关致海外同志书》,见《国父全书》第779页。
- (12) 参见Chow Tse - 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P. 29。
- (13) 参见金耀基撰《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载《中国现代

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4年，第53—71页。

(14) 参见注(12)，第338页。又，Hsu Pao Chien, *The Christian Renaissance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I, July 1920, p. 459—467。

(15) 按赵紫宸、刘廷芳、吴雷川、徐宝谦、简又文、许地山、罗运炎、吴耀宗、余日章、招观海等教会知识分子均为留美学生。参见 Searle M. Bates, *Biographical Notes of Chinese Church Leaders*。

(16) 参见注(15)。按燕京大学于1919年为北通州协和大学及北京汇文大学合并在北京开办之一所基督教大学，首任校长为司徒雷登。

(17) 参见陈独秀撰《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六卷一号。

(18) 参见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I, July. p. 460。

(19) 转引《生命月刊》，二卷七册，1922年3月，第1—2页。

(20) 转引注(19)，第2页。

(21) 转引注(19)，第4页。

(22) 转引注(19)，第5、6、9页。

(23) 参见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22) p. 1—21。

(24) 参见《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23页。

(25) 参见《基督教全国大会》第一股报告书；第二股报告书，第三股报告书；第四股报告书；第五股报告书。

(26) 参见《基督教全国大会第一股报告书》，第62—65页。

(27) 参见刘廷芳博士编《中国教会问题的讨论》，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22年7月。

(28) 参见蔡元培撰《以美育代宗教说》，载《新青年》三卷六号。

(29) 参见注(5)，第 365—379 页。

(30) 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 235—269 页。

(31) 参见《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5)，第 18—19 页。又，《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 20—24 页。

(32) 转引李大钊撰《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86—187 页。

(33) 转引陈独秀撰《基督教与基督教会》，载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北京，京华印书局，1927 年 4 月，第 191 页。

(34) 转引朱执信撰《耶稣是什么东西》，载注(32)，第一卷，第 508 页。

(35) 转引《批评汪精卫的力斥耶教三大谬》，载《真光杂志特号，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并纪事》，广州，东山美华书局，1922 年 5 月 1 号，第 77—78 页。

(36) 参见注(31)，第 22 页。

(37) 参见注(31)，第 19 页。

(38) 参见注(31)，第 142—176 页。

(39) 参见《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 212—239 页。

(40) 转引注(31)，第 23—24 页。

(41) 转引《基督教全国大会第三股报告书》，第 3—4 页。

(42) 参见《青年进步》(第七十六册)，第 8—15 页。

(43) 参见《中华基督教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一册，1925 年 10 月，第 10—11 页。

(44) 参见注(41)。

(45) 参见注(43)，第 29—34 页。

(46) 参见周策纵等著《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社，1985

- 年12月,第201—207页。
- (47)参见《孙总理信奉基督教之经过》,载刘粤声编《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基督教联合会,1941年,第239—248页。
- (48)参见《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年,第442—443页。
- (49)转引《基督徒月报》,1912年2月,第1、3页。
- (50)转引注(49),1912年10月,第3页。
- (51)转引张仕章编译《宗教批判集》,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5月,第290页。
- (52)参见注(31),1928年,第1页。
- (53)参见王治心撰著《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0年7月,第10—24页。
- (54)参见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载注(51),第94—95页。
- (55)参见杨一峰撰《五四精神述评》,载注(1),第44—53页。
- (56)有关科学与宗教书籍,以译述为多,如简又文译《宗教与科学》,谢颂羔、米星如合译《近代科学家的宗教观》,莫安仁、周云露合译《科学与人生》,陈启新译《基督教与科学》等书。
- (57)参见贾玉铭著《新辨惑》,南京,灵光报社,1925年6月,第81—148页。
- (58)参见注(31),第23页。
- (59)参见注(31),第143—176页。
- (60)转引注(39),第451—455页。
- (61)参见《真光杂志》,第二二卷第六号,1923年6月15日,第31—37页。
- (62)参见注(31), (1927年),第118—120页。
- (63)转引注(43),第35页。

广学会之发展与中国时局转变之关系

一、前 言

1860年中英签订《北京条约》以前,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可分为两大时期:1807~1842年可称为中国沿海边缘时期,1842~1860年可称为中国五口岸时期。自中英签订《北京条约》后,基督教及天主教方可在中国内地“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1)故史学家白威淑珍(Suzanne W. Barnett)称1807~1860年基督教在华之传教工作乃属“无声之教室”(Silent Evangelism)(2),以出版事业为其主导。中国基督教新教先驱马理逊牧师之一生事业在于文字工作之成就,诸如《圣经》翻译、撰写书文、创办报刊,既有助基督教之传播,更有助中西文化之交流。随后来华教士,有伦敦传道会之米怜牧师(Rev. William Milne)、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理雅各牧师(Rev. James Legge);信义宗郭士立牧师(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美部会(又称公理会)裨治文牧师(Rev. Elijah Coleman Bridgman)、卫三畏教士(Samuel Wells William)等均属享有盛名之文字工作者与汉学家。而华人第一位教士梁发早年工作以派发宣教书册为主,其撰写之《劝世良言》尝影响洪秀全之思想,继而引发

太平天国运动。(3)足见早期基督教士在华之宣教事业实以出版事业为主。按《中华归主》一书所载,1920年前中国基督教文字之出版机构有:

1. 上海美华书馆(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44)
2. 上海华美书局(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1862)
3. 成都加拿大监理会印书馆(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Press)
4. 广西梧州宣道书局(South China Alliance Press)
5. 广州美华浸会书局(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99)
6. 上海中华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887)
7. 上海中国主日学合会(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 1907)
8. 伦敦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London 1909)
9. 汉口中国圣教书会(Chines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76)
10. 上海中国圣教书会(Chinese Tract Society)
11. 重庆华西圣教书会(West China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2. 厦门闽南圣教书会(South Fukie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3. 福州闽北圣教书会(North Fukie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4. 广州华南圣教书会(South China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5. 香港圣书公会(Bible, Book and Tract Depot)
16. 打箭炉西藏宗教书站(Tibetan Religious Literature Depot)
17. 司徒布道基金出版部(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Stewart Evangelistic Fund)
18. 上海青年学会书局(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9. 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出版部(Publi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Y W C A of China)

20. 上海时兆报馆(Signs of the Times Publishing House)
21. 信义会出版部(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
22. 教会出版委员会(Church Literature Committee)
23. 美部会出版委员会(American Board Publication Committee)
24. 岭南大学奈普印书馆(Knipp Memorial Printing Plant)
25. 宁波三一学校印书局(Trinity College Press)
26. 福建兴化华美书局(Hinghwa Mission Press)
27. 上海广协书局(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28. 上海协和书局(Mission Book Company)(4)

以上所列之印书馆多具西方教会宗派之背景,其经费多来自西方教会之援助。而在中国境内由热心信徒自由组合,不隶属任何教派公会者,则以广学会最具代表性。

二、广学会创办之经过及其名称之由来

广学会创办人韦廉臣牧师(Rev. Alexander Williamson)于1855年为伦敦传道会遣派来华传教,9月24日抵上海,因体弱于两年后返回英国,1863年又为苏格兰圣经公会遣往上海工作。1884年韦廉臣牧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组织“同文书会”(The China Book and Tract Society),进行筹款募捐活动。(5)此组织之产生,起因于1877年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中国在华教士第一届大会”(The First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会中讨论教育问题,其时教会所办学校347所;教师5917人;教育方式有采中式,有采西式,有采中西混合式;学校类别则有男校,有女校,有男女校之分,是以教育制度极为参

差,为提高教会教育全盘计划,咸认出版教科书为首务,遂成立委员会出版教科书,举韦廉臣为文学委员,由是产生“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6)。其后韦氏回苏格兰筹款,在苏格兰组织之“同文书会”是以捐款购置印刷机器,附设于上海墨海书馆之内,出版宗教及科学书籍分赠华人为主。而苏格兰“同文书会”于1887年因事解散,将上海之印刷器材捐赠韦廉臣牧师。韦牧师随即联络在华之赫德(Robert Hart)、林乐知(Rev. Young John Allen)等西人重组“同文书会”,于同年10月间成立,英文易名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7)按1834年广州外人已有“益智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之设立(8),足见中国广学会之创设固与苏格兰“同文书会”有直接关系,而与“益智会”亦有间接渊源。

1890年3月号《万国公报》,韦廉臣在《同文书会实录》中载有首届职员名单如下:

总 理	总税务司赫君德(Robert Hart)
副总理	德国总领事官佛君克(Dr. J. H. Focke)
协 理	德国总领事官佛君克(Dr. J. H. Focke)
	美国教士慕君维廉(Rev. William Muirhend)
	英国进士韦君廉臣书记(Rev. Alexander Williamson)
	美国进士林君乐知(Rev. Young J. Allen)
	元芳老洋行多君各尼(C. Throne)
	有利银行伯君斐细司樵(F. C. Bishop)
司 事	美国副领事官贾君礼士(W. R. Charles)
	美国总领事官廉君纳德(General Kennedy)
	税务司德君瑾林(Gustav Detring)
	税务司杜君德维(E. B. Drew)

税务司好君博逊(H. E. Hobson)
税务司吉君德(McKean C. Edward)
署理税务司裴君式模(M. B. Bredon)
署理税务司马君士(H. B. Morse)
副税务司义君理逊(H. M. Hillier)
同文馆山长丁君韪良(W. A. P. Martin)
内地会副会长范君明德
英国律师担君文(W. V. Drummond)
英国医士韩君依堤(Dr. E. Henderson)
美国教士慕君维廉(Rev. William Muirhead)
英国进士艾君约瑟(Rev. Joseph Edkins)
英国教士慕君德育(Rev. A. Moule)
英国教士花君提士
美国进士林君乐知(Rev. Y. J. Allen)
怡和洋行麦君机嘉
旗昌洋行时君尼
美最时洋行杨君霞
汇丰银行瓦君约翰
元芳老洋行多君各尼(C. Throne)
仁记洋行何君德(A. G. Wood)
伯璜洋行伯君安
汇丰银行葛君多士
公昌洋行郭君米西
香港怡和洋行许君雅各
元芳洋行白君尔登
呵加喇银行金君禄米
英国轮船公司约君瑟(H. H. Joseph)
日本轮船公司达君维希

德国银行米君信

字立西报馆立君德(R. W. Little)

有利银行伯君斐细

英国进士韦君廉臣

(9)

从广学会创办之英文名称则可知其成立是以传播基督教知识及一般知识为主。自李提摩太牧师(Rev. Timothy Richard)接任督办后,于1894年即将“同文书会”之中文名称改为“广学会”。1905年季理斐牧师(Rev. Donald MacGillivray)建议将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之英文名称改为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ese。(10)

三、满清时期之广学会(1887—1911)

广学会于1887年成立之初,乃将林乐知牧师原已停办之《万国公报》,再行复刊,并由林乐知主理其事。惟其要旨有十则:一曰广见闻;二曰增衣食;三曰利材用;四曰便商贾;五曰育人才;六曰明格致;七曰遵王法;八曰测本末;九曰展伦常;十曰明天德。(11)其时适为清廷甲午战争败北之后,国人深感战败耻辱,知识分子觉醒船坚炮利、以商战商、格致西学实不足以救国,是以探求政治革新为时务。广学会为切合时局国情,其言论亦多倡维新改革,使知识分子有所趋鹜。创办人韦廉臣尝谓:

我西人虽愚,颇识公私二字之意,夫为己为私,为人
为公,人尽知矣!而公私二字正不第作如是解也。私者

为己不為人，其究也有損于人，并無益于己。公者為人不自為己，其究也有益于人，并無損于己。是私為己，而實不自為己；公不自為己，而實為己也。吾輩即不知為人詎不知為己耶！故西人來華，原欲以興西國者興中國，蓋深知于中國有利，即不啻有利于西國也，而言為中國患哉？（12）

而廣學會主要宗旨即為：

將泰西之道，擇其有益于中國者，潛心翻譯，繕成篇帙，散布四方，使人了然于心目。（13）

廣學會雖為韋廉臣所創，其事業之發展則以李提摩太貢獻至鉅。李氏于1870年為英國浸禮會遣派來華傳教，翌年抵山東，復往東北工作，後再返山東。因經辦山東及山西賑災，有聲于時，由是結識丁寶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督撫大吏，而其對中國之改革獻議，甚為中國官員重視。（14）李氏于1890年5月出席上海召開之基督教在華教士會議，提出《基督教傳道會與中國政府之關係》一文，倡言傳教工作重點應轉移于政府官員階層，深獲各教士之贊許。同年7月應李鴻章之聘，出任天津《時報》主筆。自韋廉臣病逝，廣學會總理赫德力薦李氏為督辦。1891年李氏出任，翌年對廣學會提出七項建議：

（一）將《萬國公報》作為一份高級雜誌，提供有系統之問題。

（二）出版系列書籍與小冊，說明教育與宗教之發展，對工業、貿易及國家進步每一部門之關係。

（三）籌辦獎金，給予撰寫有關國家進步優秀之論文作者。

（四）籌設博物館、圖書館、舉辦演說會等。

（五）在全國多地設代銷處，推廣出版之銷路。

（六）盡力爭取中國人之合作，協助華人組織學會，為中國謀福

利。

(七)宣传广学会之目的,使各学子明了广学会之真正用意。

(15)

由以上倡议可见,李氏主持之广学会多偏重于社会政治之需要,主张变法拯救中国。而林乐知、花之安(Ernest Faber)、安保罗(Paul Kranz)、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诸牧师之著述及在《万国公报》之言论,均受中国朝野人士之推崇。(16)广学会在清季影响中国之大,实与总税务司赫德有密切关系,缘 1888~1911 年间,赫氏任广学会总理历有 21 年之久。(17)赫德不啻为朝廷之重臣,亦向为李鸿章倚重,若非赫德之支持及引介,广学会之言论固难深入皇廷,以及为国人所接受,而业务亦无法扩展于各省。于此时期,总理及督办均为英人掌政,故广学会历年之捐款,实以英国为主力,美国教会支援甚少。

四、民国时期之广学会(1912—1949)

李提摩太在广学会任职至 1916 年离华,督办一职由季理斐接任。季氏主事则以教会传教工作为主要,与李氏之出版政策有别(18),而季氏出版政策之转变,与中国时局有极大关系。李氏藉赫德之人事由是结纳清廷高官要人,换言之,其事业上达于官僚士绅。李氏向受英国君主立宪之传统影响,力主中国采用英国政制模式实行君主立宪,对孙中山之民主革命运动不表支持(19)。迨至孙中山革命成功推翻满清,旧有王朝势力已告瓦解,其后袁世凯称帝及军阀割据,政治局势极为混乱,广学会在人事上顿失原有依靠。况其时知识分子多来自于南方及海外,以及华资出版社及报馆之兴办,留学生学成之归国,各省大学之成立等因素,以至广学会失掉其领导知识分子之功能。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之后,西方自由思想澎湃一时,其时一般知识分子所提倡之“民主”与“科学”,教会言论及《万国公报》已无法应付时代之需要。自1922年非基督教同盟产生,反教言论及反教书刊遍布各地,而基督教反驳之书刊,只有浸信会之《真光杂志》较具实力。1916~1926年间,广学会与中国统治阶层,显然少有接触,出版之书籍以宗教性居多。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中国统一。是时广学会之执行干事林辅华牧师(Rev. Charles Wilfria Allan)乃英国循道会派遣来华之教士,广学会原任总干事季理斐因身体健康欠佳已于1930年离华,会务实由林辅华牧师主理,以其教会背景与政府高层官员多所联系。为配合国民政府公民教育之推行,广学会出版有公民常识小册,如《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革命的意义》等(20)。广学会在民国成立后,所出版之刊物计有:

1. 《女铎》 (1911~1951)
2. 《福幼》 (1915~1951)
3. 《明灯》 (1921~1941)
4. 《道声》 (1930~1949)
5. 《女星》 (1932~1941)
6. 《平民家庭》 (1933~1939)
7. 《民主》 (1948~1951) (21)

1931年由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公理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监理会等六公会委派代表组织“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进行《普天颂赞》之编译工作,1934年11月委由广学会出版(22)。《普天颂赞》音乐主编范天祥牧师(Rev. Bliss Wiant),对中国圣歌曲调贡献至大。中国圣歌创作者有刘廷芳、赵紫宸、谢扶雅、顾子仁、杨荫浏、陈文安、尤路得、杨镜秋、许地山、蒋翼振、王载、吴斌、戴淑明、简万吾、冯松云、贾玉铭、张逢源、王近溪、倪其

泌、朱葆元、姚贤扬、江志民、李元模、恩普等人均有作品(23)。朱维之在其《基督教与文学》中指出：

我以为民国以来，中国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学上最大的贡献，第一是和合译本《圣经》底出版，第二便是《普天颂赞》底出版。二者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本子，但至少可以说已经打定了基督教文学底根基，而且作为中国新文学底先驱，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由上所述，足见民国时期广学会之出版事业，实以宗教及教育为主导。(24)

五、香港时期之基督教文化出版社

战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1948年11月前梅立德(Rev. F. R. Millican)与薄玉珍(Margaret H. Brown)到海外布置迁会计划，于同年12月将广学会纸版、稿件、诗谱等物运往香港。1950年，香港圣公会何明幸主教(Bishop R. O. Hall)召集循道会及伦敦会之领袖研究在港成立出版社之可行性。翌年薄玉珍由沪抵港，7月27日成立“基督教辅侨出版社”(The Council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Overseas Chinese)，由伦敦传道会舒活牧师(Rev. Frank Short)兼任总干事(25)。“基督教辅侨出版社”之设立，其工作实以海外华侨为主，除香港外，亦以新加坡、婆罗州、台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美国等地之华人为服务对象。

在港历届执行委员会主席：

华连博士(Dr. E. E. Walline)1951~1954

彭绍贤博士1954~1959

1966~1975

周郁晞博士 1959~1966

黄永熙博士 1975~1988

历届总干事(社长):

舒活牧师(Rev. Frank Short)1951~1953

顾克牧师(Rev. Clifford V. Cook)1953

苏佩礼牧师(Rev. Hubert W. Spillett)1953~1967

黄永熙博士 1967~1975

沈冠尧牧师 1975~1977

何世明牧师 1977~1980

黄道一牧师 1980~1984

黄耘蔚牧师 1985~

(26)

“基督教辅侨出版社”于1965年改名为“基督教文艺出版社”(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总干事(社长)人事之转变,华人全权自理社务实以黄永熙博士于1967年接任开始,亦即广学会成立80年才步上华人本色化。在港出版之刊物有:

1. 《福幼》 1951~1980

2. 《世界基督教文摘》 1953~1958

3. 《信徒灵修日记》 1954~1976

4. 《展望》 1958~1967

5. 《快乐家庭》 1960~1980

6. 《文艺杂志》 1982~1986

(27)

由于华人主理社务,能洞悉华人实质的需求,而“基督教文艺”

处于英属殖民地香港,服务对象只以华人为主,故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多注重中国文化之了解与阐述,以期达到基督教传播之目的。

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承继广学会以来,在港出版不少宗教丛书、灵修、神学等书籍,并出版各类教科书对香港社会作出贡献(28)。黄永熙博士于1970年着手重编《普天颂赞》,1977年12月出版修正本第一版(29);1986年10月出版中英对照本,为世界各地华人教会多所采用。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本广学会宗旨,由不同宗派之教会人士组成,故不属一宗派之出版社,其工作及出版事业均为各大宗派之华人教会所支持。为使业务有所推广,于1987年1月在台湾设立分社,开展台湾出版工作。(30)

六、结 语

广学会之创办,以迄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之承继,其间已逾百年之久,晚清及民国遭遇时局之事变,对广学会之工作及其发展均有所影响。满清时期(1887~1911)历24年,其出版工作较偏重于政治性书刊,以皇朝权贵为依傍,对象则以知识分子及官僚为主。民国时期(1912~1949)有37年,出版工作除宗教性之外偏重于社会性书刊,以政府高层官员为依傍,对象以工、农、妇、孺等阶层为主。香港时期(1950~1988)共39年,出版工作多属宗教性书刊。1967年以前多靠外国教会机构支援,及后步上经济自主及华人本色化,由于工作对象是香港及海外之华人,故以中华文化为取向。换言之,晚清及民国时期因广学会所在地上海属于中国本土,其工作发展实以国家整体有所配合;香港时期所在地是属英国殖民地,于工作发展则以民族整体有所配合。

注 释

- (1)按早于1858年6月26日中英签订之《天津条约》已列明基督教及天主教在华有传教之自由。但是《天津条约》之执行,是于1860年12月24日在北京所签之《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始加追认实施,故基督教及天主教准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实为1860年后之事。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字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9月,第96-99页,144-146页。
- (2) Suzanne W. Barnett, "Silent Evangelism and Mission Press in China, 1807 - 1860" in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Volume 49. Number 4, Winter, 1971, p. 287 - 301.
- (3)参见邓嗣禹撰《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之关系》,载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四册,《明清史研究论集》,第267-277页。
- (4)参见《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2月,第1027-1042页。
- (5)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p. 629.
- (6)参见王树槐撰《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第368-370页。
- (7) Rev. A. J. Garnier,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887 - 1937" in "No Speedier Way, Golden Jubilee of CLC for Chian, 1887 - 1937" p. 3 - 4.
- (8)参见注(6),第656页。

- (9)参见《万国公报》(十七),台湾文华书局影印,第11002 - 11003页。
- (10)参见注(7),第3页。
- (11)参见注(9),第11004 - 11006页。
- (12)参见注(9),第11007页。
- (13)转引注(9),第11009页。
- (14)参见王树槐著《外人与戊戌变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2),1965年1月,第26 - 31页。
- (15)Timothy Richard, *Forty 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6)p.221。
- (16)参见王树槐撰《清季广学会》,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四期上册,第200页。
- (17)参见注(16),第198 - 199页。
- (18)参见许牧世撰《广学会的简史及其贡献》,载《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庆祝广学会创立九十周年特辑》,第17 - 18页。
- (19) William E. Soothill, "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Limited, 1924)p.302 - 304。
- (20)参见济泽撰《广学会最近二年中概况》,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3》,第125 - 126页。
- (21)参见贾立言撰《广学会在过去两年间工作实况》,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 - 1936》,第144 - 150页。
- (22)参见《普天颂赞序言》,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0年11月港六版。
- (23)参见朱维之著《基督教与文学》,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1年1月版,第156 - 157页。
- (24)转引注(23),第151页。
- (25)参见《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庆祝广学会创立一百周年特

刊》，第 43 页。

(26) 参见注(25)，第 9 页。

(27) 参见注(25)，第 43-47 页。

(28) 参见何世明撰《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继承广学会工作》，载《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庆祝广学会创立一百周年特刊》，第 25-28 页。

(29) 参见《普天颂赞新版序言》，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7 年 12 月修正本第一版。

(30) 参见注(28)。

广学会出版事业对时代转变的适应

一、引言

任何出版社的成立,都须审度时势,认识社会需要,从而制定出版方针和发展的方向。广学会在1877年创办初时,协理韦廉臣牧师(Rev. Alexander Williamson,翌年出任督办,即日后的总干事或社长)曾说:“故西人来华,原欲以兴西国者兴中国,盖深知于中国有利即不啻有利于西国也。”(1)广学会主要目标是在于“兴中国”,是因其时满清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洋务运动,吸收西方技能,改良中国物器,以达自强境地。广学会创会董事有见时代需要,因此希望透过“兴西国”的事物,引介西方文化,达到“兴中国”的目的。

就以广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原名“同文书会”(2))首届职员名单所列,38人中计有领事官员3人,税务司8人,洋行商人9人,医生1人,律师1人,银行代表5人,教会领袖7人,西报编辑1人,同文馆总教习1人,轮船公司代表2人(3),可以推知广学会是一个外人在华结社的组织,本以基督爱人的精神,实践互助互利的行动。广学会之设立与发展,实不能忽视总理赫德(Robert Hart)的贡献,以晚清广学会24年(1877~1911)计算,赫德任总理

有 21 年之久,李提摩太牧师(Rev. Timothy Richard)任督办不过 15 年,而李提摩太 1892 年出任督办,亦是由赫德举荐(4)。由于赫德身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为清廷倚任多年,毫无疑问,中外大臣皆尊而信之”(5),对皇朝的高层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广学会出版的书刊才能畅销京师,被中国显贵和士大夫采阅。赫德对中国时势甚有认识,早于同治四年(1865 年)向总理衙门呈递《局外旁观论》,是倡导中国变法的第一人,(6)其后林乐知(Young J. Allen)、艾约瑟(Joseph Edkins)、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韦廉臣、傅兰雅(John Fryer)、李提摩太等教士多有鼓吹变法的主张。(7)其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倡议变革,他们的维新思想完全起源于广学会书刊的言论。(8)所以晚清戊戌变法,与广学会有密切的关系。

李提摩太就任督办以后,致力于扩大广学会工作,主要有:

1. 将《万国公报》作为一本高级杂志,提供有系统的问题。
2. 出版一系列的书籍与小册子,说明教育与宗教的发展对工业、贸易及国家进步与每一部门的关系。
3. 希望筹得奖金,给予有关促进国家进步的优秀论文作者。
4. 筹设博物馆、图书馆、举办演说会等。
5. 在全国各地设立代销处,增加出版品的销路。
6. 尽力争取中国人合作,协助华人组织学会,为中国谋利益。
7. 宣扬广学会的宗旨,使人们明了广学会的真正用意。(9)

广学会业务发展迅速,至 1898 年在全国设有 28 个代销处;而海外如香港、新加坡、槟榔屿、横滨、巴达维亚(今日的雅加达)亦设代销处。为配合社会需要,历年出版的非宗教性书籍较宗教性书籍为多。非宗教性书籍包括人文、政治、法律、财经、外交社会、教育、改革论、历史、传记、地理、自然科学及工程、医学、天文、生物等

类,是晚清介绍西方知识最大的书局。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更是风行全国的杂志。有人说广学会的成功在于商业性的宣传,大量赠送日历、卡片、绢扇等物作为宣传。1910年曾利用邮局寄出27万份广告单张,收到极大宣传效果。(10)

戊戌政变失败后,中国转向日本学习,留学生多翻译日文书籍,介绍西方人文科技,保皇党人出版《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此等由国人执笔的报刊,在情在理较之广学会出版书刊更易为人接受(11)。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政制改变,皇朝权利中心崩溃,满清官僚和士大夫已经失势,故此广学会失去以往的工作对象。此外,政府中心的转移,以及平民阶层政治地位的提升,导致广学会失去权利的倚傍。革命以后,大批留学生回国,可以直接将西方各种最新的知识引进中国,广学会历年从事翻译的工作,渐已消失作用。在此中国时局变迁的时刻,广学会未能取得适应,出版业务遭受极大的影响。

二、辛亥革命后的未能适应

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一般信徒大多认同革命运动对中国的贡献,认为新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给予人民自由的权利,将有助基督教事业的发展,因此对新政府抱有极大的期望。但当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元月一日就任大总统后不久,即让位给袁世凯。袁氏于1916年元旦改号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实行帝制复辟,由是引发全国人民的反对抵制,袁氏不久病逝。南北政府局面形成,地方势力壮大,军阀拥兵割据,局势至为混乱。1911-1916年间,李提摩太仍任督办一职。由于李氏与康、梁关系密切,力主中国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对孙中山革命运动向未赞同。(12)所

以在满清王朝失势以后,广学会在策略上,实在难以贯彻以往出版的目标,广学会事业因此陷于低潮。

民国初年,中国基督教计有广学会(上海),圣教书会(上海),圣教书局(汉口),华西圣教书会(重庆),华北书会(天津),浸信会印书局(广州),宣道书局(广西梧州),美华书馆(上海),华美书局(上海),三一书院(宁波),基督教青年会组合编辑部(上海),通俗教育社(上海浸会大学)等 12 大书局,其中以“广学会,款项最裕,人员亦众,故所出之书最多”(13)当时广学会则强调“书报布道”的理念。季理斐、张纯一在《书报布道之概说》一文中说:

“此广学会、圣教书会等之所由设也,其目的即藉书报,推阐真理,引人皈命基督,永享幸福耳。

按书报约分二类:(一)直接讲福音者,以圣教书会出书为多,如《马可讲义》、《路加衍义》等,精深博大,义蕴无尽,足以弥补儒教之缺点而光大之。(二)间接传福音者,以广学会出书为多,如伦理学、性理学等,恒合古今欧亚哲理,一炉而冶,推陈出新,足以参互儒教之精粹而调和之;他若教育、历史、传记、哲学、农工、矿业、天文、地理、博物、化学、算学、生理医科、政治、经济、法律及国际公法等书,莫不原本欧美,一一具备,以真事功从真道德出,真道德从真知识出,姑特开人德之门,使学者皆得殊途同归。然犹恐民德未能月异而日新,更出各报以辅之,凡仰体我教主敬天爱人之心,聊尽本分耳。或者谓书报之为布道助,间接者究未若直接为剀切。似已,岂知方今文人竞求知识,果谁及于道德乎。若保罗有曰,在犹太人中,当如犹太人,始能救犹太人。故同人每准学子心理所向,多方搜集资料,编译纂著,将乘机利导,感发道心于一觉,若仅足增益其知识,则劳思费时奚为者。惟由此间接书,逐渐引人入胜,使阅者理性灵思,日引月长,几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欲不睹新约书而不能,斯为得之。”

1916年(14)李提摩太辞职,张纯一报导广学会概况称“本年

成绩无多”(15),发行旧书为数最多,新书出版以宗教性为主;同年出版《圣经辞典》钜著;报刊则有《教会公报》、《女铎报》、《大同报》(16)。并谓:总之本会务准永生真道,融合国粹,发挥光大,助成中华教会精神上之真自立,俾凡神学校生,可以慧智兼修,陶成优秀宣教师,是则会之帜志也。(17)

在此反映广学会“融合国粹”,“陶成优秀宣教师”的取向,而在1920年,广学会致力于报纸传道工作,每星期为百多份报刊撰写文稿,论述中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为应付实际需要,又因广学会缺乏人力和资金,所以期望在三、四年后制定一套出版计划。(18)

1921年季理斐在《基督教文字事业的概况》一文中,指出教会书局近年出版新书不多,销售不畅。广学会利用报纸传道工作似见效果,而《教会公报》及《大同报》因赔累太多而停刊,其时《福幼报》及《女铎报》最为畅销(19)。季理斐对教会出版事业作出“总论”说:

以上所举数端,虽觉得现在基督教文字事业,有新书不多,销路不畅等情形,而将来的希望及发达,都是不可限量的。因为中国的学校,日见添设,中国识字的人和教会能看书的信徒,也是日见增多;识字人的数目加多,售书的路途也是一定要推广的,将来的发达,当然不可限量。但教会书籍,从来是折本的事业,以后发达越大,需费更大,这些经费从来都由西国教会负担,希望此后中国信徒,多注意这些切要的文字事业。或筹巨款,或培人才,或担任撰著,或代销书籍,文字事业蒸蒸日上的进步,不难得到了。(20)

从季理斐的论述中,可知民国初期基督教出版事业的困境,反映出广学会同样遭遇出书、销书、经济、人才、方向种种的问题。

三、五四时代的冲击

辛亥革命起义成功,满清王朝虽被推翻,但中华民国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政治上没有完整的体系,思想上没有主流的导向,局势至为混乱。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极力提倡“民主”和“科学”,另一方面又要“打倒封建”和“破除迷信”,将固旧传统视之为敝屣,子是一些知识分子将自己从西方所学的思想移植在中国,以致西方的达尔文进化论、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美主义、放任主义、自由主义等种种的思想引进中国,使中国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教会同样受到极大的冲击。这种新文化思潮,更带动了其后的反基督教运动。

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计划于1922年4月4—8日,借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大会,由是引起一班知识分子的反对,于3月9日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其后更组织《非宗教同盟》,发起种种反教言论和运动,新思潮运动与反教运动的结合,对基督教带来重大的反响(21)。适值1922年5月2—12日在上海举行“基督教全国大会”,对中国当前的实况、教会将来的工作均有详尽讨论。广学会派代表参加,特别提出“藉报纸布道”的工作(22)。大会在宣言中对“中国本色的教会”有九项说明,其中指出:

中国的历史,国人的特性,教务的性质,经验的指示,以及国内种种的迅速变迁,莫不要求一个中国本色的基督教会,俾得宣传中国本色的基督教。我们所称为本色的基督教会,一方面仍与世界各宗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有连续不绝的关系,一方面要实在适合中华民族本有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经验。

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

道,而达自传的目标。(23)

在出版人才本色化上,“不傍人门户,自己能独立发挥意见(24),除个人方面,有少数这等作家外,绝不多见”,因此在改良文字与任用中国人的问题上作出结论:

中国教会,当以中国本色文字(外国人说中国话,说出来多是外国的中国话,不是本色的中国话,怎能叫做中国本色文字,谅阅者诸君看了这个比方,当能明白)去应付。但现在已经出版了的那些书,虽然因为境遇变动,不合需要,不大畅销,有价值的,还得珍惜,还得感谢那些费了大神的著作家,他们原有各种困难,不易达到他们出书的目的。我们为教会文字事业前途计,也得改弦更张,略变早先所用的政策。现有的书籍,本也多半是外国人用工夫做出来的,编辑和管理两方面,都少中国人。今后更多出能应时需的中国本色文字,著作人须得要中国人充当,就是提倡训练中国男女信徒的文字才能,在文字各机关管理上,也要完全给中国信徒充当。(25)

为解决文字人才荒,在宣言中提出五种方案:一、设立学校;二、资助国内求学的经费;三、资助国外求学的经费;四、特设文学专科;五、组织函授学校,藉此改善从事基督教出版事业的中国人才不足的问题。(26)

教会文字出版的本色化,自然要面对时代的需要,新文化运动带来全国性的震撼,教会出版界不能坐视不理。因此大会中作出定论:

新文化运动,我们讨论不少,当然是大家赞成的。但基督教究取那种态度,怎样去做应付新文化运动所要求于我们的?紧要吗?既然这样,文字机关必须要中国信徒去管理;文字编辑,必须要中

国信徒去干。现有的文字销行最广的,就是有了受了训练信基督的中国著作家的同工文字。将来中国教会,用基督教文字所得的效果如何?就看我们给信基督的中国作家编辑的权柄,使他们能自由用中国文字发表他们所能吸引中国人的心理的思想而定。然而我们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西教士在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里不重要,不相干。因为中国教会,收的西教士著作多种文字的利益,已经很多。现在西教士,也有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很好,热心作文字工夫,启发中国教会的,但西教士当抱定终久要把这文字事业,完全交到中国信徒手里去做。(27)

在此足以说明,中国教会文字事业要走一条本色化的道路,不只是中国文字人才的问题,也是关乎西教士权利下放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出版机构完全由西教士支配,无论写作、出版、编辑经济、人事都受到西教士的控制,要发展中国本色文字事业,西教士可说是最大的障碍。无疑广学会是一个纯由西教士主持的机构,面对全国基督教大会的本色化建议,必然在出版政策上有所转变和适应。

四、广学会本色化的转变

在全国基督教大会期间,均有讨论组织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建议,故闭会后,不久即有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跟进全国基督教大会建议的工作。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法定会员一百人,规定文字及书报会社派出代表二人为会员,即中国代表一人,外国代表一人,中国是由广学会陈金鏞为代表(28)。足见广学会在全国基督教出版事业所具有的代表性,而广学会在全国基督教大会的建议中获得指导性的作用;此外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文字书报决策更可策动新的事工目标。

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对“教会将来的工作”有:讨论及发展中国

本色化之基督教,教堂学校家庭之宗教教育,城市教堂,乡区教堂,教会之妇女,责任心之发展,生命之管理主义,金钱之管理主义,基督教布道之计划,教会医药事业之计划,教会与工业经济之关系,教会与农业及乡村生活之关系,教会与社交道德之关系,照顾未工作之地面等种种的主题,而这些主题都有积极性的提议,足以作为当日教会和机构的参考。(29)有关广学会的本色化发展都依协进会建议进行,1927年李兆民报告说:

广学会原是国际差会教师的文学团体,在光绪二三十年间曾经作过中国社会上有声有色的领袖,上中流人物多受指导。李提摩太、林乐知、花之安、丁匙良诸位学者,提起来几乎凡识字的,人人都晓得。文字宣传到这个地步,颇不容易。民国以来诸位学者相继谢世,只留季理斐、莫安仁两位博士,如硕果之存。季任总干事,莫任总编辑,所有工作多向教会内部发展,俨然成为教会各宗派的公共文字事业。

这样,广学会不得不由外国式渐次变化为中国本色的,困难虽多,步调到底必要改换。加以新潮和民族思想的激荡,中华信徒也要有自己的教会组织,以尽他们事奉上帝的热忱,于是各处教会突然兴起一班华人领袖。广学会也是一样,不仅延华人为雇工,先有陈金镛牧师,聂绍经君及兆民,后有谢颂羔君,一同参与干事会。董事选出华人半数十二名,并举诚静怡博士为董事长。会员征得华人由二十名增至百数十名。当本会成立时曾有华侨捐款,以后为纪念李提摩太博士藏书楼和推广工作两次征募,华人官绅解囊不下万圆,将来华人员日多,可望成为华人基督教徒事业。(30)

广学会在1927年提出“广学会四十周年纪念改进计划”，拟出版为教会学校学生、外教学生、农工商和军警以及囚犯、聋哑各色人等、传道者、基督徒各种深浅灵修书和宗教小说、普及布道、对儒释道、对妇孺等各类书籍，以应中国教会的需要。(31)其后更获得山东齐鲁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刘廷芳博士合作，出版宗教心理学、伦理学、历史与圣经辞典各种书籍。(32)广学会在五四运动后所作本色化的转变，经获得教会领袖的认同，以及教会信徒的支持，在出版事业上有所突破。

五、广学会出版事业的适应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引入西方思想甚多，社会仍然呈现一片混乱。及至国民革命军北伐，于1927年完成统一中国，全国局面渐趋安定，社会随即发展种种建设事业，教会亦因应社会的转变而需要各种支援，广学会为配合教会的需要，在出版策略上有新的取向。对于教会内部需要的释经、灵修、妇女生活、青年生活、信徒生活、信徒教育、神学教育等类书，固然加强出版，而广学会为教会切合社会转变所作的服务，在出版上亦有所供应。抗战前出版的社会性书籍有：

1. 平民教育：基督教华人信徒推行平民教育以晏阳初为最早，他于191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随即参加青年会在法国主持的华工服务，由于中国派往法国参战服务的华工多不识字，其后设立华工识字班，与傅葆琛编印课本教导华工学字写信，以便与中国家人通信。欧战结束，返回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进修硕士，1920年毕业返抵上海，目睹国内社会情况，认为推行平民教育刻不容缓，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余日章博士对晏阳初之主张甚是赞同，建议由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推动，在各城乡设立平民学校(33)，先后

在长沙、烟台、杭州、南京、武昌各地发展迅速，五六年间售出平民千字课本，约计三百余万册，而一般学校亦设有平民学校，教导工人、乡民、妇孺等学习文字，推行扫除文盲运动(34)。广学会为响应平民教育运动，先后出版广学读本、平民宗教课本、平民家庭教育等书籍，供应教会采用。(35)

2. 农村建设：中国近代农村建设，起源于1918年金陵大学农科的成立，初期有美国教授主持，推动品种改良；其后与中央政府农林部合作，正式成立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着重于信用、运销、推广、卫生、家庭工业、教育的工作。(36)金陵神学院于1926年成立乡村教会科，由毕范宇牧师(Rev. Francis Wilson Price)领导学生到乡村调查与实习，在平民教育中开始编辑农民宗教读本和其他乡村教会文字工作。其中在南京东南45里的漳化镇开办的实习处农场最有成绩。而毕范宇为广学会主编“农村复兴”系列专书，出版一套农民宗教读本课程，以便推广教会农村工作。(37)

3. 公民教育：民国初期，一般人民知识水平低，对社会公德，公民责任毫无认识，广学会为加强人们对公民教育的认识，先后出版《公民与社会的研究》、《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等书籍和专册，使公民教育得以普及。(38)

1936年广学会出版《普天颂赞》，堪称教会盛事，出版后多被教会采用，是中国教会除《圣经》以外，销售量最多的书籍。(39)根据广学会1938年报告，教会文字事业，以该年为高峰期。(40)其后中国全面抗战，广学会出版工作亦因而受到影响。

六、抗战与战后的困境

1937年总干事贾立言(A. J. Garnier)退休归国,由华人朱立德接任。7月7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广学会为避战祸,由上海迁入华西。(41)广学会、青年协会书局和华北的田家半月报社,全是内迁的教会书局,鉴于实际需要,便与成都华英书局共同组织“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目的是透过合作增强出版工作。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宣告结束,联合出版社成员遂即回沪办公,会员由原来四个机构增至七个机构。1947年11月正式改组为“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以期在出版和推销工作上取得合作,至1948年6月新增六个机构,共13个单位。(42)在抗战期间,广学会继续刊行《女铎》和《福幼》两种刊物,至复员后,国内政局动荡,广学会经济不很理想,出版以旧书翻印居多,实在乏善可陈,可见中国政局的演变,广学会也陷入了困境。

七、结 语

广学会自1887年创立,至1949年,在这62年的岁月中,中国历经自强运动、中日战争、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等种种的战乱。广学会处于不安的环境中,试图找寻最好的出路,为中国社会和教会作出贡献,但往往因为客观环境的变迁,而使广学会无从适应。广学会在62年的历史上,实质可分为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明清时期以李提摩太为代表;民国时期以季理斐为代表。李提摩太主政年代,以1892~1907年最为兴盛。(43)而季理斐主政年代,以1922~1937年最为兴盛。(44)但是两个时期的出版着

眼点也有不同, 满清时期是以国家社会为出发点; 民国时期则以教会信徒为出发点。若以国家社会为出发点, 受益读者自然以一般非信徒居多, 但这只限于西方文化知识传播的效应, 与信徒难有实际关连。至于以教会信徒为出发点, 受益读者自然以信徒较多, 对神学教育和灵性增长, 亦多有效果。从广学会的发展阶段来看, 文化和信仰两种目标, 实难两者兼顾, 况且世局的转变足以影响出版策略的转变。广学会由创办至 1949 年, 62 年来最大的危机是未能在本色化方面取得成效, 历来出版的书刊, 以翻译居多; 在经济上多赖外国教徒的支持; 人事上华人不能自主, 事业发展必然遭遇障碍。惟广学会对于国家社会或是对于教会信徒, 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历史上应予肯定。广学会的历史, 亦足以作为中国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的代表, 从广学会的发展可以了解中国基督教出版历史过程。

注 释

- (1)《万国公报》(十七), 台湾文华书局影印本, 第 11007 页。
- (2) 广学会创会原名为“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李提摩太接任督办后, 于 1894 年将中文名称“同文书会”改为“广学会”, 英文名称沿旧。1905 年季理斐建议将英文名称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ese”, 中文名称沿旧。
- (3) 同注(1), 第 11002—11003 页。王树槐著《外人与戊戌变法》,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2 年 1 月, 第 44—45 页。梁元生著《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8 年, 第 91—93 页。

- (4) 王树槐著《外人与戊戌变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1月，第36页。
- (5) 梁元生著《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93页。
- (6) 同注(4)，第1—3页。
- (7) 同注(4)，第10页。
- (8) 同注(4)，第48—53页。
- (9) 王树槐撰《清季的广学会》，载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12月，第25页。
- (10) 同注(9)，第251—261页。
- (11) 同注(9)，第266页。
- (12) 苏特尔著周云路译《李提摩太传》，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第68页。
- (13)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影印本，台北，1983年3月，第112页。
- (14) 同注(13)，第117—118页。
- (15) 同注(13)，(1916)，第99页。
- (16) 同注(13)，(1916)，第100页。
- (17) 同注(13)，(1916)，第101页。
- (18)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029—1030页。
- (19) 同注(13)，(1921)，第128页。
- (20) 同注(13)，(1921)，第129页。
- (21) 王治心著《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10月，第267—276页。

- (22)《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五章,第52页。
- (23)《基督教全国大会第三股报告书:教会的宣言》,第3—4页。
- (24)同注(23),《第四股报告书:教会领袖人才之启发》,第38页。
- (25)同注(23),《第四股报告书:教会领袖人才之启发》,第39页。
- (26)同注(23),《第四股报告书:教会领袖人才之启发》,第40—41页。
- (27)同注(23),《第四股报告书:教会领袖人才之启发》,第39页。(28)同注(22),第253页。按广学会其后亦成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员。同注(13), (1934—1936),第150页。
- (29)同注(23),《第二股报告书:教会将来之工作》,第1—92页。
- (30)同注(13), (1927),第120页。
- (31)同注(13), (1927),第121页。
- (32)同注(13), (1933),第126页。
- (33)吴相湘编著《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6年2月,第19—39页。
- (34)吴聪贤撰《农村社会》,载《中华民国社会发展史》第二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5月,第644页。
- (35)《广学会图书目录》,上海,1950年10月,第35—37页。
- (36)同注(34),第647—651页。同注(13)(1934—1936),第147—148页。
- (37)毕范宇撰《本院乡村教会科短史》,载《金陵神学志》1950年,第142—146页。

- (38)同注(13), (1933), 第 125—126 页。
- (39)许牧世撰《广学会的简史及其贡献》, 载《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庆祝广学会创立一百周年特刊》, 第 23 页。
- (40)沈亚伦撰《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 载《金陵神学志》, 1950 年, 第 26 页。
- (41)同注(39)。
- (42)应元道撰《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 载《金陵神学志》, 1950 年, 第 78—79 页。
- (43)广学会《万国公报》于 1907 年停刊, 显示广学会出版事业已走下坡。
- (44)季理斐于 1930 年退休回国, 翌年病故, 但广学会在抗战前的出版政策, 多依季氏路线发展。见 Margaret H. Brown, “MacGillivray of Shanghai”, (Toronto, The Ryerson Press 1968.) p. 202—208。

